

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全文标明引文)

№:ADBD2018R_2018012609243820181007154434402597164342

检测时间:2018-10-07 15:44:34

检测文献: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作者: 刘永祥

检测范围: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图书资源

优先出版文献库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互联网资源(包含贴吧等论坛资源)

英文数据库(涵盖期刊、博硕、会议的英文数据以及德国Springer、英国Taylor&Francis 期刊数据库等)

港澳台学术文献库

互联网文档资源

CNKI大成编客-原创作品库

个人比对库

时间范围: 1900-01-01至2018-10-07

检测结果

总文字复制比: 26.1%

跨语言检测结果: 0%

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 16.6%

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 25.2%

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 3.9%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银行业之联合准备制)

重复字数: [26834]

总段落数: [14]

总字数: [103001]

疑似段落数: [14]

单篇最大重复字数: [4010]

前部重合字数: [4486]

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数: [5109]

后部重合字数: [22348]

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数: [332]



指标: ☐ 疑似剽窃观点 ☒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 疑似自我剽窃 ☐ 疑似整体剽窃 ☐ 过度引用

表格: 0

公式: 没有公式

疑似文字的图片: 0

脚注与尾注: 251

5.2% (332)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部分 (总6362字)

43% (3677)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2部分 (总8550字)

12.5% (1046)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3部分 (总8337字)

11.1% (581)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4部分 (总5230字)

40.8% (3939)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5部分 (总9661字)

4.6% (388)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6部分 (总8394字)

61.5% (5109)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7部分 (总8302字)

43.3% (1030)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8部分 (总2380字)

21.2% (1782)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9部分 (总8391字)

21.6% (1791)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0部分 (总8288字)

11.9% (988)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1部分 (总8281字)

13.1% (702)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2部分 (总5355字)

52.7% (4913)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3部分 (总9319字)

9% (556)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4部分 (总6151字)

(注释: 无问题部分 文字复制比部分 引用部分)

1.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部分		总字数 : 6362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 : 5.2%(332) 疑似剽窃观点 : (0)		
1	经济学的历史性与科学性耦合及其前景 陈孝兵; - 《当代经济研究》 - 2014-08-15	1.5% (94) 是否引证 : 否
2	中国政府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与特点(1900~1949) 姚会元;易绵阳; -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 2007-09-15	1.5% (93) 是否引证 : 否
3	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 王玉茹; - 《学术月刊》 - 2007-01-20	1.4% (92) 是否引证 : 否
4	论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 高德步; - 《政治经济学评论》 - 2006-06-30	1.4% (91) 是否引证 : 否
5	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基于史实与逻辑的视域 叶坦; - 《经济学动态》 - 2013-10-18	1.4% (86) 是否引证 : 否
6	重温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许崇正 - 《学术月刊》 - 2005-08-20	1.4% (86) 是否引证 : 否
7	社会保险制度研究方法刍议 李光勇,万春 - 《人口学刊》 - 2004-08-20	1.4% (86) 是否引证 : 否
8	重温亚当·斯密理论与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许崇正 - 《经济评论》 - 2005-03-25	1.4% (86) 是否引证 : 否
9	论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 易绵阳; -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8-12-15	1.4% (86) 是否引证 : 否
1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资本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祝志勇;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07-28	1.3% (81) 是否引证 : 否
11	编者前言 顾海良; - 《经济思想史评论》 - 2006-06-30	1.3% (81) 是否引证 : 否
12	1952—1957年农业生产绩效研究述评 匡家在;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13-09-15	1.3% (81) 是否引证 : 否
13	梁方仲对经济史统计工作的贡献——兼评经济史研究中的统计方法与计量经济学方法 陈争平;常旭;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03-15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4	洞晓与践行“包容”理念的睿智大师——缅怀吴承明先生 董志凯;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12-06-15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5	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董君; - 《现代营销(学苑版)》 - 2013-01-15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6	中国经济理论自信:提出背景与增强路径 高帆;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2013-03-31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7	经济史: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隋福民;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09-06-15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8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萧国亮;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10-12-15	1.2% (79) 是否引证 : 否
19	国民政府时期财政部的金融监管研究 (1927-1940) 褚明露(导师 : 钟建安) -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10-06-01	1.1% (71) 是否引证 : 否
20	会计史研究:全球视野与现实观照 王爱国;吴大新; - 《商业会计》 - 2018-03-10	0.9% (58) 是否引证 : 否
21	回顾与前瞻:2017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述略 朱海城; -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 - 2017-12-15	0.9% (56) 是否引证 : 否
22	民营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江怡; - 《社会科学动态》 - 2017-12-20	0.8% (54) 是否引证 : 否
23	近代上海信用保险事业发展述评 孙建国 - 《上海保险》 - 2005-11-30	0.6% (40) 是否引证 : 否
24	慎用“银行”一词 - 《学习导报》 - 1996-02-15	0.5% (31) 是否引证 : 否
25	《商业银行法》改为“银行业法”的总体构想 刘少军; - 《金融法学家 (第七辑) 》 - 2015-10-31	0.5% (31) 是否引证 : 否
26	付晓飞毕业论文二稿 - 副本 付晓飞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16	0.5% (29) 是否引证 : 否

目录

第一章导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既有研究成果	2
三、本课题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基本结构	7
第二章夹缝中生长的近代民营银行	10
一、近代民营银行的成长环境	10
二、近代民营银行与政府	19
三、民营银行业与政府公债	26
第三章抗拒停兑令与江浙财团的形成	35
一、化危为机——抗拒停兑令事件	35
二、江浙财团的形成	38
三、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	42
第四章民营银行的同业互助与同业联营	46
一、日常经营中的资金融通	46
二、金融危机中的同业互助	49
三、四行联营	55
四、其他民营银行的合作方式	65
第五章民营银行内部危机防控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67
一、提高银行职员的专业化素养	67
二、防弊设计：职员保人制度	74
三、充满争议的信用保险制度	76
四、内部业务监控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83
第六章调查与征信：对危机的预测和规避	90
一、银行业信用调查的发生发展	91
二、银行征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	96
第七章联合准备与行业监督	102
一、一二八事变后的联合准备	102
二、上海银行公会的同业监督	107
第八章结语	113
参考文献	120

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的意义

众所周知，银行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信用机构，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企业，银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近代学者所言：“经济社会，犹人之身体然，金融机关，恰如人身之心脏，通货则如同血液。倘使吾人身体而无心脏，则若何生存？又使身体缺乏血液，则心脏又若何滋养？是故一国经济社会，非有金融机关，必不能流通活动”。中国近代本国华资银行虽然成立较晚，发展步履维艰，但同样对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对近代银行业的发展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体系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而近代银行业恰恰是中国近代金融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首先，它们的诞生是商品经济和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历史上看，银行这种现代金融机构的兴起与成长往往与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资金融通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由传统步入现代不可缺少的条件。其次，近代银行业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透过近代银行，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近代金融体系、制度的演进，还可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关注近代银行业时，我们就不能忽视其中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群体——民营银行。在南京国民政府官僚垄断金融体系建立以前，民营银行不论是数量还是实力都在整个华资银行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想全面地认识近代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就应当对近代民营银行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中国近代金融业中坚力量的民营银行，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随时面临各种金融危机和风险的冲击。本成果对近代民营银行的危机防控机制及其应对举措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第一，有助于了解近代民营银行自身的兴衰历程、制度建设，拓展和深化中国金融史尤其是银行史研究的领域和深度

，进而为中国近现代史及现代化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银行与政府、银行与旧式金融机构、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银行与各种社会势力以及银行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所裨益；

第三，这一研究客观上还可以起到另一个作用——为当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近年来，中国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民间资本的存量呈现上升趋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同样引人深思：它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它需要怎样的市场环境？它自身的制度应该如何构建和安排？政府应该以怎样的力度和方式去完成对民营银行的监管？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特别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银行仍然会遇到各种危机与挑战，要化解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应对多样性的危机。因此，近代民营银行危机防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既有研究成果

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银行专业市场逐渐向外资开放，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海内外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健全的危机防控机制是保障银行业自身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受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史研究日益强调史学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之前仅在经济理论学界讨论的危机防控问题逐渐受到经济史学者的关注，与当代经济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银行业尤其是民营银行的危机防控思想与经验，自然更是关注的重点，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成果。

较早涉及银行业危机防控问题的成果出现于各类文史资料等回忆录性质的部分文字中，内容多以记录近代金融风潮爆发的经过及危害、银行家关于危机防控的意识与思想为主，这些资料通过不同参与者或经历者的回忆，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现场感性资料，但因其个人回忆性质所限，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考证。部分银行通史研究、银行家研究著作中亦有涉及危机防控机制的内容，此类研究重点多在于梳理银行、银行家在政治危机、金融风潮中的应对措施，如姚崧龄、卜明、兰日旭等人在著作中肯定了张嘉璈、宋汉章在1916年停兑令及随后爆发的京钞风潮中为维持中行信誉，坚决抵制停兑令的努力，另外也有部分银行家思想研究的作品在关注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等近代银行家成长经历的同时，注意到他们的现代银行危机意识与内部危机控制对银行稳健经营的积极作用。如张嘉璈一直将稳健经营作为银行管理的要领，他坚持在中国银行实施的改良会计制度、完善行员选拔机制、重视信用调查等管理措施，使中行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注重观察国内外经济动态，时刻检讨国内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成为陈光甫推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的要诀。遗憾的是，受研究主题与论述框架的限制，上述成果所涉及的近代银行业危机防控研究，在史料发掘与细节梳理上大多未能充分展开。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危机防控机制变迁，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演变过程。在南京国民政府对银行业实现强力控制之前，银行公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在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郑成林、刘平等认为，作为全国势力最大的银行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在完善银行经营规则、推进信用制度建设、参与政府币制改革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意义。杜恂诚提出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方银行公会不仅是联系当地银行业内部关系的纽带，同时也在维护同业利益、维持金融稳定方面作用显著。各地商会亦是与银行业关系密切的行业组织，徐鼎新、虞和平、姚会元等人关于商会史的研究中就发现上海总商会在金融风潮中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奔走于政府、银行、钱庄、典当以及工商各业，组织联合应对，尽可能减小风潮的负面影响。

政府财政、金融制度与方针调整是导致银行业政策性危机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南京政府时期，随着银行业法规与制度的完善，银行业发展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中，受国家财政、金融方针的影响日益深刻。其中银行监管制度的演进是近年颇受学界关注的焦点。近代政府的银行监管起源于清末新政时期，1908年清政府在试图统一全国财政的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由载泽主持制定《银行通行则例》16条，初步建立起银行注册、稽核制度，尽管《银行通行则例》在银行组织形式、资本金经营监控等方面还有待补充或细化，但作为第一个银行监管法规，标志着银行业国家监管的开端。民国以后，银行监管制度继续发展并有所创新，监理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万立明、刘平不仅梳理了近代银行监理官制度的发展轨迹，还总结了监理官制度在监理权限、监理范围、监理实效方面具有的时代特点。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之后，银行业结束了央行制度缺失的时代，中央银行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实力与职能日益完备，石涛对抗战爆发前中央银行的组织结构变迁、业务与职能发展、与法币改革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对这一时期央行制度的发展给予了基本肯定。刘慧宇则对中央银行的实际作用稍显悲观，认为由于中央银行始终处于国民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受制于政府财政，几无独立性可言，非但未能在宏观调控、发展经济中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势头。近代银行监管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在监管制度演变的纵向研究上，姚会元、易棉阳认为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单一监管——双头监管——单一监管”的变迁过程，在变迁方式上表现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且二者之间为逆向交替关系。易棉阳的另外两篇文章则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点讨论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市场化监管制度向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化监管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认为行政化监管虽然克服了市场化监管成本高昂的缺点，但致使金融业进入国家专制状态，专制引致的社会损失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监管失效，金融崩溃。

与政府的关系状态是决定银行业能否有效防控政策性危机的关键。近代中国银行业因政府财政而生，依政府财政而长，在高额利润诱使下，银行业对政府财政大量透支信用，同时，政府为把控财源，亦试图通过金融政策甚至行政手段，实现对银行业的绝对控制。贺水金就认为，这种银行与财政合一的金融体制尽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运用效率，但也蕴藏着极大的资金危机，与财政的紧密结合是银行业金融风潮频发的重要根源。近代银行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拿捏与政府的关系时十分微妙，美国学者小科布尔、法国学者白吉尔以及吴景平等在研究不同时期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关系时认识到，聚

集在上海的银行家群体面对政府的压力甚或放诈时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深知与政府财政合流的政治危机，一方面又无法抵御政治投机带来的诱惑。事实上，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前后并不一致，邓先宏、张徐乐依据翔实的资料对北京政府时期政府与银行间的控制与反控制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总体上这一时期的银行业有逐渐脱离政府控制走向自主发展的趋势。杜恂诚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如此腐败，但银行业仍有长足的发展，其中银行与财政脱离，获得独立的发展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南京政府时期对银行业的国家控制政策，打断了银行业的自由发展历程，也为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种下了祸根。吴景平、陈礼茂、潘晓霞等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银行业立法及对银行业大规模注资与改组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如果说行业组织、政府干预都是外部危机防控机制的话，那么银行自身的危机防控措施则属于内部机制了。内部危机防控机制首先表现在制度建设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较早开始在内部防弊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人事管理，严格营业规章，规范会计制度，并在信用保险和信用保证制度方面进行变革尝试。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业舞弊案件迭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生硬乏变，这也迫使银行业认真考虑对信用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信用保证金为主要内容的“特种现金保证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否定而未能得到推广。周浩明把金城银行面临的经营危机分为社会危机、投资危机、制度危机等数类，认为科学的危机管理是金城银行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制度变迁视角观察，兰日旭认为，银行内部危机防控制度大致由早期诱致性变迁向南京政府时期强制性变迁的路径演进，经历了晚清的混合管理、北洋时期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南京政府时期的逐渐统一等三个阶段，其趋势是日益脱离自发演进轨迹，纳入政府干预的轨道。

制度设计之外，银行业在具体经营活动中的危机预防与应对措施亦是危机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徐鼎新、任绍敏、马长林等通过仔细梳理银行业的资金运用特征，发现混业经营、注重信用调查、加强人事管理等是各银行预防与分散危机的普遍措施。除此之外，北四行在发行、储蓄、贷款、信托、情报等方面互通有无、相互支持的联营政策是近代银行业分散经营危机的一大制度创新，联营壮大了整体资金实力，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也增强了资金安全。上海银行业之间的联合准备制度也从根源上避免了因个别银行发行准备不足导致的挤兑风潮。除了上述主动危机预防措施之外，李一期、龚关、别曼等人在研究近代银企关系时发现，当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资金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导致银企关系恶化的被动情况出现时，近代中国银行业还往往通过对债务企业实行监管、接管、信托管理、债转股等多种弥补措施尽量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

总体上看，已有的近代银行业危机防控研究，还存在以下有待突破的空间：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以个别银行及其金融风潮应对策略为主，对银行业危机防控机制的整体性、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较少，尤其在银行危机防控理论与制度的近代演进趋势、路径选择、阶段性特征的梳理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以静态的制度梳理为主，动态制度演进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诸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明晰，如近代银行业危机防控机制作为从西方舶来的银行制度，在中国本土商业网络中是如何发生变异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保人制度、商人个人信用、银行家私人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在危机防控机制中的角色与作用？此外，把近代民营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分析其合作互助、联合经营的内容特点，特别是揭示合作背后的矛盾分歧等方面，尚有不足。

二、本课题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基本结构

1.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课题成果以近代蜚声中国银行业的“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等具有代表性的民营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其既有共性又各具特点的危机防控机制和应对措施，同时对民营银行占会员主体的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在防控和应对各种危机中所发挥的诸如危机预警、团结协作、行业监督与规范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给予全面分析，大体包括几个层面：

一是近代民营银行在银行内部，为防范风险所逐步确立起来的经营理念、营业方针和规章制度，如稳健经营、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居安思危的经营策略，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人事和财务制度，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信用调查和放款管理措施等；

二是面对政权更迭、时局动荡、政策突变、外敌入侵乃至绑架勒索等社会危机时，这些民营银行如何根据自身情形采取应对措施，与各方势力周旋，以维护银行利益。在此过程中，各个银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处事风格，而这种风格往往又明显带有该行领导者个人性格的烙印，如陈光甫之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周作民之于金城银行等，这同样也是颇有意味的研究内容。

三是，作为银行业同业组织的上海银行公会，在民营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和突发社会事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对近代银行制度的确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也是本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本成果虽然以银行为研究对象，但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掌握详实可靠的史料，本成果充分利用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金融机构的档案资料，同时尽可能发掘使用尚未刊发的银行资料，特别是上海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力求言必有证，论从史出。

当然，在此基础上，适当借鉴银行学、管理学等理论方法，对近代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人事管理、资产负债、联合经营以及外部环境对民营银行制度形成与演进的影响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加强成果的理论深度。

2. 基本结构

本成果内容由八章组成，第一章和第八章分别为导论和结语，其他各章的主要内容为：

第二章，夹缝中生长的近代民营银行，主要介绍近代民营银行的出现和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并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前民营银行和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与矛盾。

第三章，抗拒停兑令与江浙财团的形成，以1916年沪上银行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为切入点，分析江浙财团的形成及其特

点。

第四章， 民营银行的同业互助与同业联营，包括银行间的日常经营中的资金融通、金融危机中的同业互助和四行联营等内容，这是民营银行抵御危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其中四行联营更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

第五章， 民营银行内部危机防控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归纳总结民营银行内部的危机防控制度，包括职员的专业化、保人制度的争议与完善、信用保险制度、业务监控制度等，不仅有益于当时的危机防控，也对银行制度的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为“调查与征信：对危机的预测和规避”、“联合准备与行业监督”，重点介绍上海银行公会在银行业防范和应对危机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所建立的机构或制度，在近代中国往往具有开创性和示范作用。

脚注和尾注

1. 沧：《金融之真谛》，《银行周报》第3卷第8号，1919年3月18日。 .

2. 此类回忆性质的文字包括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寿充一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吴经琬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数量巨大，不一一列举。 .

3.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 - 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兰日旭：《张嘉璈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拒兑风波》，《中国金融》2011年第22期。 .

4. 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姚会元：《中国币制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薛念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黄江华：《服务、信用、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 .

5. 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毛知砺：《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 .

6. 江绍贞：《略论陈光甫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史全生，徐亚玲：《论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培德：《论中国金融企业家精神—以陈光甫为例》，《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薛念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念文：《实用理性超越——陈光甫经营管理思想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7.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 - 193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平：《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王晶：《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 -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37 - 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8. 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

9.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

10. 孙建华：《清末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的成效与缺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

11. 万立明：《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官制度的发展轨迹及其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刘平：《近代中国银行业监管官制度述论》，《上海金融》2007年第6期。 .

12. 石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 - 1937）》，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 .

13. 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 - 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论抗战时期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论》，《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14. 姚会元，易绵阳：《中国政府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与特点（1900 - 1949）》，《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

15. 易绵阳：《民国时期金融监管演进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近代中国两种金融监管制度的比较：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研究》，《财经研究》2014年第1期。 .

16. 贺水金：《1927~1952年中国财政与金融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

17. [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 - 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法]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 -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 - 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18. 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徐乐：《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19. 杜恂诚：《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
20. 吴景平：《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姜虹：《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陈礼茂：《论国民政府对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银行的改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徐锋华：《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始末和角色定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潘晓霞：《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银行改组——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历史研究》2013年第期。
21. 孙建国：《论近代银行防弊制度设计——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防弊与信用保证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平：《上海银行业保人制度改良述略》，《史林》2007年第4期。
22. 周浩明：《金城银行危机管理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 兰日旭：《近代中国的银行内部监督机制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4. 徐鼎新：《旧中国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任绍敏：《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危机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马长林：《民国时期上海银行界的危机意识》，《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
25. 洪葭管：《“北四行”与四行联营事务所》，《中国金融》1988年第1期；立军：《“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田兴荣：《北四行联营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26. 郑成林：《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7. 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银行与企业关系》，《史林》1998年第3期；龚关：《清末至民国前期银企关系探究——以天津恒源纱厂与银行的关系为中心》，《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别曼：《近代中国银企合作关系模式与危机管理——以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历史实践为考据》，《求索》2012年第5期。
2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2.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2部分

总字数：8550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43%(3677) 疑似剽窃观点：(0)

1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 李婧(导师：王立民) -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 2009-05-01	13.1% (1117) 是否引证：否
2	北洋政府时期的私营银行 刘永祥 - 《社会科学辑刊》 - 2000-11-29	10.7% (912) 是否引证：否
3	20世纪初中国中央银行的筹设及其背景评析 刘慧宇 - 《江海学刊》 - 2000-10-30	4.8% (410) 是否引证：否
4	郑观应经济思想研究 游江海(导师：易大东) - 《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 2012-05-26	3.7% (319) 是否引证：否
5	19世纪8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续) 汪敬虞 - 《教学与研究》 - 1998-11-20	3.2% (273) 是否引证：否
6	h_35毕业论文送导师1 h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2-03-17	3.2% (273) 是否引证：否
7	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虞和平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1985-04-02	1.9% (165) 是否引证：是
8	殖边银行研究 王月峰(导师：戴建兵) -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11-03-20	1.9% (162) 是否引证：否
9	104753090328尹小叶：清末银行立法的内容特点历史地位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2-04-16	1.7% (142) 是否引证：否
10	近代中国外商银行买办群体分析 李晓春(导师：马陵合) -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06-05-01	1.3% (113) 是否引证：否
11	金城银行的机构设立及经营情况 苏利德; - 《内蒙古统计》 - 2013-06-28	1.3% (111) 是否引证：否
12	袁世凯政府振兴实业的措施 张学继 - 《历史档案》 - 1990-12-31	1.2% (101) 是否引证：否
13	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 张静如;赵朝峰; - 《新视野》 - 2012-03-10	1.1% (97) 是否引证：否
14	近代民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 刘永祥 -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09-05	1.1% (92) 是否引证：否
15	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	1.1% (91)

卢征良;-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2-15	是否引证: 否
16 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 卢征良;-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15	1.1% (91) 是否引证: 否
17 制度供给不足与山西票号的衰亡 张宇丰;- 《经济问题》- 2015-10-15	0.4% (32) 是否引证: 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二章夹缝中生长的近代民营银行

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家近代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此时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银行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凭借实力与特权，在中国金融业确立起优势地位。之后，晚清政府先后设立国家资本的户部银行（不久更名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享有“中央银行”的地位和特权，发展迅速。民营银行业借着一战前后的历史机遇，迅速成长，成为中国金融业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同时伴随着与各种势力的竞争和博弈，注定要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之路。

一、近代民营银行的成长环境

1.捷足先登的外国银行

银行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信用机构，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一般认为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在当时世界商业中心意大利建立的威尼斯银行。其后相继建立了米兰银行(1593)、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汉堡银行(1619)、斯德哥尔摩银行(1688)等。这些银行放款的主要对象是政府，且带有高利贷性质，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产生了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制银行。1694年由英国政府支持私人创办的英格兰银行，是最早出现的股份制银行。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纷纷建立，标志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

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银行是由外国人最先建立的。

在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银行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西方列强先是以资金支持本国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①不平等贸易，随后便直接在落后国家设立银行，从事更为贪婪的掠夺。通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年，外商银行便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同时在广州设立代理机构，1848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是最早来华的外商银行。此后外国银行接踵而至，诸如英国的麦加利、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1912年，外国在华银行总数20余家，分支机构80余处。截止1926年，外国在华银行总分行约达188处，遍布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福州、厦门、汉口、广州等通商大埠。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利用较为先进的经营手段，从事各种经济侵略活动。

早期外商银行，主要以英国为主，以经营国际汇兑业务为输入鸦片、输出丝茶服务，从中获利。故而在19世纪60年代贸易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纷纷倒闭或停业清理。甲午战后，配合在华投资设厂的需要，各外商银行尤其是美、日银行，强化了对中国金融经济的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政治借款，以及各种投资关系，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国的国家财政，把持了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部门，如关税和盐税；攫取了各种矿山的开采权，占据了中国基本工业的重要部门，如煤和铁；操纵了中国各地的交通命脉，形成了所谓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等。

外商银行在华资本虽然有限，却以下列方式获得巨额活动资金：第一，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乘中国金融组织与信用制度尚不发达之机，在中国境内发行大量纸币，赚取中国人财富；第二，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外国银行凭借其实力，吸纳大量华人存款，所付利息极低，甚至不付利息，反而收取“保管费”；第三，通过外债借贷与赔款经收，曾长期把持中国大部分关税和盐税。

外商银行运用这些资金，扶持本国在华进出口商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中国的铁路修筑；以苛刻的条件贷款给中国政府；扶植外商在华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经营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特别是租界内房地产的买卖；与各国在华保险业、航运业往来合作；等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危害巨大：（1）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90%掌握在外国洋行手中，这些进出口洋行又均与外商银行往来，所以外商银行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外汇兑，中国金融机构难以介入。同时，每日由汇丰银行公布的外汇行市，成为全国外汇市场的准则，使得中国货币对外购买力的标准操诸外人之手。（2）外商银行的资金运用，便利了外货的对华输入，扶持了各该在华企业，推进了与中国不平等经济关系的深化，严重扼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3）政治性借款侵害中国主权，助长内乱，阻碍经济发展。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贾士毅指出：“近自内乱频仍，国内经济界之机陞窘状，垂十余年而不获即安，国家财政，亦交受其弊。而帝国主义者，复利用军阀秘密贷款，助长内乱。有如二年五年讨袁之役，七年护法之役，十三年讨伐贿选之役，衅端一起，战费浩繁。彼且凭藉外资，昌言赎武，其中以袁世凯五国善后借款，段祺瑞西原借款及解决法国金佛郎悬案，为数尤巨”，“故每经战争一次，借款有加……国家损失至多。”

外商银行通过金融扩张，扰乱中国金融业，侵夺中国巨额财富，对国家安定和民族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对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却无力与之抗衡。

2.硕果仅存的传统金融机构—钱庄

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代表是票号和钱庄。清朝嘉道年间，随着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范围的日益扩大，以省输送现银之劳的异地间汇兑的需要因之迫切，票号隧应运而生。其经营者多为山西商人，故习称山西票号。钱业作为汇兑业的另一种形式在

清初发展起来，南方称之为钱庄，北方则称为银号。票号的兴起，在于解决异地间汇款问题；钱业的产生，则在于解决当地不同种类货币间的兑换问题。钱业资本不如票号雄厚，一般不在外埠设立分支机构，所以很少经营国内汇款业务。不过，二者日后对存放款业务皆有涉足。

鸦片战争后，钱庄势力有所增强，主要是外商银行扶持所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国银行接受钱庄签发的庄票，使之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信用凭证；并同意向钱庄融通款项，即拆票。此举是出于便利向中国推销商品与购买原料，以及加强对中国内地的金融辐射，但也使钱庄通过“票贴”与扩大信贷而获丰厚利润。

拆票是外国银行对钱庄的一种信用放款，一般两日一结，银行如有需要，得随时要求钱庄付还。当时钱业活动的资金，大部分依赖外国银行的拆票。外国银行因游资过多，极愿以资金供给钱业，使外国商品畅行中国，又以资金借贷操纵钱业，使之成为外国银行的附庸机关。钱业与外国银行的这种拆票关系，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始行停止。此后，外国银行仍对钱业放款，只不过已由信用放款改为抵押放款。

第二，在银两与银元并行的币制下，两元之间需要兑换。银元合银两的市价称洋厘，钱庄间互相拆借银两的利息则称日息。两者都由钱庄同业决定。外商银行对此予以遵行，给钱业以支持，使后起的中国新式银行也相照遵行。上海的洋厘行市对各城市都有影响，上海的日拆行市更成为各行庄存放款利率的基础，并对各地利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三，1890年钱庄同业在上海成立汇划总会，建立公单制度，革除了原来各庄分头轧账的结算方式。该制度规定各庄收付在一定数额以上者，凭公单在汇划总会轧差，余额收付现金。外商银行亦委托汇划总会清算票据，其他非会员行庄及新式银行也参与期间。

在许多场合，钱庄对外商银行利用放款操纵中国金融市场，采取了一致行动，起着助手的作用。早在1875年10月，钱庄就曾与外商银行协调行动，押存银元，抬高厘价。1881年，上海的中国钱庄又和外商银行一起，利用收缩放款手段，从市场上抽回170万两现银，其中外国银行抽回10万，其余由钱庄包抽。结果使本地市场利率，几天里升至30%(年利率)，借款的中国人因此付出3倍于正常时期的利率。1888年上海的英国领事报告说：“外国同业(指外国银行)对于本地的主要钱庄也是很熟悉的。他们偶尔也给这些钱庄以期限极短借款，而外国同业临时遇到周转困难，也不是没有受到过这些钱庄同样的帮助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显然低估了这个时候外商银行对中国钱庄的作用，后半部分所透露的真情，则吻合当时的情况。

钱庄借助外商银行的支持，左右金融市场，对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受制于外商银行的局限性、投机盈利性以及过度扩张信用的经营方式，使之经常受到信用危机的威胁，并直接影响金融与商业。

票号同钱庄一样，亦无力与外商银行抗衡，反因和清政府关系过密而走向衰败。票号最初只为商人办理埠际间的汇款，后来又有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各省协饷需输送中央，中央也有款项要汇往各省，便都通过票号办理。1867年，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农民起义，向上海洋商借款120万两，此项现款即由山西票号汇到山西运城。除汇兑外，票号也经营存款和放款。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对象主要是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甲午战后，票号发展达到顶峰，每年之放款利息、汇水等项收益达二三百万两左右，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新疆、库伦、广东、香港等边远地区，甚至远及日本、朝鲜等国。

票号对政府的过份依赖，加上经营管理制度十分保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光绪年间各省官银号及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相继设立，票号所做公款生意多被夺走。票号放款专重信用，不用抵押，一经变乱，所放之款难以收回。当时银行吸收存款，利率6-8厘，票号则死守2-3厘或不行利的旧例，存款因之减少。面对不利形势，票号墨守成规，不思改进。待到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票号损失甚大，纷纷倒闭。领袖太谷、祁县、平遥票庄50余年，曾为全国金融业瞩目的志成信票号，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票号改组为民营银行号者为数极少。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遂绝迹于中国金融界。

3. 民营银行的建立与发展

外国在华银行犹如巨大的吸盘，吸附在中国本已贫血的肌体上。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等，则因自身的局限，难与外商银行一争短长。因此，清末有识之士纷纷著文立说，提出建立银行的主张。发展工商业，抵制外商银行侵略，挽回利权，是他们要求建立银行的主要目的。

陈炽认为，银行是发展生产，扩大流通，开展通商的必要条件，“通商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特别是在国门已开，对外通商的情况下，不设银行是“断断乎不可”。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家好比人的身体，西方列国因设立银行而“百脉贯通，血脉周流，精神焕发，无论登高履险，无难色，无戚容”；中国既无银行，又不思急创银行，则上欲筹饷，人易我难，下欲经商，人通我塞，犹如“手足惰羸，筋络痿痹；血多之处积而成痼疽，血少之处枯而为瘫痪；不和不活，不均不平”。因而中国与列强较量，“如以病夫敌壮夫，岂能与之长而较短”。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银行上》中强调，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总枢纽，可以融通资金，保证生产、流通的顺利进行，“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他总结了兴办银行的十大好处：“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为转移，不致败坏市面，商务借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共约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库存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薪资，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有此种种便益，是国计民生所交相倚赖者也。”他认为，外国银行招收华股，却不替华商办事，虽有华商股份，却不与华商往来

，实为“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

御史张仲忻在请设银行的奏折中称：“大利之源，莫急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先于银行。”他针对办银行“事重而难举，款多而难筹”的言论，指出：如果下决心去办，“不一年银行可成，不三年而商务毕举。货亏之数，岁可减三四成；入官之款，岁可增一千万；十年之久，进出必能相抵，而国家可岁溢万万。揆度勾稽，确有把握。”

梁启超以日、美为例，从设立银行、发行公债有利于振兴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建立银行的必要性。他考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颇有感触地指出，日本能有今日全国经济的日益发达，就因取法美国，走发行公债、百姓开设银行之路。这两件事密不可分。银行愈多，竞争愈盛，利率愈减，愈便利投资者，工商业便日益发达。

监生陈鐸勋认为创设银行可以抵御强敌，堵塞漏卮：“当今之世，内忧迭起，外患丛兴，法既虎视于南，俄欲鲸吞于北，复有英、德、美、奥诸大国眈眈窥伺，欲抵其隙而逞其谋。苟欲震我国之威灵，泯外人之侵夺，守四海太平之局，保万年不拔之基，则亦有要道焉。要道维何？振兴商务是也……然则商务者，非与国家相维系而足以致富哉？至我国商务即兴，则非银行无以收转圜之益。且利权外溢，纯属漏卮，故创设银行实有刻不容缓之势。”

盛宣怀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创办者，更把抵制外国银行的侵略作为兴办银行的重要目的加以强调。他认为：“银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通商以来，“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中国只有自设银行，才能“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并可由银行代理国债，替代洋债，从而“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磅价之亏折，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但使华行多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

千呼万唤，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此时已是英国丽如银行设立52年、汇丰银行设立32年之后。

中国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向户部借银100万两，作为开办支垫资本(1902年还清)。到当年末，实收资本213万两。其中盛宣怀任督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天津电报总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10万两，盛宣怀本人和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73万两，以上占实收资本总额的76.5%。总行设总董9人，由张振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果、施则敬、严信厚、朱葆三、严澧担任，严澧为驻行办事总董。他们均非股东选举产生，而是由盛宣怀个人指派。该行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不但内部制度一仿汇丰银行的办法，而且延聘英人美德伦为总行洋大班，上海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业务大权由洋大班掌握。

通商银行成立当年即在汉口设立分行，次年在北京、福州、天津、广州、镇江、烟台、汕头、香港设立分行，1899年又设分行于保定和重庆。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清政府还授予其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并代收库银。1899年底，存款397万两，放款582万两。

通商银行为中国近代银行之嚆矢。其后，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为第一家由国家经营的银行。1908年，邮传部奏请成立交通银行。为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在各省成立了一批官银钱局(辛亥革命后大多改为地方银行)。在此期间，不少私人集资创办商业银行，规模较大的有：1906年无锡人周廷弼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1907年镇江人尹寿人创办的信义银行，同年浙江铁路公司为自办铁路筹集股款设立的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改称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宁波人李云书在上海创办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到1911年，中国人自办银行30余家，其中民营银行17家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12年，即新设银行24家。1912 - 1927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20余亿元。1921 - 1923年间，是银行设立的一个高峰期，有113家银行成立。从历年实存银行数和实收资本总额来看：1911年末，实存银行16家，实收资本总额2156万元；1916年，实存银行47家，实收资本总额3842万元；1920年，实存银行增至103家，实收资本总额增至8808万元；1925年，已有158家银行，实收资本总额更高达16914万元。中国银行业已初具规模。

其间，民营银行的发展尤为显著。1912 - 1927年，全国新增民营银行186家，除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被兼并者外，1927年时已站稳脚跟并达到一定规模的仍有51家。1912年全国民营银行资本总额为3600万元，1920年增至5100万元，1925年升至15800万元，十几年间增长了3.4倍。再从存款额来看，据估计，1920年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约为5.7亿元，其中民营银行约为3.2亿元。

这一时期民营银行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银行业发展的条件。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曾摆出发展经济的姿态，一度将内阁中工商、农林、教育、司法等若干部门交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刘揆一当上工商总长后，多方奔走，联络工商，主持拟订了《工商部之计划》，提出一系列保护和提倡工商矿业的方案。他强调“**务以剔除官习，融洽商情为主**”，**电聘上海求新机器厂朱志尧、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等人担任工商部顾问，以期献计献策，振兴实业。**在职期间，还主持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来自各地工商机关团体的168位代表，共提交有关议案百余份。刘揆一未及实施其宏伟计划便去职，继任者张謇进一步确立了对工商业的扶植政策，强调发展工商一要发挥法律的保护作用，二要发挥金融的资助作用，三要制定合理的税则，四要实行奖励政策。他在任期内先后制定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公司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保护华侨条例》等20多种工商法律。这些法律、条例的颁布和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对促进工商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正如当时一家实业杂志所说：“**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欣，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在1840到1911年的72年中，共953家，而1912到1927年的16年中，即达1984家。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更

多的金融机构调节金融，融通资金。

激烈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变革，淘汰了汇兑业上有极大势力的票号，带有地方垄断性的各官银钱局亦大量停闭。钱庄业也一度遭受严重打击，“当时上海钱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绝无保全自卫之策。加以人心不定，商业凋零，钱庄营业，无形停顿。故至1912年2月，南北市汇划钱庄上市者仅24家，比较橡皮风潮以前南北市钱庄的数目，竟骤然减去十分之七”。旧式金融机构被淘汰或一度受挫，给民营银行以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1914 -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造成了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金融市场上一向财大气粗的外商银行，由于暂时失去了本国经济力量的支持，也在资金周转方面发生困难，一些战败国银行如德国的德华银行甚至垮台倒闭，存款不能提取，信用大坏，损伤了外商银行在中国客户中的形象，使其一部分存、贷款业务逐渐转到中国国内银行。当时有评论称：“在前清季世，我国富有之士，均视外国银行为稳固无比，故大宗存款，为数甚巨。自辛亥之变、青岛之役后，一般有存款者，均已感其苦痛，已无复昔日之信用矣。年来在外国银行存有巨数款项者，大都自营生产事业，相率提回，逐渐减少……近年大宗存款，固不多见，即零星存项，亦渐趋于本国银行。是故今日之外国银行，其收集我国之存款，已不若昔日之盛”；“近年本国银行，日兴月盛，国人之崇拜外国银行者，已有舍彼就此，逐渐转移之趋向，此亦银行业之曙光也。”

第三，政局混乱，各派纷立，尤其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毫无权威可言，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发展的窒碍相应减弱，银行的经营也较清末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同时，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北京政府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除了举借外债，还大量对内发行公债(包括库券)，巨额公债经各军阀之手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银行资本或工业资本，有利于银行及某些产业部门发展。

二、近代民营银行与政府

在民营银行产生、成长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历任当权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营银行业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银行业的运营方式。

华资民营银行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在企业民营化成为社会主流，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银行都出现商办倾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这种联系也未曾被割断过，众多民营银行家的官商双重身份成为联结民营银行业与政府的媒介与桥梁，而两者之间始终是一种建构在利益基础之上的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博弈关系。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1. 银行
银行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信用机构，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
2. 麦加利、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1912年，外国在华银行总数20余家，分支机构80余处。截止1926年，外国在华银行总分行约达188处，遍布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福州、厦门、汉口、广州等通商大埠。
3. 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利用较为先进的经营手段，从事各种经济侵略活动。
早期外商银行，主要以英国为主，以经营国际汇兑业务为输入鸦片、输出丝茶服务，从中获利。故而在19世纪60年代贸易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纷纷倒闭或停业清理。甲午战后，配合在华投资设厂的需要，各外商银行尤其是美、日银行，强化了对中国金融经济的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政治借款，以及各种投资关系，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国的国家财政，把持了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部门，如关税和盐税；攫取了各种矿山
4. 占据了我国基本工业的重要部门，如煤和铁；操纵了中国各地的交通命脉，形成了所谓各国在华势力范围，
5. 资金，扶持本国在华进出口商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中国的铁路修筑；以苛刻的条件贷款给中国政府；扶植外商在华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经营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特别是租界内房地产的买卖；与各国在华保险业、航运业往来合作；
6. 政治性借款侵害中国主权，助长内乱，阻碍经济发展。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贾士毅指出：
7. 外商银行通过金融扩张，扰乱中国金融业，侵夺中国巨额财富，对国家安定和民族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对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却无力与之抗衡。
8. 银两与银元并行的币制下，两元之间需要兑换。银元合银两的市价称洋厘，钱庄间互相拆借银两的利息则称日息。两者都由钱庄同业决定。外商银行对此予以遵行，给钱业以支持，使后起的中国新式银行也相照遵行。上海的洋厘行市对各地城市都有影响，上海的日拆行市更成为各行庄存放款利率的基础，并对各地利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9. 1890年钱庄同业在上海成立汇划总会，建立公单制度，革除了原来各庄分头轧账的结算方式。该制度规定各庄收付在一定数额以上者，凭公单在汇划总会轧差，余额收付现金。外商银行亦委托汇划总会清算票据，其他非会员行庄及新式银行也参与期间
10. 在许多场合，钱庄对外商银行利用放款操纵中国金融市场，采取了一致行动，起着助手的作用。
11. 利用收缩放款手段，从市场上抽回170万两现银，其中外国银行抽回10万，其余由钱庄包抽。
12. 过度扩张信用的经营方式，使之经常受到信用危机的威胁，并直接影响金融与商业。
票号同钱庄一样，亦无力与外商银行抗衡，反因和清政府关系过密而走向衰败。

13. 存款和放款。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对象主要是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甲午战后，票号发展达到顶峰，每年之放款利息、汇水等项收益达二三百万两左右，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新疆、库伦、广东、香港等边远地区，甚至远及日本、朝鲜等国。
14. 该行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不但内部制度一仿汇丰银行的办法，而且延聘英人美德伦为总行洋大班，上海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业务大权由洋大班掌握。
15. 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12年，即新设银行24家。1912 - 1927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20余亿元。

脚注和尾注

1. 又译东方银行、东洋银行、东亚银公司等，后改称东方银行公司。
2.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页。
3.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8 - 129页。
4.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5. 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页。
6.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4页。
7. 《张仲忻请设银行折》（1896年1月19日），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3页。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8），中华书局1932年版。
9. 《陈鐸勋致盛宣怀函》（1896年11月24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16 - 17页。
10. 《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划折附片（1896年11月1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 - 4页。
1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12.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13.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A7 - 8页。
1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6页。
15. 《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5期，引自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页。
17. 徐沧水：《论今日在华之外国银行》，《银行周报》第1卷第18期。

3.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3部分

总字数：8337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12.5%(1046) 疑似剽窃观点：(0)

1	略论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 潘国琪,柳国庆 - 《浙江社会科学》 - 2000-07-05	3.0% (253) 是否引证：否
2	民三公债新探 刘晓泉;余桔云;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2008-06-15	2.1% (174) 是否引证：否
3	2012010923_刘杰_博士_历史文化学院 刘杰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27	2.0% (166) 是否引证：否
4	北洋时期的国地财政划分（1912—1927年） 段艳(导师：周建明) -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05-06-30	1.9% (156) 是否引证：否
5	陈光甫与民国政府 徐昂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6-04-01	1.7% (144) 是否引证：否
6	中国基础教育网-历史-史学动态-学术前沿 - 《网络（ http://www.cbe21.com ）》 - 2010	1.4% (114) 是否引证：否
7	经济发展与中国近代银行业结构的演化——基于1918-1936年市场集中度的实证分析 王玉茹;苗润雨; - 《财经研究》 - 2011-06-03	1.4% (114) 是否引证：否
8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吴景平 - 《史林》 - 2002-05-30	1.3% (108) 是否引证：否
9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 豆丁网 -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ww.docin.com ）》 - 2012	1.3% (108) 是否引证：否
10	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 杜恂诚; -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 1989-04-02	1.2% (100) 是否引证：是
11	张恩蓉-2008101060016-法学院 张恩蓉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3-10-25	1.2% (97) 是否引证：否
12	早期华资银行业研究（1897—1927年） 易绵阳(导师：周建明) -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04-04-01	1.1% (95) 是否引证：否
13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4)_金融研究论文	0.8% (70)

- 《网络 (http://www.reader8.c) 》 - 2012		是否引证：否
14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 杜恂诚; - 《历史研究》 - 1989-04-15	0.8% (67) 是否引证：否
15	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 杜恂诚 - 《中国社会科学》 - 2000-03-10	0.8% (67) 是否引证：否
16	试析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及思想 (1859 ~ 1927) 朱晓辉(导师：王宏治) -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 2002-05-01	0.8% (67) 是否引证：否
17	北洋政府时期的银政关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杜恂诚 - 《东方早报》 - 2014-01-07	0.8% (67) 是否引证：否
18	江海关二五券会运作及作用评析 李凯伦; - 《唐山学院学报》 - 2018-07-20	0.7% (59) 是否引证：否
19	论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关与内债 戴一峰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1994-12-15	0.6% (54) 是否引证：否
20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 吴景平 - 《近代史研究》 - 2000-01-27	0.6% (48) 是否引证：是
21	经济学院 1120120668 孙文娜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14	0.5% (40) 是否引证：否
22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 (1897-1937) 刘杰(导师：郑成林) -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2015-05-01	0.3% (29)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1. 民营银行与政府的合作与矛盾

不论是晚清、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营银行业都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里选取中国通商银行、金城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家银行作为代表进行分析，原因在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前所述，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史上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作为通商银行的创办者，盛宣怀从一开始就不断强调商业银行的独立性，而排斥官府对于企业过多的干涉。在他的奏折中曾这样写到，“**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而图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若“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这并不是盛宣怀一个人的主张，通商银行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严信厚也认为“银行既照商办，不宜请领**官本，……官商隔阂，至今如故。若银行领有官本，商股必然裹足**”。而清政府并不愿意放弃所有的权力，在盛宣怀提交了草拟的通商银行章程之后不久，总理衙门即予以严厉的驳复，诘问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点：其一，盛宣怀力主商办，如果将来办理不善导致亏损，则由谁负责？其二，总行设在上海而非北京有“外重内轻，不足以崇体制”之嫌；其三，仅以利润二成报效国家太少，当“于官利公积花红之外，按十成分派，提五成报效公家”，铸币获利要另提加成报效；其四，“又闻**英国国家设有要需，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二厘利息贲成汇丰，便可咄嗟立办，现在银行开设后，能否照此办理**”；其五，银行“所有存借进出之款，在十万两以上者，除汇兑外，应随时报明立案”。

表面看来，政府似有监督管理之意，但事实上其控制甚至是勒索的企图已清晰可见。盛宣怀据理力争，援引西方银行制度一一回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作出丝毫让步，比如他坚持“京都既非通商码头，股份不多，又无总董”，若设为总行则“势必隔膜”，于经营不利；又“西国银行并无以余利报效国家，亦无进项税捐，惟银行派利于股份之人，股份之人自缴进项税，照别项生意一律”政府若向银行借款当与西方一样“利息多寡，应照随时市价核议”；再有关于大项银两进出随时上报之要求不仅“烦琐难行”，还有可能使银行因为无法保密而丧失客户。总之，盛宣怀希望这家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能够完全由商人掌握，而不像“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许多企业那样因为官府干预控制过多而致使“商人裹足”。的确，在总理衙门驳诘的内容外传之后，很多商人因担心银行成立后被政府勒索而不敢投资入股，甚至要求退股的就高达六七十万两。在这种局面下，总理衙门只得妥协，声明“本处目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不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巨大压力和其他可能得到的好处，政府也并不希望通商银行半途而废。

尽管盛宣怀一直主张银行要“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抵制官股和政府对于银行经营管理的介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事实上，通商银行从创建伊始就不断地在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收益。首先，成立之初“请存官款”以扩充资金来源。该行章程中即写明“本银行系奉特旨，招商合力兴办，公议拟请户部拨存生息公款二百万两，以示官商维系取信中外。开办之初，先收商股二百五十万两，准领生息公款一百万两，余俟续收商股时再请拨领”。户部从国库拨发的一百万两公款显然不是小数目，毕竟通商银行的股本也不过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以“存款”而不是股本的形式吸纳官款使盛宣怀达到了两个目标：不必因为官股的存在而受制于政府，同时又得到了政府资金方面的大力援助，这种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特权的象征和通商银行信用的保证。

其次，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设立国家银行，通商银行因此争取到了一些本应属于国家银行的特权，比如代理国债、发

行货币、收解汇兑官款等等。盛宣怀就曾要求户部通知“**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中国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以符事体而树风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兴修铁路而大量举借外债，在盛宣怀的争取下，一部分外债存款被存放在通商银行。1903年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美商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其中明确规定“银钱往来在中国境内由中国通商银行经理”，到1905年底，仅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就达二百五十四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而“银行近年进出不过三五十万，自官保照约存路款两宗后，骤添二百余万，其救银行不浅”。由此可见盛宣怀在创办通商之初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不愿政府插手银行的经营和管理，而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借助于官府的力量来推动银行的发展，这种两难的处境在通商银行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作为一家民营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还稍显特别，其创办者盛宣怀为李鸿章幕僚，早年办洋务起家，与朝廷一直关系密切，他的存在使通商银行与政府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是其他民营银行所不具备的。但是，从此后民营银行业的发展来看，与当权者保持一定程度的密切联系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尤其如此。

成立于1917年的金城银行，其发起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军、官僚及其代表，如安徽督军倪嗣冲（由其子倪幼丹出面）、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致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长芦盐运使段谷香、山东财政厅长曲荔斋、陆军部经手发放军饷的陈星楼；而另一类是与官僚、军阀有联系的交通银行当权人物，如总行协理任振采、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总行稽核课主任周作民等。这使得金城银行不仅有充实的资本，还在公债投机等领域有灵通的消息，“以民营形式，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发展极其迅速”。安福系军阀的失败虽然一度影响了金城银行的业务发展，但在周作民的主持之下，这种不利影响很快消除，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吸引些中小户股东并扩充行股。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又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与政府一直往来密切。在“北四行”的其他三家银行中也不乏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但都不及金城银行这么广泛。

与各地军阀、官僚的这种关系使得金城银行不论在政界还是商界都如鱼得水，它的策略是极其灵活的，当最初依附的安福系军阀失败之后，金城银行很快就寻找到了新的可以依托的政治力量。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许多近代民营银行家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著名的一些民营银行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与政府或某些政治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早金城银行两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然与北洋军阀政府联系不是很多，但其早期股东中有几位也特别值得关注，比如时任江苏都督的程雪楼、北洋政府官员梁士诒以及孔祥熙和“宋老太太”。据相关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特别嘱托孔祥熙代自己投资入股一万元以示对陈光甫的支持，而“宋老太太”是宋子文的母亲，这种微妙的关系将陈光甫与一些政界人物进而是政府联系在了一起。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洋政府日益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银行家不得不为自身日后的出路作出新的打算，陈光甫是最早向蒋介石示好的金融界人士之一。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曾亲自给陈光甫和时为四行储蓄会重要负责人的钱新之写信，“新之、光甫二位先生大鉴：……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1927年2月初，陈光甫、钱新之二人联合向蒋介石借款50万元，数额虽不多，但其政治立场已鲜明可见。

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党政权后，立即任命陈光甫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该组织“以上海金融业人士为核心，**其性质和作用有一变化过程**”，它“**最初只是蒋介石委派的筹款团体，尚不具有政府机构的性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行政机构，通过筹集垫款和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而以陈光甫为首的一批上海银行家在蒋介石政权早期的筹款及公债发行等工作的开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陈光甫还曾被任命为公债委员会及预算委员会委员、盐余库券劝募委员、整理公债委员会评议委员、棉业统制会常务委员兼主席等职务，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时还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提议下当选为中央银行理事。由此可见陈光甫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陈光甫愿意放弃商业银行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个重要营业方针即为“不可接近官场”，他们对于“接近官场”可能造成的后果有十分冷静客观的判断，在一份行内密字通讯中即有这样一段评述：“**山西票号为我国旧式银行之起源，当其盛也，实握全国金融之枢纽，而其败者，则竟一蹶而不可收拾**。考其最大原因，即在结交官场，而放款于不負責任之官吏，一时虽持其势而盛气凌人，曾几何时革命军兴，皆成倒账。平日基础全毁于空中楼阁之官场，而非筑于永久坚固之社会，终至随政治舞台而灭亡。往事不远，可以殷鉴。此外，自**民国成立以来，年有政变，而新式银行之转入于政变漩涡者，一起一伏，又不知凡几，而亦无需明举也，则吾人尤有不闻谈虎而色变者乎**”。可见和政府合作的同时，银行也不无忧虑。

中国通商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家银行并不是特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近代华资民营银行某些共同的行为特征，一方面，它们千方百计地试图与当权者建立某种联系，以便为自身的发展寻求政治上的依靠和支持，而另一方面，民营银行的经营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应该适当保持商业银行的独立性，不能将银行的命运同某一个政权完全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两难的境地和充满矛盾的行为方式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2. 民营银行与政府的博弈

近代民营银行业与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应当看到的是，合作只是两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合作的同时，银行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重重的矛盾，而“利益驱动”是这场博弈得以维系的真正原因。

首先是银行家的双重身份。民营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有两个最直接的表现，其一是些银行的股东中不乏军阀、官员等政界人物，这一点前文已多有提及；其二则是一些著名的银行家兼具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民营银行的经营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在政府或官方银行里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北四行”、“南三行”这七家当时最为著名的民营银行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

在这七家最著名的民营银行中，除了浙江兴业银行与政府联系相对较少之外，其余几家银行的高层领导人都与政府往来

颇多，经常同时兼任一些重要的官方职务，甚至有的几乎一直是官场中人，比如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而这种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并不是只存在于“北四行”、“南三行”之中的特殊现象，在其他的民营银行中也不少见。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初创阶段的领导者盛宣怀与清政府关系非同寻常，本身即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持该行行务的傅筱庵曾在辛亥革命后担任财政部总参议及沪关清理处长，积极投靠北京政府，一度支持孙传芳进攻蒋介石的北伐军部队。而有的民营银行虽然经营者本身并未担任官职，但与官场不乏交往，如主要致力于西南地区发展的聚兴诚银行，其总经理杨聚三素以“不卷入政治”相标榜，从不涉身仕途，但他先后延聘北洋政府国会议员黄墨涵、直隶省代省长任望南、四川省财政厅长龚农瞻、董庆伯以及曾任旧军政界高级职务的李维城等人担任聚兴诚银行的总经理、协理、秘书长、经济研究室主任等职务，银行借助于这些人的力量提高声望、拓展业务。

总体而言，近代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些民营银行的经营者都与历届政府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甚至本人直接兼任某些官方职务，这种双重身份成为联结民营银行与政府的媒介与桥梁。

其次是建构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作为微观行为主体，民营银行选择与政府合作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对其中潜在收益的预期。以往的一些研究倾向于从民营银行家的阶级属性角度分析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出发点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的矛盾。民营银行是一种微观经济组织，其目标函数与政府是不完全相同的。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历任当权者都愿意与银行往来以获取财政上的支持，而银行家们，特别是华资银行家也乐于结交政府，企图借助于政治力量促进自身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利益是他们关注的第一要素。两者的确不乏合作的动机但目标的不同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必然充满矛盾和不稳定性因素。

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时这一矛盾就有所体现，盛宣怀一方面想得到清政府的存款支持和货币发行等特权，另一方面又极力抵制官股的渗透，力求银行经营管理权的独立，而清政府最关心的只是能否从通商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利润的回报。北洋政府时期，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人之所以相继离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银行角色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面创办自己的民营银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到了官场的风险和官办银行的身不由己，供职于官办银行终不是久远之计。但他们仍愿意保持和政界高层人物的密切关系，这不仅为民营银行赢得了一批大客户，还可以在一些时候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支持以至灵通的内部消息。作为经营者，民营银行家们是非常识时务的，他们向当权者的这种靠拢绝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常留意、搜寻可以合作的对象，为自己日后的发展留下退路。以金城银行为例，金城银行最初靠安福系军阀的支持而起家，1920年7月安福系失败后，该行抬出依附奉系的梁士诒担任总董，1922年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失败而告终，金城银行又抬出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总统府收支处长的朱铁林当总董，以此来协调各方的关系。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洋政府的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局势日趋明朗之时，民营银行家们又纷纷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武汉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建立联系，最终以对蒋介石的巨额资金援助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从而确立了与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关系。

银行家们的目的简单而直接，他们并不是狂热的政治人物的追随者，而只是希望借助于新的政治力量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点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蒋介石到达南京并建立政权之后，曾希望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担任财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委员、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但陈光甫力辞，他在写给部下的信中这样写道：“弟以专心本行业务，当此时局，尤不愿兼顾外事，当已将财次、财厅、政治委员三事辞去，唯财政委员一事，尚未能完全摆脱，痛苦已极，如熟友及与我行有关系之人问及希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是所拜托”。在陈光甫促成的上海金融业为蒋介石筹集军费的垫款合同中，亦明确规定要严格按照商业原则充分保护债权方的利益，后来支持蒋介石的银行家们还如愿以偿地建立起了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以确保公债的还本付息。由此可见，这原本就是建构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民营银行家们支持当权者，但这种支持显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遗憾的是，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兑现自己所有的承诺，正如学者小科布尔所指出的，蒋介石把征收庞大的军事费用问题看得高于一切，至于用什么手段去征集军费他是毫不在乎的，当合作的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他可以敲诈勒索，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公开推翻政府的庄严保证，甚至可以把所需要的银行资产控制权直截了当地掠夺过来。这已是民营银行家们始料未及而又无法左右的事情了。

三、民营银行业与政府公债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历任政府困窘的财政状况都使得公债成为联结政府与私营银行的一个重要途径，高额利润的诱惑和投资途径的匮乏是促成银行界大量投资于政府公债的关键要素。当权者无止境的资金需求和日趋强硬的态度使私营银行业逐渐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场博弈在推动了私营银行间合作的同时，也对后者的经营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政府公债与民营银行业的发展

为了结交政府和谋求利润，近代民营银行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运用到了政府身上，国内较早对近代银行业进行研究的学者张郁兰先生就曾指出“中国的银行和财政的关系最为密切”，“财政对银行的依附性和银行对财政的从属性”是近代华资银行业的突出特点，公债成为这种关系的一个载体。具体而言，晚清时期政府发行的公债并不多，一共只有三次：其一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因“海防吃紧”，户部建议仿照借外债办法向本国“官绅商民”举借公债，即所谓“息借商款”；其二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偿付对日赔款而发行的“昭信股票”；其三是清朝灭亡前夕为筹备军费而发行的“爱国债”。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捐输、报效的痕迹，而“至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中国才有较具近代公债形式的公债”。而且，晚清时期华资民营银行业还刚刚起步，这几次公债都不是由民营银行承销或购买的。因此，讨论政府公债对民营银行业的影响，关注的重点应当是民国以后的情形。

北洋政府上台之初，常通过大量外债弥补财政用度不足。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举借外债变得日益困难，而军

割据局面的形成又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得到保证，于是，向国内的华资银行发债、借款就成为北洋政府弥补财政收入甚至是维持日常开支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财政部发表的“发行债券理由书”中即可得到印证：“吾共和国建设以来，政变纷乘，政府预算迄未成立，收入多被截留，支出漫无限制，入不敷出，库亏之数逐年增加。初或借用外债以资弥补，至民国八年，外债无可再借，于是始向国内外银行起零星短期借款”。关于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公债的具体数量，不同的学者统计结果也稍有区别，但这些微小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银行业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按照千家驹在《中国的公债》一书中的说法，从1912年到1926年，财政部一共发行了元年军需公债、爱国公债、四年特种公债、七年短期公债、整理金融公债、九年赈灾公债、九六公债等合计27种债券，实发行额为610 069 588元。1922年以后，北洋政府还发行了很多库券，库券的特点是发行的频率高而每次发行的数额少，一般只有几百万元，大多用于临时性应急支出，譬如用于使领馆经费、治安维持费、发放积欠的学校薪金等。

为了取信于公众，北洋政府于1914年成立了内国公债局，专门负责公债的劝募、收款及还本付息事宜，由财政部1人、交通部1人、税务处派税务司洋员2人、中国银行总裁、交通银行总理、中法银行经理洋员、保商银行经理洋员、华商殷实银钱行号经理2人及购买债票最多者6人，共16名“华洋人员”组成董事会，并选出总理1人、协理4人主持日常事务。公债局任命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担任“会计协理”，所有公债局收存款项、预备偿本付息及支付存款均由安格联经理，“一切关于公债款项出纳事务，除经总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同时规定公债还本付息之款项须交由指定的外国银行存储。虽然公债基金的保管权由外国人把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在定程度上提高了北洋政府的债信。尽管如此，北洋政府发行的债券中还是有很多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因为发债之初指定的偿还基金就不确实。

除了公债和库券，北洋政府还有大量借款，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盐税为抵押的“盐余借款”，北洋政府以盐税为担保的借款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能收缴的盐税；第二种是国内银行的短期借款，利率高期限短，条件十分苛刻；第三种是国内银行的垫款，这种方式连借款合同都不用签订，因而利率极高。在这些借款当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承担的较多，而其余的债权方则主要是国内的华资私营银行。

近代的民营银行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当然与当时民族资本工商业的一度繁荣有关，但是北洋政府大量公债的刺激作用也同样值得关注。时人曾有这样的评价：“……自内国公债盛行以来，国内银行界遂大行活动，不惟风起云涌，新设之数骤增，且有专与政府交易而设立之银行。虽迹近投机，然实因政府借债，利息既高，折扣又大，苟不至破产程度，则银行直接间接所获之利益，固较任何放款为优也”。“东西各国普通利率不过六七厘，其超过一分者已属仅见。政府需款孔殷，暂予重利，本非不得已，詎料各行昧于国家观念，视为投机事业，巧立回扣手续汇水各项名目，层层盘剥，与利息一并算计，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实骇人听闻”。北洋政府时期，新增银行的数目是相当多的。而因为公债投机的缘故，很多新设的银行并没有开设在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而是开设在了作为政治中心的京津一带。

银行业对于大量投资于政府公债的风险并非毫无认识。1919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宣布，如果“政府对于财政计划设无根本上之改革，则银行界对于中央或各省借款凡流用于不生产事业者概不再行投资”。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 1. 财政部1人、交通部1人、税务处派税务司洋员2人、中国银行总裁、交通银行总理、中法银行经理洋员、保商银行经理洋员、华商殷实银钱行号经理2人及购买债票最多者6人，共16名“华洋人员”组成董事会，并选出总理1人、协理4人主持日常事务
- 2. 很多新设的银行并没有开设在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而是开设在了作为政治中心的京津一带。

脚注和尾注

1.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 - 4页。 .

2.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45页。 .

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5页。 .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第76-80页。 .

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第9页。 .

6.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70页。 .

7.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6-57页。 .

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第16页。 .

9.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60页。 .

1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

1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9页。 .

12. 徐矛、顾关林、姜天鹰等：《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

13. 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

1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30页。 .

15. 《聚兴诚银行》，载《重庆工商史料》第六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

1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05页。 .

17. 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第53页。 .

18. [美] 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

19.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

20.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 - 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1422页。 .

21. 《财政部发表之发行债券理由书》，《银行月刊》第2卷第2号，1922年2月5日，5～6页。 .

22. 千家驹：《中国的公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第10页。 .

23.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 - 1927）》，第1425页。 .

24. 贾上毅：《国债与金融》第一编《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5页。 .

25. 戴铭礼：《九六公债史》，《银行杂志》第3卷第6号，1926年1月16日，第5页。 .

26. 杜恂减：《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

4.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4部分 总字数：5230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11.1%(581) 疑似剽窃观点：(0)

1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姜良芹 - 《民国档案》 - 2004-11-25	4.3% (226) 是否引证：否
2	近代新式银行的放款利率及其对产业的影响 李一翔; - 《近代中国》 - 1996-07-31	2.8% (149) 是否引证：否
3	近代新式银行的放款利率及其对产业的影响 李一翔; - 《近代中国（第六辑）》 - 1996-07-01	2.8% (149) 是否引证：否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历硕士 2010201050007 石源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2-04-16	2.4% (124) 是否引证：否
5	2012010923_刘杰_博士_历史文化学院 刘杰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27	2.0% (104) 是否引证：否
6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吴景平;王晶; -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2001-09-01	2.0% (104) 是否引证：否
7	2012010923_刘杰_中国史_历史文化学院_历史学分会 刘杰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6-08	2.0% (104) 是否引证：否
8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影响下的中资银行业研究 代春霞(导师：张东刚) -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 2012-05-01	1.6% (86) 是否引证：否
9	经济学院1120090586代春霞 代春霞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2-04-26	1.6% (86) 是否引证：否
10	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内债整理案述论 姜良芹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02-12-15	0.8% (41) 是否引证：否
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金融统制探略 黄震; - 《政法论坛》 - 2008-01-15	0.7% (36)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迫于银行公会及社会各界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在1921年进行了一次公债整理，除了重新规定一些公债的还本付息办法及期限外，还建立基金以确保债务清偿，明确规定“此项基金……由各该机关商定拨款手续，拨交总税务司安格联，一面由内国公债局及银行方面推举代表，与该总税务司会同办理”，这使得北洋政府的债信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恢复。但公债整理后，银行并不像此前那样踊跃地认购公债了。而随着北洋政府权威性的日益丧失，一些私营银行开始寻求新的可依托的政治力量。1926年，当武汉国民政府表现出了“诚意维持”，对北洋政府所发行的新旧公债不会“置之不理”的态度并愿意由国内银行来保管公债基金时，民营银行业也立即显示出了合作的“诚意”，支持武汉政府发行新债，表示“国民政府此次发行公债为**国民政府之新猷，凡属国民均应首先赞助，唯办法（即保管基金）必使之万分安全，则既可使市面有流通之价值，又可为将来收回安氏保管内外公债基金大权之张本，故此为国民政府初次之新政，必须使人民十分信仰，盖关系于将来甚大也**”。只不过私营银行业的这种“诚意”最终落实到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财政状况没有丝毫明显的改善，巨额的军费支出，使其发行的公债远远超出了北洋政府时期。对于公债数量学者们的统计也不尽相同，按照杨格的整理，1927年至1937年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公债一共有42项，总额为法币210 900万元，200万美元，就规模而言，北洋时期的政府公债显然与此不可同日而语。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初的几年中，得到了众多民营银行的大力支持，早在1927年前后，上海银钱业即先后两次向蒋介石政权垫款，数额均为300万元，后又大力协助政府募集公债。作为回报，南京国民政府也确实给了这些民营银行一些好处，比如说成立了由国内金融业人士自己掌控的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会，使得初期发行的公债还本付息的资金有所保证，并且将保管公债基金的权力由外国人手中转移到华人自己手里，这是国内的民营银行家们盼望已久的。同时，为了维护银行家的利益，蒋介石还推出其他些举措，如1927年6月成立上海劳资调节委员会，后公布《劳资争议和处理法》，明文规定工人不能罢工，并下令取缔银钱业职工公会等

等。

银行是逐利机关，“资本自身的目标主要在寻觅利殖。愈能获得更多利润的事业，愈足以招徕资本”，一方面是投资公债带来的高额利润，而另一方面是投资途径的匮乏，“银行家不是慈善家，目光所注只在利益。放款于农村则农民破产，放款于工商业则市面萧条，非但无利可图，简直危险万分……若不吸收公债套取厚利，亦无其他维持营业的良法了”，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私营银行业通过公债来宣泄其过剩的存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按当时的惯例，政府以公债向银行进行抵押借款是有很大折扣的，一般情况下是五折或六折，超过六折的极为少见，也就是，假如公债发行票面额为100元，那么政府只能从银行得到50-60元，再加上公债6-8厘不等的利息，如果按结价时计算，银行所得的年利至少可在4分左右，这笔利润是相当丰厚的。正因为如此，各主要民营银行的有价证券持有量直线上升，浙江兴业银行1921年为3 020 066元，1931年为8 324 228元，增加1倍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1年为1 147 815，1931年为10 212 635元，约增加9倍；浙江实业银行1921年为1 437 192元，1931年为14 025 982元，约增加10倍；中国实业银行1921年为902 508，1931年为5 249 527元，约增加6倍，而政府公债是当时私营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按照《申报经济专刊》的记载，1927年上海国内公债成交数额为239 840 000元，而1931年上升为3 921 823 700元，增长了16倍多，由此可见公债买卖已经成为私营银行业的一项重要业务。

对于民营银行业来说，除了较高的利息和回扣，投资公债的另一个好处是扩张自己的信贷能力。因为每种公债的条例上都有“得为银行之保证准备”的规定，换言之，银行只要提供一定数额的公债作为准备就可以发行钞票，这意味着公债可“与现金有同一效用，无虚果滞”。而依据《储蓄银行法》，政府公债还可以作为储蓄存款的准备金。不仅如此，公债还常常作为银行向政府放款的抵押品。这些做法的后果是使得民营银行一度从政府公债上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同时也使它们在与政府的“合作”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因为购买公债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民营银行业一旦放弃这种合作就必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民营银行业是寄予厚望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从其早期的垫款和不遗余力地承销公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种支持却始终没能满足政府的需要，反而使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除了巨额军费，公债的还本付息成为政府的又一项重大的财政负担，如果按照公债发行时承诺的利率兑现，政府就要每年拿出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还本付息，从创建之初就不停地忙于应付各种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日本的入侵又使得政府的税收收入受到了极大影响，沉重的债务负担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于1932年进行债务整理、延长公债的偿还日期并降低利息支付。和1921年不同的是，私营银行业在这次公债整理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因为这是它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果。无奈的银行家们在妥协的同时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们联合发表宣言：“**持票人既因国难牺牲个人利益，竭诚拥护国家，自此次减息展本之后，无论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及变更此次办法情事，由国民政府命令公布，并分行政院永远遵守。……政府与人民休戚相关，应将财政彻底整理，完全公开，财政委员会由各团体参加**…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之用”。南京国民政府应允了私营银行业提出的所有条件，然而无一落实。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私营银行界早期对蒋介石的援助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它们渴望以此作为筹码换得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保护甚至是一些特权，而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和对巨额军费的需求使它们的这一美好愿望最终落空了。毕竟，在这场博弈当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

1932年的债务整理使民营银行界对政府的认识发生转折，持票人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民营银行界已经在重新审视和政府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约束后者的行为，但和强势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私营银行界的力量实在弱小。公债整理后，中国银行开始逐步减少政府公债的持有额，将资金转向内地，在其带动下，上海银行界从1934年下半年起有意识地抵制政府公债，这种局面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银行界的控制。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以救济金融、克服经济萧条的名义通过发行公债进行增资改组的方式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官股逐渐在这两家银行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同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民营银行发生挤兑，国家银行不仅不给予帮助，还将事先集中起来的这三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拿去兑换，三家银行最终无力承受，只得同意政府以加入官股的方式“救救”，它们也因此而丧失了作为民营商业银行的独立地位。1934年至**1936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实收资本**、各项存放款、兑换券发行、资产总额和纯益等各项指标在全国银行业中所占比重，到1936年时基本上都已超过一半，而这些数据尚未包括省市立等地方官营银行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随着“四行二局”金融断体系的建立和势力的迅速扩张，民营银行的发展明显受到了一定压制，它们作为华资银行界主导力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2. 政府公债与民营银行的运营机制

民营银行界与政府因为公债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种关系的一个副产品是对民营银行运营机制的影响。首先、政府的大量借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营银行间的合作。民营银行界在与政府发生借贷关系的时候并不是对其中的风险毫无认识，而联合同业共同承做是它们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近代中国战事频起，而众多的华资银行成为各地政府军阀筹措军饷的重要对象，常常“数十万或数百万惟彼军令是听，绝无磋商余地。此项军饷，美其名则曰借款，究其实则偿还方法查无期限”，上海银行公会多次发起、召集全国各地银行公会的联合会议，它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商讨对策，希望“众志成城或可收效于万一”。从而尽量改善华资银行的不利处境。民营银行界自身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面对大量的政府借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曾经奉行这样的原则：“任何政府借款，不论有利或无利，宜常以同业合作为原则。天下事惟势力均等，始有公平交易政府与银行事势上本不平等，以单一银行借款于政府，如果有利，则易遭同业之忌，且政府以为示大恩于我，希图常借，如成为呆滞，区区一银行之苦乐，辄不在政府之心目中，若合同同业承做，则势力较厚，政府方面有所顾忌，且可藉此减少过分之竞争，有利固须分享，有害也不致独受，实为一分散风险之方法”。而且，私营银行界愿意“使借款公债化”，“藉以造成市价便于流动”，以不违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之原则。由于寻求不到更多的投资渠道，民营银行界不得不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政府公债，在这

样的条件下，联合同业是它们分散风险、增强自身博弈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其次，对于单个民营银行而言，对公债的过多关注可以改变它们自身的行为方式。民营银行界在向企业放款时对抵押品都有严格要求，有些时候甚至直接冻结以往的投资，将企业收购自己经营，从而“形成内国银行监督，或代办某种工业之怪现象”。这固然是私营银行界注重资金运用安全的表现，但很多时候其放款的条件未免过于苛刻。这看似与政府公债毫不相干，但事实上两者并非全无联系。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7年发表的一份宣言中曾指出，“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也就是说，这些企业（以棉纺织企业居多）最终被出售给银行常常是前者的无奈之举，它们在贷款后无力偿还本金和高额的利息，只有将全部抵押品交与银行。事实上，“银行家并不故意的高抬利率去压迫民族工业的发展，银行贷息之所以如此之高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银行资金的成本——即存款的利息过高所致。……因政府滥发公债，又屡次以高利向银行界借款，银行以政治投资的利益丰厚，于是遂不恤厚利向社会竞收资金以谋更高利润的获得，于是而存息渐高，而放款利率乃亦随之更高了”。虽然贷款利率的提升并不完全是政府公债造成，但确实与公债的拉动作用不无关系。作为一个理性的微观投资主体，私营银行资金运用决策的依据除了一定程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对银行自身能否盈利的考虑。资金价格最终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按照杨格的估计，1928年到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带给私营银行的平均收益率是15%到24%，1936年平均收益率降至11.6%，而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上海等地的民族工业每年的平均利润率也不过在10%-13%左右。在这种条件下，私营银行界热衷于政府公债，而对企业放款时条件苛刻也就容易理解了，政治投资的厚利促使银行业不愿过多地为并不景气的民族工业提供周转资金。为了获取利润，金城银行甚至设立了专门买卖公债证券的丰大号作为附属事业来经营，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特殊产物。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私营银行业大量投资于政府公债和向政府放款是存在机会成本的。这笔资金原本可以流入生产领域而不是于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的军政费用上。政府滥发公债的一个消极作用就是“奖励银行资本做政治的投资，亦即阻碍了这一部分流动资本之投入工业经济”。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之不能发展，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势力的剥削；然而金融机关不能予中国工业以金融上的助力，不肯放款或投资给工商业，有时民族工业且因中国的银行资本之压迫而宣告破产，这些都是不容否认事实”。近代的私营银行业的确在发挥着资金融通中介的作用，它们集中了社会剩余资本并将其投放到资金需求者的手中。遗憾的是，以筹集军费和维系政府开支为主要目的的政府公债并不能转化为银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真正能够作为银行业发展基础的产业却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停滞不前，“产业的幼稚，延迟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发展；产业的衰败，减缩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出路”。私营银行业因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但这种尴尬的处境却不是它们凭借自身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上台执政，民营银行业与历任政府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是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银行一方面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与当权者保持密切的关系，以求得政治力量的支持和相应的发展便利，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丧失商业银行的独立地位，担心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这种两难的处境和矛盾的行为方式是近代私营银行业的一个共同特征。

脚注和尾注

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页。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1页。
3.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7-511页。
4. 赵惠谟：《中国金融资本之特殊性》，《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1日，第1页。
5. 叶作舟：《中国金融之危机及其当前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6号，1934年3月16日，第36页。
6. 千家驹：《中国的公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第48页。
7. 千家驹：《中国的公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第70-71页。
8. 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5）A27页。
10.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216 - 217页。
1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往来函件》，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 - 1 - 473。
1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616~617页。
13. 《中国金融之组织》载《经济研究》第2卷第8期，1941年4月1日，第39页。对于近代银行的这种经营模式，可参考李一翔：《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4. 《上海华商纱厂之宣言》，《银行周报》第11卷第18号，1927年5月17日，《杂纂》第10页。
15.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0页。
16. 千家驹：《中国的公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第77页。
17.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页。

1	<u>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1927-1937)</u> 王晶(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5	10.6% (1023) 是否引证：是
2	<u>同学、同乡与同事—民国银行家人际网络初探 (1912 ~ 1937)</u> 袁晖(导师：李一翔) - 《东华大学硕士论文》 - 2013-01-01	4.8% (467) 是否引证：否
3	<u>“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u> 姚会元,邹进文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1997-09-15	4.1% (397) 是否引证：否
4	<u>值得称道的中外合作</u> 刘平 - 《上海金融报》 - 2010-02-12	3.8% (363) 是否引证：否
5	<u>崛起中的银行家阶层—上海银行公会早期活动初探</u> 朱华,冯绍霖 - 《档案与史学》 - 1999-12-30	3.6% (350) 是否引证：否
6	<u>近代银行家：中国金融创新思想的先驱 (1912—1949)</u> 童丽(导师：吴申元)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5	3.5% (337) 是否引证：否
7	<u>民国时期杭州银行公会研究 (1930-1937)</u> - 豆丁网 -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ww.docin.com) 》 - 2015	3.5% (334) 是否引证：否
8	<u>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u> 姚会元 - 《历史档案》 - 1998-05-15	3.3% (321) 是否引证：否
9	<u>中国银行与停兑令风潮探因</u> 董昕; -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07-01-20	3.1% (297) 是否引证：否
10	<u>张公权: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u> 贺水金; - 《上海经济研究》 - 2007-09-15	2.8% (270) 是否引证：否
11	<u>汉口银行公会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互动性研究</u> 徐为结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12	2.5% (243) 是否引证：否
12	<u>2012010523徐为结</u>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17	2.5% (243) 是否引证：否
13	<u>抗战前上海民营企业的资本集中</u> 杜恂诚 - 《上海经济研究》 - 1997-09-15	2.2% (208) 是否引证：否
14	<u>1916——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u> 傅国涌; - 《中国中小企业》 - 2016-12-01	1.9% (188) 是否引证：否
15	<u>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百度文库</u> -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enku.baidu.c) 》 - 2012	1.9% (185) 是否引证：否
16	<u>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_图文</u> -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enku.baidu.c) 》 - 2017	1.9% (185) 是否引证：否
17	<u>1916年停兑风潮述略</u> 宋士云,张廷新 - 《济宁师专学报》 - 2000-03-10	1.9% (184) 是否引证：否
18	<u>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u> 张天政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05-06-15	1.5% (148) 是否引证：否
19	<u>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u> 刘平; - 《史学月刊》 - 2008-09-25	1.5% (146) 是否引证：是
20	<u>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u> 张强; - 《社会科学家》 - 2009-09-25	1.3% (122) 是否引证：否
21	<u>民国银行家的生活样态与人际网络——以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为例</u> 高红霞;张克令; - 《学术月刊》 - 2016-02-20	1.1% (105) 是否引证：否
22	<u>李铭与浙江实业银行的宝塔式团队</u> 兰日旭; - 《中国金融》 - 2011-10-01	0.9% (85) 是否引证：否
23	<u>《银行周报》研究 (1925-1937)</u> 李辉(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2011-03-01	0.8% (77) 是否引证：否
24	<u>浙籍银行家群体与抗战初期中国金融危机处理</u> 尤云弟; - 《中国市场》 - 2016-12-05	0.8% (73) 是否引证：否
25	<u>宋汉章与小万柳堂绑架案</u> 邢建榕; - 《档案春秋》 - 2011-11-10	0.7% (68) 是否引证：否
26	<u>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 (1949——1952)</u> - 豆丁网 -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ww.docin.com) 》 - 2015	0.7% (64)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三章抗拒停兑令与江浙财团的形成

北洋政府时期，因时局动荡和政府决策错误，银行业发生过多挤兑风潮，对银行业信誉乃至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1916年，上海银行业对北洋政府停兑令的抵制，成为江浙财团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民营银行在事件中崭露头角，由此开始了一段迅速发展的历程。

一、化危为机——抗拒停兑令事件

北洋政府建立伊始，即因军费等项支出日渐浩繁，入不敷出，中央财政极为空虚，“自袁氏当国，国家元气尤消耗无余，外债累累，抵押已尽，商民脂膏，搜刮罄尽，乃突然发生帝制，恣意挥霍，其间私财之外寄，党羽之朋分，正当收入不敷什一，困乏之状已达极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虽为北洋政府财政的挹注机关，但起初发行额并不大。中行1913年发行额只有502万元，交行1914年底发行额为893万元；到1915年底“洪宪”登基前夕，交行发行额猛增至3729万元，中行更是达到3844万元。危险的是，这些钞票多为北洋政府巨额垫款，1915年底中行为1204万元，交行为4750万元，后者垫款额竟占其放款总额的94%，占全部存款的72%，仅为所谓“大典筹备处”垫支即达2000万元之巨。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两行现金准备的严重不足，中行存有现银350万两，银币488万元；交行存有现银600万两，银币540万元。此项准备金的半数，属于中交两行的上海分行。情况表明，两家银行实力迅速衰落，信用基础严重动摇。1916年3月15日，中行广州分行出现挤兑，继于4月12日停止营业。交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分行存户纷纷提现，挤兑情况屡有发生，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此种局面，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并直接控制交行的梁士诒与国务院帮办秘书徐树铮密议，居然决定中、交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存款付现。1916年5月12日，中、交两行上海分行接到本行总行管理处转来停兑令，内称：“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益蹙……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要求两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中、交两行总行及京、津分行等迫于压力，只得遵照执行，各地分行相继跟进，顷刻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上海中行副经理张嘉璈5月12日晨上班时，“行至距离行址三天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则挤兑者何止二千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为应对危机，张嘉璈和经理宋汉章立即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这三家民营银行即日后著名的“南三行”）等紧急磋商。他们磋商后做出的决定，就是上海中行拒不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上海中行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他们清醒认识到北洋当局的停兑令是对银行信用基础乃至国民经济的巨大破坏，“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以后，政府信用一劫不复”，对此加以抵制，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银行业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前述三家银行有的代表中行股东，有的代表中行钞票的持券人，有的代表中行存户，均以利害相关的当事人立场，全力以赴支持上海中行反停兑之举，并与宋汉章、张嘉璈商议具体的应对办法。

其次，就是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上海中行先是集中库存现银，同时寻求实力雄厚的外商银行的支持。当时上海市面上的现金，无论现洋或现银，大多存于外商银行库中。宋汉章认为要应付挤兑，仅从市面上购进现洋是不行的，还易引起厘价波动，必须得到外商银行的支持，才能使此次风潮顺利平息。他首先与德华银行经理费格商量此事。当时，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德华银行已在外商银行公会中除名，宋汉章认为其库中现洋或可利用。但费格表示他已无权处理库中现金，建议其与其他银行接洽。宋汉章于是往访麦加利银行经理斯蒂芬和正金银行经理儿玉，两人均表赞成，于15日在麦加利银行邀集各外商银行经理集议此事，议决对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予协助至必要限度”，上海中行以房地产等为抵押，双方订立200万元透支协议，随即由道胜银行出“早仓”接济，并于次日致函各国领事团转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告知各外商银行愿借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200万元，以维持兑现。上海的金业市场设于道胜银行买办间的走廊内，每日打听行市的钱业中人群集于此。“道胜出仓”的消息传出后，立即传遍全市。当天下午，挤兑风潮便趋于缓和。

接着，在向租界的上海会审公堂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后，由陈光甫、李铭、蒋抑卮分别代表中国银行的股东、存户和持券人，聘请律师，高调向法庭起诉上海中行，要求“将存款及钞票准备充足，照常兑付”。按照有关法律，宋汉章、张嘉璈代表上海中行作为被告应诉，在诉讼期间，中国银行总行不可撤掉二人职务，从而保证他们可以继续执行拒绝停兑的计划。

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宋、张未雨绸缪，以维护中国银行股东利益之名，于当年4月成立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聘请著名实业家张謇担任会长，叶景翼、钱新之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该会于5月13日报登声明五项解决办法，略为：（1）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办理；（2）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并随时有查账之权；（3）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4）所有存款均到期立付；（5）将来商家如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5月16日，该会再发声明重申：“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信用起见，联合会全体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所有存款，均一律届期照付”。

在取得工商界人士支持后，上海中行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上海租界统治当局的力量。他请股东代表律师古柏、存户代表律师葛福来拜会英领事，股东代表律师村上拜会日领事，探询意见。租界领事方面表示：“中央此次办法，实破坏全国金融基础，不特影响华人，实于上海市面大有关系。上海市面实华洋共有利害，自应设法维持。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办法，领事等异常赞美，当竭力以维护上海中国银行，不日即当开会提议保护该行”。此外，还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电请早已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的督理江苏军务上将军冯国璋和江苏巡按使齐燮元，支持上海中行反停兑令，得到的回复是“已两电中央，痛切驳复，请将前令立时取消，并通飭各县照常行使兑付”，表示“沪行办法极是，甚为佩服”，“事关国脉存亡，本上将军、本巡按使当竭力维持，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准备，上海中行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疯狂挤兑后，到5月15日便基本恢复正常，一场危机得以平安度过。库房中200多万现银准备，兑出了150万元，与外商银行订立的200万元透支款项尚未动用。社会舆论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举措称赞不已，谓“然非资本雄厚兼有胆识者，何能若是！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毋躁矣”。并对宋汉章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毅然抗命的举措“诚具远见卓识”，“胆识俱优”。6月2日，财政部发出命令，称前发中交两行纸币暂停兑现的国务院令，“究系一时权宜之计”，因近日弊窦丛生，且两行纸币为全国信用所关，本与现金无异，“政府负完全责任，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定数担保照常兑现”，否定了原发的国务院令。

二、江浙财团的形成

抗拒停兑令的成功，银行家们切身感受到团结互助的巨大作用，促使他们更进一步携起手来，影响此后中国金融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几十年的江浙财团，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

1. 江浙财团出现的历史条件

所谓“江浙财团”，是指以江浙籍著名银行家为核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具有相当资金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银行家（或称资本家）群体。这个群体之间并无资本集团的组织形式，然而，它们相互扶持，合力对外，扩大声势，联系广泛。

首先，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在“南三行”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则是其政治态度的一次公开亮相这不仅是一次经济力量的较量，也为江浙财团获取了有力的政治资本，为江浙财团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上海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上海租界的发展，为江浙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上海租界繁荣的支柱——兴盛的房地产买卖和不断扩大的内外贸易，离不开江浙财团的财力支持。

再次，江浙商人的资本积累和经营经验。辛亥革命前，江浙两省，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资本家，有严信厚、朱葆三、沈缙云、叶揆初、吴鼎昌、宋汉章、周金箴、虞洽卿等，从事商业、金融较早，对江浙财团势力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以江浙资本为主的银行已有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

第四，银行集聚社会货币资本的作用，特别与外国资本企业及与外国银行联系较多，这既能在经营条件上得到很多方便，又分沾了外国对华贸易巨额利润的余沥。

第五，从疏远、反对北洋政府发展到1927年支持南京政府和南北资产阶级合流，江浙财团的这一基本政治立场为自己取得优势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

2. 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

江浙财团的主要代表人物均为江浙籍著名银行家，其核心人物有：

李铭（字馥），浙江绍兴籍，为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籍，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总裁，1928年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宋汉章，浙江绍兴籍，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贝祖治（字淞蓀），江苏苏州籍，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为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陈辉德（字光甫），江苏镇江籍，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

叶景揆（字揆初），浙江杭州籍，为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

徐寄庠（字陈冕），浙江永嘉籍，为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1932年一度任中央银行代总裁；

周作民，江苏淮安籍，为金城银行总经理；

吴鼎昌，浙江吴兴籍，为盐业银行总经理，北四行联营事务所主任；

徐新六（字振飞），浙江余杭籍，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钱水铭（字新之），浙江吴兴籍，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交通银行协理，1927年曾任财政部代部长，1938年后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孙衡甫，浙江鄞县籍，为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

胡祖同（字孟嘉），浙江鄞县籍，为交通银行总经理；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籍，为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

胡筠（字笔江），江苏镇江籍，为中南银行总经理，1933年后任交通银行董事；

秦润卿，浙江慈溪籍，福源钱庄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垦业银行总经理。

这些核心人物，多年从事银行业，经验丰富，运筹帷幄，风云一时，他们主持的**银行势力雄厚，执金融业之牛耳，为江浙财团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当中超过半数为民营银行主要责任人或担任重要职务，也标志着民营银行已经成为金融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3. 银行间的相互兼职与相互投资

在江浙财团尤其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民营银行中，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银行之间人事上的相互兼职、彼此渗透，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有学者不厌其烦，考证颇详，具体如下：

中国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中有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中有中国通商银行业务局理事俞佐廷，俞氏还同时兼任上海惠中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兼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统原商业储蓄银行、浙东商业储蓄银行、两浙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中国企业银行的董事会里有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和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里还有四明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该行的董事长王芾泉

又兼浙江典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李还兼中国垦业银行董事；正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有唐寿民、胡笔江和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吴又兼任江海银行董事；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董事长是中国银行的张嘉璈，董事中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陈还兼任徐州国民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止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上海国华银行董事中有胡笔江；中孚银行董事会有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龚心湛；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会有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中国棉业银行的创办人秦润卿是上海钱业公会主席，他又兼任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中和商业储蓄银行和辛泰银行董事；上海通和银行的董事长朱吟江兼任中华劝工银行的董事；中国农工银行的董事里有冯耿光、周作民、钱永铭等。1929年设立的中国国货银行董监事会中有陈光甫、唐寿民、钱永铭、徐新六、杨敦甫等。金融家王伯元曾投资创办镇泰、元余与元发等多家钱庄，后来他在秦润卿、李铭、徐寄庠等金融家联合支持下接办中国垦业银行，与此同时，他相继在多家银行、银公司和保险公司投资，分别成为它们的股东、经理、监察、董事、董事长等。1931年，有61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重要职务。

作为民营银行的代表，“南三行”、“北四行”自然更不例外，两大银行集团内部人事渗透与互兼较之普通民营银行更为明显，从一个侧面上表明南三行及北四行内部的一种准联盟关系。具体表现为：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有浙江兴业银行的总司库徐寄庠（徐还在南三行外的温州商业银行兼任董事长，兼瓯海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董事，又是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的监察人。而中南银行的董事长黄奕住又是厦门商业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会有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钱亦任辛泰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在金城银行的董、监事中，有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吴鼎昌（达诠）、盐业银行董事长任振采、中国银行总经理兼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大陆银行董事长、四行储蓄会负责人钱新之等。

各银行之间相互投资与资金彼此挹注也屡见不鲜。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投入的股份以及王轶陶、胡笔江、任振采、常朗斋、马式如等银钱业资本家个人的投资曾经在改变金城银行资本结构中起过重要作用。这种相互间的投资促进了私营金融资本的融合、集中，并在条件具备时走向垄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刚刚成立时，上海的银行家们投入资金，大力支持。中国银行张嘉璈个人投资5000元，实际上成为该行的股东及强有力后盾；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在该行成立之初即成为持股两万元的该行股东，贝淞荪稍后也向该行投入了5000元。如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联结着上、江浙地区的许多银行一样，南三行乃至江浙金融财团的银行之间实际上是被一条连锁董事会牢牢地联结为一体的。

民营银行及银行家在经济上、人事上的相互兼职、调剂与渗透，在各银行间造成了相对稳定的联合，通过这种或紧或松的联合，各行相互呼应、彼此挹注，同时通过固定的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自己，争取和维护本集团乃至整个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南三行”、“北四行”的出现使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有了联合起来的金融实体，它成为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一。

三、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

上海银行公会的建立，既是江浙财团形成的一个具体标志，也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银行业提高防范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部分只对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做一简要介绍。

设立上海银行公会的提议始于1905年。当时，上海信成储蓄银行周延弼、沈缦云曾出面邀约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信义银行的头面人物，假座海天邨集议拟设银行公会。到会者有大清银行席德辉、交通银行李云书、通商银行谢纶辉、四明银行虞洽卿、浙江银行孙衡甫、信义银行朱清斋以及信成银行王一亭。由于当时中国银行业还处于萌芽阶段，新兴银行家对银行公会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周延弼、沈缦云的提议未能得到其他银行的响应。

1915年春，张嘉璈等鉴于“各国银行均有公会之设立，彼此联络维持”，提出组织上海银行公会的设想。他们认为，中国银行业“欲恢张业务，务必须团结经营，……结力既厚，声势自雄”。在张的积极筹画下，中国、交通、浙兴、浙实、上海、盐业六行合组上海公栈，作为共同的货物押款堆栈。同时约定六行经理每天在上海银行举行工作午餐。稍后，中孚银行也加入公栈。1916年，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该七行即拟正式组织公会，因无适当会所，故未推选会长也未拟订章程，但筹备工作并未停顿。1917年，七行合资购得一块地产作为会所，并共同出资创办《银行周报》作为言论机关。至此，“公会虽未成立，而公共事业已具规模矣”。1918年7月8日，上述7家银行发起召开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大会，订定章程，选举董事会，推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李馥荪为书记董事。10月19日，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对外宣告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根据章程，公会的宗旨是：“（一）联合在会各银行研究业务及经济事项；（二）互相臂助促进同业之发达；（三）矫正营业上的弊端；（四）筹设票据交换所”。

1920年9月，第一届董事任满改选，互选盛竹书为第二届董事会正会长，钱新之为副会长，会员银行又增加大陆、东莱、东亚等，共计16家。1922年9月，第二届董事任期届满，互选盛竹书为第三届董事会会长，孙景西为副会长，会员增加永亨、中国实业、东陆、正利、中国通商5家，合计21家。1923年9月，第三届董事任满，互选倪远甫为第四届董事会会长，孙景西为副会长，会员增加中南、农商、工商3家，同时修改会章，准予中外合办银行加入，遂有中华懋业、中华汇业两银行加入，会员总数合计26家，香港路上海银行公会大厦也在这一时期建成。1926年9月，第四届董事任满改选，互选盛竹书为第五届董事会会长，吴蕴斋为副会长。其间正利、东陆两行停业。会长盛竹书于1927年1月逝世后，董事制改为委员制。以宋汉章、胡孟嘉、徐新六、李馥荪、陈光甫、倪远甫、吴蕴斋、叶明道、叶扶霄9人为第一届委员。会务由“委员会”主持，对内共同负责，不设委员长，每月轮流推委员2人执行，委员对外无单独代表公会全体的资格。公会下设会所、财政、国内行市、国外汇兑和（银行周报）等专务委员会分任各事。同年12月，上海银行公会改订章程，废除委员轮流办法，选举贝淞荪、胡孟嘉、徐新六、李馥荪、吴蕴斋、陈光甫、孙景西、倪远甫、叶扶霄9人为第二届委员，另设书记委员1人，会所委员1人，会计委员1人，交际委员2人各专其责。1929年3月，银行公会制定新章程代替临时简章，选羊第三属委员，内部组织较前完善，除原有

最高决策机构会员大会外，新设执行委员会取代此前之委员会，同时从执行委员中选出3位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由会员大会从会员代表中选出11人组成，会议主席由常务委员轮流主持，另设秘书长一职，聘请林康侯担任。在此期间加入的新会员有和丰（1927年）、江苏（1928年）、国华（1930年）、中国垦业（1931年）4家，而退出的亦有4家，即中华懋业、中华汇业、农商、工商均宣告停业。

自成立以来到20年代，为维护银行信用及促进银行业务开展，上海银行公会积极进行银行业务制度建设。首先，成立汇兑经纪公会并制订该会章程，使得汇兑经纪员制度得以建立与完善，这样既可促进会员银行外汇业务的开展，也有助于上海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其次，设立公共准备金制度，在安定市面、稳定物价及协助政府救济民众生活等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银行公会的银行业务制度建设，不仅成为该会为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建设所作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有序化及上海华商银行业务的改进。

1931年6月，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上海银行公会正式议决筹组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及改组银行公会。10月1日，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作为公会会员集体加入上海市商会。其行政管理机关为上海市社会局，并受上海市党部监督，章程的修改及银行业行业规则的改订均须呈上海市社会局核准，并转报主管机关财政部、实业部备案后，方可施行。上海银行公会的决策及执行通过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来运作，并增设主席一职，由专人担任，对外代表公会。另设秘书长一职，负责办理公会内部各种具体事宜。执行委员会任期为四年，每届两年改选半数，应改选者不得连任。新章程废除了以前可连任的规定，有利于公会运作的民主化。李馥荪、贝淞荪、吴蕴斋、胡孟嘉、徐寄庾、叶扶霄等15人任第一届执行委员，李馥荪、贝淞荪、胡孟嘉、吴蕴斋为第一届常务委员。改组后，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第一届主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则自1933年至1937年担任第二及第三届主席。秘书长一职则由全国商业联合会主席林康侯长期担任。这一时期加入的新会员有中兴（1931年）、中国农工（1931年）、通和（1932年）、香港国民（1932年）、中国国货（1932年）、中汇（1933年）、上海绸业（1934年）、恒利（1934年）、江浙商业储蓄（1934年）。1931年年底，会员数为28家，不及全市银行的八分之三。1934年时，上海银行公会有会员33家，达到全市96家华商银行的近三分之一，虽然总数仍不占优势，但综合实力已远超出非会员银行之和，实际代表着上海银行业的中坚力量。

改组后，银行公会的各专务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从会员代表中选出委员组成，处理或决定重要事务须向公会执行委员会报告，获准后方可进行，并制定新的办事细则，管理更加规范。“银行周报委员会”主要任务为指导并管理银行公会的机关刊物《银行周报》；“国外汇兑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外汇兑方面事项，与中外银行业联合会因业务关系联系较为频繁，上海汇兑经纪员公会即受其管理；“国内行市委员会”以划一银行营业行市并共同遵守为宗旨，1935年法币政策后无继续存在必要，于1936年5月改组成立“上海银行界业务联谊会”，直属公会管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银行公会为稳定金融市场，增强同业抵御金融风潮的能力，在公会内组织设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有较大独立性，是银行公会最有影响力的附属组织之一，备受社会信赖。1933年成立的票据交换所和1936年成立的票据承兑所均由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起并组织管理。遇有与银行业利益相关的问题，如修订营业规程、讨论金融立法、税收政策时，上海银行公会常设立临时性的研究委员会。此类委员会针对专门问题进行研究，由执行委员会从会员代表中推派代表组成，在汇集各会员银行意见的基础上，制成报告书供公会参考。银行公会先后组织过192年的“修改营业规程委员会”，1933年的“储蓄银行法审查委员会”、“票据法审查委员会”和“研究审计部调查账目小组委员会”，1934年的“银行法研究委员会”，1935年的“承兑票据研究委员会”、“研究工商信用小借款小组委员会”、“研究汇划银元小组委员会”，1936年的“所得税研究委员会”等。专门问题研究完成以后，各委员会随即自动撤销。

改组后的上海银行公会为谋求同业团结，推动金融业发展做出了不少实际成绩，其最突出的贡献为上海银行公会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票据交换所的建立。此外，由上海金融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中国征信所和上海银行学会也在此时期建成，这些银行业的重要辅助组织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使上海金融业的发展环境发生较大改观，上海银行公会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初步达成。另外，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银行业利益、改进银行业务等方面，对全国银行同业也发挥了领导和示范作用。作为地域性的银行业自律组织，上海银行公会之影响已远超出上海一地，实际成为全国同业的联络核心。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1. 中、交两行总行及京、津分行等迫于压力，只得遵照执行，各地分行相继跟进，顷刻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
2. 当时上海市面上的现金，无论现洋或现银，大多存于外商银行库中。宋汉章认为要应付挤兑，仅从市面上购进现洋是不行的，还易引起厘价波动，必须得到外商银行的支持，
3. 麦加利银行邀集各外商银行经理集议此事，议决对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予协助至必要限度”，
4. 并于次日致函各国领事团转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告知各外商银行愿借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200万元，以维持兑现。上海的金业市场设于道胜银行买办间的走廊内，每日打听行市的钱业中人群集于此。“道胜出仓”的消息传出后，立即传遍全市。当天下午，挤兑风潮
5. 。6月2日，财政部发出命令，称前发中交两行纸币暂停兑现的国务院令，“究系一时权宜之计”，因近日弊窦丛生，且两行纸币为全国信用所关，本与现金无异，
6. 中国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中有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中有中国通商银行业务局理事

- 俞佐廷，俞氏还同时兼任上海惠中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兼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统原商业储蓄银行、浙东商业银行、两浙商业银行、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中国企业银行的董事会里有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和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里还有四明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该行的董事长王芎泉又兼浙江典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里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李还兼中国垦业银行董事；正明商业储蓄银行
7. 银行董事；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董事长是中国银行的张嘉璈，董事中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陈还兼任徐州国民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止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8. 银行董事中有胡笔江；中孚银行董事会里有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龚心湛；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会里有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中国棉业银行的创办人秦润卿是上海钱业公会主席，他又兼任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
9. 温州商业银行兼任董事长，兼瓯海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董事，又是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的监察人。
10. 银行及银行家在经济上、人事上的相互兼职、调剂与渗透，在各银行间造成了相对稳定的联合，通过这种或紧或松的联合，各行相互呼应、彼此挹注，同时通过固定的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自己，争取和维护本集团乃至整个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南三行”、“北四行”的出现使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有了联合起来的
11. 大清银行席德辉、交通银行李云书、通商银行谢纶辉、四明银行虞洽卿、浙江银行孙衡甫、信义银行
12. 。在张的积极筹画下，中国、交通、浙兴、浙实、上海、盐业六行合组上海公栈，作为共同的货物押款堆栈。同时约定六行经理每天在上海银行举行工作午餐。稍后，中孚银行也加入公栈。
13. 但筹备工作并未停顿。1917年，七行合资购得一块地产作为会所，并共同出资创办《银行周报
14. 新设执行委员会取代此前之委员会，同时从执行委员中选出3位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由会员
15. 成立汇兑经纪员公会并制订该会章程，使得汇兑经纪员制度得以建立与完善，这样既可促进会员银行外汇业务的开展，也有助于上海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其次，设立公共准备金制度，在安定市面、稳定物价及协助政府救济民众生活等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银行公会的银行业务制度建设，不仅成为该会为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建设所作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有序化及上海华商银行业务的改进。

脚注和尾注

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2. 洪葭管：《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3.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200页。.
4.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记文学社1982年版，第28页。.
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220页。.
6. 上海《新闻报》，1916年5月13日、5月16日。.
7. 上海《新闻报》，1916年5月17日、5月18日。.
8. 财政部令第1195号，1916年6月2日，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9. 学界亦有江浙财阀、上海财阀、江浙金融财团等称谓，其内涵基本一致。.
10. 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11.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12.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3. 万立明编选：《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史料汇编*机构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4. 《上海银行公会致财政部等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S173 - 1 - 16。.
15. 《上海银行公会致财政部等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S173 - 1 - 16。.
16. 《上海银行公会章程》，《银行周报》第2卷第41号。

6.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6部分

总字数：8394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4.6%(388) 疑似剽窃观点：(0)

1	危机背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风潮 潘晓霞;-《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07-15	4.6% (388) 是否引证：否
---	--	------------------------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四章民营银行的同业互助与同业联营

以“南三行”“北四行”为代表的近代民营银行，从兴起之初，就确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在经历多次危机之后，这种关系不断加强，“北四行”进而实现了具有实质内容的联合经营。

一、日常经营中的资金融通

同业资金融通是银行业在日常经营中活络头寸，弥补资金短缺，避免陷入支付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同业拆借、同业放款、存放同业等都是实现资金融通的主要途径。

同业拆借，亦称同业拆放，是金融机构之间以货币借贷的方式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行为，同业拆借的资金一般主要用于弥补自身短期资金的不足或临时性的资金短缺需要。一般而言，导致拆借发生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正常业务往来票据收付现金，轧计发生差额；联行委托解付汇款，数额巨大；实际放贷数额超过预计；应收款项未能及时收回；往来客户在

未事先联系的情况下提取巨额存款；其他外部因素如抢购货物资金流动等影响。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同业拆借，开始并未形成自己的拆借市场，多是依靠钱业拆借市场完成的。

1920年10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曾有组织“行市委员会”，于每日上午九时，由各会员银行，派员到会集议，把共同议定的行市，挂牌公告。但当时会员银行不过二十余家，体量较小，且钱业拆借市场历史悠久，在上海甚至全国拆借市场稳居牛耳，新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无论是能力还是影响都望尘莫及，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因无市可开，成立不久便夭折了。直至1932年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发行公单、公库证抵押证，银行业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同业拆借市场，但因联准会的种种限制，联准会的同业拆借并未获得长足发展。

同业拆借在银行业资金运用中的比例大小，可以反映同业拆借在银行业抵御风险中的重要程度。但要弄清这个问题，十分不易，可能是因为同业拆借涉及银行自身的信誉和营业秘密，在现有的近代银行业资料中很难找到关于同业拆借数量的记录，唯有20年代中国银行在其年度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透露了部分同业拆借的信息。观察中国银行的同业拆借情况，可以发现除个别年份外，中国银行的同业拆借都在1000万元以下，最少的仅为400余万元，从同业拆借额所占放款总额的比例上看，最高的1922年为8.97%，其次为1923年的4.49%，最低仅为1.36%。另外，从增长比较上观察，在放款总额已经增长近两倍的情况下，同业拆借规模不仅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业拆借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构成中，是微不足道的，不升反降的波动趋势也反映了行方对同业拆借的消极态度。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同业拆借利率一般低于市场利率，以较低的利率将自己的资金借于他行，不啻于损失自身利益，充实了对方的资金实力，尤其是银根紧缺时期，往往有不良行庄以低利率获得拆借款项后从事投机事业，对拆借银行来说，除非申请拆借一方与自己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银行不愿扩大同业拆借规模。在抗战之前，中国银行是现代银行业中规模最大、信誉最佳的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扮演的大多是资金供给者的角色，它的拆借资金及其占比尚如此低下，其他商业银行的拆借情况可想而知。

与同业拆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业放款的情形相对要好得多。同业放款与同业拆借的区别是，同业拆借为行业内部的资金借贷，具有互助性质，因此利率较一般贷款利率为低，而同业放款则在抵押、额度还是利息方面并无优惠，与其他工商业放款并无二致。因此在盈利动力上，银行业更倾向于扩大同业放款。

1930年代中国银行同业放款与放款总额的比例，1930-1932年都在15%以上，根据各该年放款总额计算，大约在七八千万元，仅次于机关放款与商业放款，排在第三位，1933年之后，因受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大量白银外流，国内银根紧缩，银行业不再轻易从事同业贷款，中国银行的同业放款占比有所下降，在10%以下徘徊，1934年仅为2.15%，数额约在1400多万元。一般而言，银行同业之间的相互放款，大致是资金雄厚的银行向资金薄弱的中小银行放款，对于放款银行来说，同业放款与一般工商业放款相比，因放款对象系同业关系，相互了解，在担保确实的情形下，相对安全，对于贷款银行而言，则可以在短时间内筹集足够头寸用于经营或解决债权债务关系。同业放款的另一优点是期限较长，不似同业拆借多以一天为限，同业放款的时间长短借贷双方可以具体协商，这为银行等集长期头寸提供了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业放款不失为同业间长期资金融通的有效措施。

同业往来存款亦是银行可以利用的同业资金。同业往来存款，多是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之间，各自在对方开立往来账户，存入一定数额的存款，以备业务往来如相互支票兑现、钞票兑现等抵冲余额使用。这类存款数量大小不一，以同业之间业务量的大小决定，数万元有之，十数万元亦有之，同业之间业务往来越多，同业往来存款就越多。同业往来存款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存放同业，即银行将一部分资金存放于其他同业银行，一类是同业存款，即其他同业银行将资金存放于自身。我们一般可以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找到同业存款与存放同业的数字，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至1937年存放于其他同业银行的存款情形，除个别年份外，该行的存放同业整体上呈逐渐上升态势。从建行之初的14万余元，四年后的1919年就突破百万元大关，1929年首次达到1600多万元，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该行的存放同业已高达4385万元。从存放同业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上观察，除1933-1934年两年稍低外，其他年份大多保持在15%上下，并未有太大的波动，这说明该行在对待存放同业的问题上前后政策基本稳定，也同时说明在资产总额不断增长之时，该行与同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同时是增长的，且业务增长与资产总额的增长基本是同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同业存款，分存于与自己业务往来的其他同业银行，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各该同业银行的资金实力。同时，一些资力雄厚的银行，因与其他银行之间业务往来的关系，也常常保有大量同业存款，如中国银行1930年时同业存款仅为4056万元，占存款总额的9.19%，此后年长一年，1937年同业存款增长至2亿多元，占存款总额的18.4%。这些同业存款与其他储蓄存款一样，成为银行业流动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银行同业之间，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亦有类似的同业存款在天津，由于各银行的经副理不少出身于天津各银号，有的银号甚至还是银行管理人员合资组成，银行与银号之间休戚相关，每遇到困难之处，相互协助亦是自然之举。平时，银行与银号之间大多有同业存款往来，银行存入银号的存款月息一般3%，银号存入银行的存款一般月息2.5%。在天津，银行在业务上还多委托银号买卖银元、收解申汇以及利用拨码进行票据清算，因此银行往往把大量资金存入银号，少则数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亦有多达三四十万元的，市面银根紧俏时银行与银号之间还常常相互拆放款项。

事实上，票据贴现与转贴现也应是银行同业之间的资金融通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由于近代中国票据贴现市场极不发达，能被银行接受的票据种类十分稀少，银行业之间的票据贴现与再贴现由于缺少中央银行的主持，长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作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手段，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票据贴现手段缺失的情况下，近代银行业还是通过同业拆借、同业放款等方式实现了日常业务中的资金融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业资金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行业的整体安全性。

二、金融危机中的同业互助

金融危机中银行业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无疑能够提高银行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对金融危机频发的近代中国银行业来说，尤其重要。然而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在经历了数次金融危机的惨重教训后，才意识到同业合作对于银行安全的重要性。

1921年爆发的中、交挤兑危机，在推动国内银行业的同业合作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经历了1916年袁世凯强令中国、交通两行停兑京钞事件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交两行无论是实力还是声誉都受到重创嗣后数年，为整顿收回两行在京津地区发行的京钞，中、交两行元气大伤不仅如此，停兑事件结束后的数年中，两行对政府的垫款与借款有增无减，从1918年起，交通银行先后为财政部垫付款项10万元以上的就达有十余笔，总额达2400多万元，1921年10月，中国银行仅财政部欠款项即有3400余万元。当中、交两行自身头寸短缺，无法满足政府索款要求之时，甚至还为政府开出担保性空头存单，以便其向其他商业银行抵押借款。当担保陆续到期，两行被迫兑现，以致库存现金日益枯竭。1921年下半年，交通银行发行额总共4069万元，而现金准备仅为515万元，其中北京、天津两分行发行额合计1053万元，现金准备仅剩40万元，其余都是保证准备，且大多是市价不稳的政府债券。们中国银行津券的发行准备亦“稍行薄弱”，其薄弱之程度，据时任北京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吴震修回忆，挤兑前夕，中行头寸很紧，库存现金几等于零。1921年下半年，银根趋紧之时，又因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关于在华权益问题争吵不休，英美等国在华制造谣言，一方面散布中、交两行库存空虚的消息，煽动人心，一方面暗中支持西方人把持的中国海关、邮政等部门拒收中、交两行的钞票，企图引发挤兑危机，以造成国际共管的口实。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1月15日，中、交挤兑危机爆发。

相较于1916年第一次中、交挤兑危机，此次挤兑危机中，社会各界尤其是银行业的相互合作于危机的平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5日下午，陆续有持有交通银行天津、张家口钞票之人前来兑现，问其原因，皆曰交行将不稳，观其情形，显然是受中、交空虚谣言的影响。中国银行的挤兑虽然稍晚，但挤兑情状也并未好到哪里去，各营业地点同样是“纷扰不可名状”。次日，挤兑危机进一步升级，“上午九时以后，前门一带代兑各钱铺门外持票兑现之人，即已拥挤不堪，至十时更万头攒动，门窗玻璃多有被挤破者……，中、交两行门外，人数之众，数倍于昨，车马几不可以通行”，“市面人心，颇觉浮动，所有小商店，皆拒用两行之票”。连续两日的无限制兑现使中行现金减少约一百万元，对继续兑现已渐感行力不支。

11月16日下午一时，北京银行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挤兑危机的对策，会议决定“以各银行之力扶助两行，绝不使有失信用”。政府方面，外交总长颜惠庆、财政总长高凌霨与北京外交团商讨了调拨关余支持中、交两行的可能性，得到绝大部分公使的赞同，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表示关余已用以整理金融公债的抵押，不便动用。下午六时，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税务司以及中、交两行负责人在交通部长张志潭家中开会，会议决定此次挤兑危机虽从银行引发，然与此前财政大幅垫借款项不无关系，为维持金融起见，应对危机应由各方面共同负责，会议初步决定从关余中调拨600万元款项，专用于维持两行。综合各界意见以及实际情形，16日晚，中国、交通两行领导层冯耿光、曹汝霖、任风苞、周作民等议定应对方针：“（一）总银行及分行存储准备金，一律公开，随时任人参观或稽核；（二）各银行无论总行分行，应定期实行同行拆款方法；（三）对于外国银行，只于协助方面供给现款；（四）将历来充分准备情形，报告商会、财政部及新闻界。”在天津，该市商会召集全体会董，讨论救济办法到会者五十余人，天津中、交两行经理下寿孙、林熙生均参加，双方筹议结果，“先由救济贫民入手，仿照民国五年办法，由三津磨房商（即米面铺）收受中、交钞票，凡以中、交钞票买米面者，一律照常收用，以免贫民恐慌”。同时，商会与政府各部门商讨救市方案，政府各部门表示赞同商会上述等议办法，先通令米面铺一律使用中、交钞票，以稳定市面，再筹巨款兑现。上海受京津地区挤兑危机的波及，“向中、交两行兑现者较平日为多，中行则较平日多兑出七八万元”，为消除民众疑虑，“两行除在本行照常兑现之外，还委托福源、福康、永丰、宝丰等钱庄代为收兑，及虹口、法租界、英租界、南市各小钱庄，亦均十足兑现”。因中、交两行准备充分，上海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挤兑危机。

11月17日，事态进一步恶化，“从前各代兑之小钱庄，已将代兑牌子撤去，表示完全不负责”，“至各商店、各钱庄，对于两行纸币，确多拒绝不用”，交行纸币甚至每元跌出九角。因挤兑压力巨大，中国银行开始限制每人兑现10元，交通银行也于同日宣布即日起限制兑现，每人每次只兑给十元。北京银行公会决定通力合作，共筹现款，维持两行钞票，京师军警、商会也全力配合，四出劝谕，引导商号、民众不参与挤兑。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也号召会员银行、钱庄代兑中、交钞票。下午三时，京师商务总会召开临时会议，各商界领袖先后发言表示合力维持市面，商请政府交通、税收各机关，不收现洋，只收中、交钞票，速催外交团即日拨付关余，并承诺米面柴炭均不会随意加价。傍晚，财、交两长及银行要人，在张志潭宅会议，并致电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沪宁各路局，收用中、交钞票，不得抑勒。在上海，因来自京津的各种消息，传闻不一，昨日还较为稳定的金融业，现在也趋于紧张，上海银行公会于该日下午召集20家会员银行，在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今日沪市甚为安宁，中、交两行并无兑现危机，当即决议公电各埠银行公会及商会，其电文曰：各埠银行公会钧鉴，日来京津谣言甚重，其中必有阴谋，沪市金融界甚安，中、交两行并无兑现危机，谨此奉达，乞转示同业，以安人心。同时银行公会提议，在会各银行自应团结团体，互相扶助，倘有意外危机发生，各家当协力相助，庶足以表示实力，得到参会各银行赞成，同时派员与钱业接洽，务使沪上金融机关，团体益加巩固”。

对于日趋紧张的金融局面，11月18日，21家大银行在银行公会开会，决定一面由同业共同负责，力谋中、交之安全，一面请政府从速通各省各征收机关，对于天津、张家口中、交钞票，不限地域，一律照现洋收用再由交通部电令各路局，对于前项钞票，不得留难，并请币制局令各处造币厂赶造银币，以资周转。为响应银行公会的号召，北京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前门一带散发传单，声明存款专收两行钞票。京师总商会印刷大量传单，四处散发，动谕商民勿信谣言，为西方国家阴谋所利用

，下午四时，“大栅栏一带照相馆，已有贴出收用中、交票之纸牌，及六七时而布店洋货店等亦有同样之纸牌挂出”。上海方面尤其注意舆论的作用，为消弭传言与误解，上海银行公会主动邀请报界人士召开谈话会，由银行界徐寄庾、姚仲拔、朱羲农等人主持，告之京津挤兑纯系谣言所致，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双方已联络互助，准备充足，不仅可以自保，还有余力扶助京津、汉口等地，并承诺此后京津等地方金融消息，逐日照实公布，以免引起社会不实猜测。总商会长虞和德同日致电汉口银行公会，大意为北京中国银行照常兑现，各商业银行已宣布所有中行钞票，一律视为现银，收作存款，请汉口银行公会转告汉口各界，以免混淆视听。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特通电本路会员，共同维持，以固金融界信用，并发有招贴一种，上书“中交钞票照常收用”字样，张贴各家门首，报关业也宣布照常收用中、交钞票。

在银行公会的协调下，北京14家商业银行19日与中国银行订约，以中行钞票等同现金代做存款，协议将要签订之时，中途交行要求加入，但因交行信誉不及中行，“各商业银行，则对于交行加入，以为力不能逮，不允合订与中行同一之合同”。代做存款的方案搁浅后，14家银行又于11月19、20两日连续商讨以设立总金库、发行库券的方式收回中、交钞票，其具体内容为：在北京银行公会之下设立“附取存中交津口券临时公库”，其做法是中、交两行以确实担保品，交由公库作为抵押，由公库发行库券，此库券专门用以收兑中、交两行钞票，凡以中、交两行钞票购买库券者，视同在公库开立定期存款户，期限一年，年息一分，发给公库存单，到期由公库以现金付给；此后中、交两行发行兑换券，由公库组织之；如抵押品不足时，应由两行另筹现金补充交足，并由两行负完全责任。对于14家商业银行来说，各行所以愿收高利息之存款的原因，一方面“固以利害相关，不能不尽互助之义务”，另一方面“就近来社会习惯言，普通借款，利率本来甚大，以一分收入者，不妨以二分借出，于营业一方，亦毫无所损，所以信任不疑，一则存票于公库，万无再由中行自由发用之事，二则有关余以资担保，更可放心”，是以当时方案一经提出，无不赞成。但问题在于，该项方案实质上是由会员银行联合组一公库，由公库发行库券易回中、交钞票，而以后中、交两行，当然不再发钞票，“盖藉收两行发行钞票之权也”，如此方案在中、交两行看来无异于乘人之危，自然不能同意。京师总商会也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除因总库发行库券还未经财政部批准，不能视为合法之外，还因为中、交两行钞票在商界流通已久，认同度高，若贸然以所谓库券代替中、交两行钞票，未免会引起商业变动。在中交两行与总商会表态之后，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亦以该方案“似非为维持而为谋利”，表示不能赞同。该项方案尽管受到舆论界的好评，认为是银行界联合的一大标志，然最终因触及中、交两行的根本利益，致各方意见分歧而流产。

被危机波及的其他商埠，同业互助在平息事态方面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汉口，在京津挤兑危机消息传到当地后，武汉商会、汉口商会第一时间致函各商户，劝导勿听外人谣言，坚持兑现中、交钞票。11月16日中午汉口银行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交两行每日延长兑现时间至下午五点，并委托各银行、钱庄代为兑现。经过协调，中国银行委托兴业、盐业、金城、中孚、聚兴诚、华丰、四明、上海、懋业等银行以及德丰、同德、汇通、丰盛、太和、广大、久和、泰康等钱庄代为兑现，交行则委托金城、懋业、华丰盐业各行及泰昌、同德、丰盛、久和、太和、德丰、广大、汇通等钱庄代为兑现。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1月18日，汉口商会、各银行负责人以及政界要人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制订应对危机办法六条：“由汉口各银行委托造币厂，多铸银元，以为现银发生恐慌之预备；江汉关及同地军警，于舟车出境时应切实检查，防止现银输出；银行公会、钱业公所及官钱局，随时在汉口开联系会议，维持营业信用，以免纸币发生拥滞；由军民两署，出示禁止武、阳、夏三镇钱商，任意压抑票价，如违则永远停止其营业；由陈交涉员非正式向汉口外交团声明，汉口各银行资本雄厚，营业稳健，绝无意外之虞，请勿为谣言所惑，丧失从前好感；由汉口银行团，电请京津沪各埠银行，从速召开全国银行联合会，共商自决办法”。会后武汉及汉口商会通告各商户，对中、交钞票，一律悬牌照兑，不得拒绝。各方努力之下，汉口的挤兑危机在三日之后即告平息，前后共兑出现金200余万元。

综观此次中、交挤兑危机的解决，实赖同业之间良好之互助。仔细观察同业互助的内容，大致可分为这么几种形式：其一，资金支持。当某银行发生挤兑危机时，其他银行以借款、垫款等形式向其输送现金头寸，帮助其渡过危机。前述上海中国银行向天津中国银行拨付的150万元、东三省官银号与奉天兴业银行向交通银行的400万元借款皆属此例。其二，业务支持。这种互助形式在银行业同业互助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此次挤兑危机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代兑中、交两行钞票，各银行、钱庄代兑中、交钞票，不仅可以暂时减轻两行在兑现方面的资金压力，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众参与挤兑的心理，有利于尽快平息危机。其三，舆论支持。商会、银行公会等同业组织在危机发生之时，利用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联络政府、工商及舆论各界，集体发声，揭露虚假谣言，披露真实信息，引导舆论方向，对迅速消弭谣言的传播与负面影响，以正视听，发挥了关键作用。舆论对平息此次挤兑危机中同业互助的作用大家赞赏：“中交受波动，他行起而协助之，宜也，钱业起而声援之，亦宜也，微独金融界，一般商民，共持镇静，而不为无稽之言所驱策，不可谓非我国人进步之征。”

1920年代及其之后发生的诸多金融危机与危机中，能够发现越来越普遍的同业互助案，如1923年9月中南银行钞票在北京发生挤兑，因其在京并无分行，遂由同属北四行的金城、盐业、大陆三行负责代兑，将兑现时间延长至每日傍晚六时，并将多数现洋分交代兑之钱铺，以便十足兑现，以免引起挤兑，连续不断的十足兑现缓和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三行总共仅以10万元左右的现金即平息了此次挤兑危机。1926年11月汉口中国银行突发挤兑危机，一时兑现者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该行除一面积极应付外，一面商由上海、浙兴、浙实、中孚、四明、聚兴诚等银行，代为兑现，经各方面两日之维持，始渐平息。1927年秋，天津协和贸易公司为弥补资金短缺，以空头栈单欺骗顾客与银行，被揭发后倒闭，该公司倒闭后亏欠各银行600万元不能清偿，导致一家银行、六家银号以及三家外商华账房倒闭，一时全市银根紧缩，人人自危。

脚注和尾注

1.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5）》，第S73页。

2.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3. 《北京中交银行挤兑危机始末》，《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6号，1921年12月第15页。
4. 《金融危机之经过》，《银行月刊》第1卷第12期，1921年12月，第1页。
5. 《北京金融界危机别报》，《申报》1921年11月19日，第11版。
6. 《金融危机之经过》，《银行月刊》第1卷第12期，1921年12月，第12页。
7. 《中交兑现之昨讯》，《申报》1921年11月18日，第14版。
8. 《北京中交银行挤兑危机始末》，《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6号，1921年12月第16页。
9. 《银行公会之紧急会议》，《银行周报》第5卷第45号，1921年11月22日，第20页。
10. 《中交两行挤兑之第四日》，《（申报）1921年11月21日，第10版。
11. 《国内专电》，《申报》1921年11月23日，第7版。
12. 《维持金融声中之公库办法》，《申报》1921年11月24日，第11版。
13. 《金融危机之经过》，《银行月刊》第1卷第12期，1921年12月，第23页。
14. 羲农：《兑现潮中之舆论一斑》，《银行周报》第5卷第46号，1921年11月29日第20页。

7.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7部分

总字数：8302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61.5%(5109) 疑似剽窃观点：(0)

1	近代天津金融史上的创举: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下) 王丹莉;王曙光; - 《金融博览》 - 2018-08-07	33.2% (2760) 是否引证：否
2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3-11	20.5% (1698) 是否引证：否
3	6-马长伟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3-06	20.5% (1698) 是否引证：否
4	马长伟毕业论文2014提交版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6-03	19.7% (1636) 是否引证：否
5	近代天津金融史上的创举: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上) 王丹莉;王曙光; - 《金融博览》 - 2018-07-08	5.0% (415) 是否引证：否
6	北洋时期银行界关于合并联合的争议 田兴荣; -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 2013-01-25	4.7% (394) 是否引证：否
7	近代银行家：中国金融创新思想的先驱（1912—1949） 董丽(导师：吴申元)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5	4.1% (337) 是否引证：否
8	1003420072031_张华_金融学院_博士 张华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3-04-09	3.9% (323) 是否引证：否
9	联营:民国时期华资商业银行的组织创新与实践——以北四行为例 马长伟;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8-09-12	3.5% (293) 是否引证：否
10	侨商中南银行钞票的印制及其发行制度 马长伟; - 《南洋问题研究》 - 2015-12-30	3.3% (274) 是否引证：否
11	中南银行纸币的版式及其发行制度 马长伟; - 《湖北钱币专刊（总第14期）》 - 2015-12-10	3.3% (272) 是否引证：否
12	中国商业银行民营思想的发展 李苍海(导师：叶世昌)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8	2.6% (215) 是否引证：否
13	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17—1937） 诸静(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26	1.6% (136) 是否引证：否
14	侨商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权研究 马长伟; - 《南洋问题研究》 - 2013-06-30	1.3% (105) 是否引证：否
15	职业经理人与近代中国金融变迁 彭珊珊(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2014-04-10	0.8% (70) 是否引证：否
16	近代中国银行联合兼并活动探析 兰日旭; - 《青海社会科学》 - 2009-05-30	0.8% (67) 是否引证：否
17	民国时期北四行汉口准备库述评 田兴荣; -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1-08-30	0.7% (59) 是否引证：否
18	吴鼎昌与盐业银行 孙耀东,宋路霞 - 《中国企业家》 - 2003-02-08	0.5% (38) 是否引证：否
19	近代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 张晓辉; - 《暨南史学》 - 2007-12-31	0.4% (33)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为稳定金融市面，由天津银行公会出面，筹资50万元，用押款方式接济一时周转困难的行号，外商银行也紧急从上海调运白

银50万两接济市面，紧张情况才得以好转。1932年2月上旬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兑，中国、交通、金城等14家银行调拨了120万元临时借款予以接济，该行才得以脱险，等等。这些银行业相互合作与互助的案例皆可说明，同业合作与互助对银行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加强银行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是保障银行业安全的重要措施。事实上，在各地银行公会等同业组织的协调下，1920年之后，银行之间在金融危机中的同业合作与互助逐渐受到重视，并有加强的趋势，通过同业合作与互助，银行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凸显了行业整体实力，抵抗危机的能力得以增强。

三、四行联营

“北四行”联营组织的构建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这种合作，不仅提高了参与联合的银行的信誉和实力，也极大地降低了它们本应独自承担的运营风险，增强了抵御危机的能力和信心。除此之外，民营银行还以其他方式进行着广泛合作，这成为它们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一种手段。

在华资银行出现之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它们垄断国际汇兑、控制对外贸易、利用政治上的特权为清政府提供借款从而掌握中国的财政命脉，同时还大规模吸收存款、发行钞票、开展普通商业银行业务。而我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并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能力。只是凭借着对传统的商业融资业务的熟悉和在贸易清算中与外资银行建立起来的联系而在市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华资银行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它们开始在许多业务领域中成长为外资银行和钱庄的竞争者。此时，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形成了一种“垄断竞争”的局面，作为竞争对手，外资银行、华资民营银行和钱庄向市场提供具有一定差别，但在某些领域又非常接近甚至具有替代性的产品和服务，只是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了求得发展，华资民营银行常常要开拓新的市场或寻觅新的途径，毕竟和财力雄厚历史悠久的外资银行相比，刚刚起步的华资银行实力显得十分薄弱。

1.“北四行”联营集团的构建

北四行”联营集团的构建是近代民营银行通过联合谋取发展的一个最典型、最突出的实例，也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银行尚未形成对金融业的绝对垄断地位，私营商业银行在外国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双重压迫下，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银行数量的急剧膨胀，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银行因资金薄弱，信用未固，加之经营方法陈旧，不能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支持工商业发展，甚至自身生存都难以保障，成立不久即告倒闭。有鉴于此，有关学者主张商业银行应合并、联合，以增强实力。

1919年，于树德发表《银行之合并与联合》一文，认为：“我国所以有今日之贫弱者，因经济不能自给独立也；经济不能自给独立，因产业不发达也；产业不发达，因无充足供给之资金也；无充足供给之资金，因无巨大之金融机关也；而所以无此机关者，则以无完备进步之组织故也。”中国的银行缺点很多，如资本微小，信用薄弱，经营方法笨拙等，不能以巨额资本借给产业界。欲改变这些弱点，亟宜实行合并与联合。合并是世界各国银行发展之大势，英、美、日等国无不竭力谋银行之合并，以发展经济于海外，与各国竞争。中国的银行只有合并联合，才能抵抗外国银行侵略，获得生存与发展。所以，“国家兴盛，系于金融；欲救贫弱，则以改良金融机关之组织为急务。”

该文指出，所谓合并是指数个或数十个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另立总行，以合并之银行为其分行，或以合并银行中最大之银行为总行，余者为分行。联合是指数个或数十个独立之银行“相约为共同行动之结合也”，各银行仍各自独立，但须负共同行动之责任。

1921年，郑维均发表《论小银行联合组织之必要》，主要探讨银行联合组织问题。他认为，中国当时所办银行，除少数外，大多规模甚小，资力薄弱，信用不固，如不改善方法，难免于天然淘汰。欲谋改善方法，则应实行联合组织。所谓联合组织是指集合多数银行而成一个银行。联合之目的有三：一是集小资本而为大资本，集小信用而为大信用；二是业务藉之以发展，经济赖之以活动；三是营业稳当，利益亦得以增加。关于联合银行组织的方法，他建议：第一，联合各地薄资之银行，结成一团体；第二，公推一总行，统理一切；第三，凡经联合之各银行间，订明条约，互相遵守；第四，各银行虽各自分立，可相约共同之行动；第五，有亏分担，有利均沾。小银行通过上述方式组织联合，可以获得两大好处：一是联合各银行得以互相援助，不啻自设分行于各地；二是集多数银行之力量，则事易举而利易得，无复有颠蹶之虑。

徐沧水、羲农、姚仲拔等学者也纷纷撰文，主张银行合并联合。

银行经营者中最早提出组建商业银行联合体的是金城银行沪行经理田少瀛。1919年8月，鉴于第一次停兑危机中，京、津等地中、交两行停兑，外国银行滞发，中国通商银行等借机大发钞票获得厚利的情形，田少瀛等感到“若不早为设法，权利竟被他人占去”，遂向总管理处提出由金城、盐业各出公积金，成立中国联合银行的建议，并草拟了组织大纲，规定该行“由完全华股银行集股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其营业范围为：呈请政府特许，得发行通用货币兑换券；贴现银行钱庄之短期票据；抵押放款于银行钱庄；代理发行国家及公共团体之债票；代理发行公司股票及债票；买卖生金银及其他货币；经理外国汇兑。当时因条件尚不具备，此项提议并未付诸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设银行的增加和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银行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此时又一次提议：“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拟与金城、中南两银行联合营业”。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的积极响应，三行本着“互相辅助、调剂金融、提倡储蓄、发展实业”的目的，成立了三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共同设立储蓄处、调查处、企处，以200万元的联合营业基金为基础开始对外营业。后来，在三行邀请之下，著名的大陆银行也加入，从而形成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民营银行间一个规模最大的联合组织——“北四行”联营集团。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仅有规范的制度保证，还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四行储蓄会、四行准备库、四行信托部及调查部都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2. 四行联营的具体形式

前文中曾经提到，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币制以前，很多银行不论是华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享有发行钞票的权力，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省地方银行以及民营银行中的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等都可以发行钞票。社会上流通着各种各样的兑换券，由于缺乏必要的信用和政局的动荡，致使提存挤兑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银行也难以幸免。而外资银行发行的钞票信誉相对要好一些，中南银行在向政府争取货币发行权时理由之一即自己是华资银行，若能获准发行货币则“一方可减外券发行之力，一方可增内国经济之资”。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一家因系华侨资本，故虽成立较晚，亦获得了钞票发行权，而其他三家均无此权力，以领用中交两行兑换券为主。

四行联营后，“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保持社会流通之信用起见，特将本行发行钞票规定十足准备之章程，联合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设立四行准备库，公开办理，以昭核实”。而“准备库职务专办钞票之发行准备金之存储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不兼作其他营业”。而且，四行准备库有专门的机构，“无论在何地方均须特立机关设置于四银行之外”。可以说，成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北四行”联营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一举动对于树立并巩固中南银行兑换券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联合准备库成立后，相继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设立分库，办理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由四行委派专人负责，规定所有库内资金不得移作他用，且账目独立并定期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登载于《银行周报》及各大报刊公示。而各行在领用钞票时都必须严格执行“十足现金准备”的约定，后来这一标准虽然有所降低，但各行仍须以至少六成的现金和至多四成的保证（如放抵押品的地契证券等）向四行准备库换用钞票。

“北四行”的合作使中南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很快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其发行额也逐年递增。1922年四行准备库成立之初，发钞额为250万元，在当年的全国重要发行银行总额中仅占2.12%，1923年发钞额即上升为1407万元，占10.01%，而当年交通银行发钞额为3852万元，占27.4%，到1935年时四行准备库印钞多达1.03亿元，其中流通券7728.24万元，在当年全国重要发行银行发钞总额中占12.28%，高于占11.86%的交通银行而位于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排在第三位。直到1935年底国民政府执行法币政策，收回普通商业银行货币发行权时，四行准备库才宣告结束。

联营集团的一个更重要的合作项目是四行储蓄会的创办。其时“国内储蓄大都偏重抽签给奖，储蓄者历久不中，已生灰心”，四行领导人认为这正是提倡正当储蓄的大好机会，于是便有了四行储蓄会的创办。就制度形式而言，四行储蓄会可以说是当时民营银行业的一种经营创新，因为它与各行下属的储蓄部经营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四行储蓄会实行会员制，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行为基本会员，各出资25万元，作为储蓄会的基本储金，而其他储户均为会员，他们除了可以得到按周息七厘计算的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分享红利。储蓄会每半年结算一次，“除去各项开支及储金七厘利息外，如有盈余，应先提公积一成，余作十成分配，以五成为红利”，如果没有盈余甚至有所亏损的话，则由基本会员“负保本保息之责”，即不论怎样，都可以确保储户的固定利息收入。

当时的四行储蓄会主要经营五种储蓄存款，其计息和分红方法都与一般的银行不同：（1）活期储金，一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分存折、支票两种，利率为周息4厘及3厘，此种存款不参加年终分红；（2）定期储金，定期2年次交纳50元者为一份，按份存储，周息7厘，连同应分红利每年复利一次（3）分期储金，每月缴纳2元，至25个月满期者为一份，得存半份。周息7厘，每次结算时可按存款多少分享红利；（4）长期储金，定期10年，每份50元，按份存储。周息7厘，1926年以前每年计息一次，后改为每半年复利一次；（5）特别储金原则上本金须在万元以上，期限须在一年以上，金额和时间由会员自定，利率仍为周息七厘，其他计算方法同长期储金。而且，四行储蓄会的章程中对于存款的用途也有严格的规定，为确保安全，储金几乎不参与工商业放款，而主要用于以下投资：“国家或地方有确实基金之债券购入或抵押；各繁盛商埠之地产及房产押款；生金银及外国货币押款；本会储蓄证为抵押之押款”，等等。四行储蓄会以其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回报吸引了大量存款，其增幅令人惊叹。而它的成功运营无疑对提升“北四行”的社会形象和信誉有很大帮助。

除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以外，北四行还曾共同设立过四行信托部、四行企业部、四行调查部等联营机构。信托部主要是经营信托和商业银行业务，而企业部和调查部则是为四家银行和储蓄会办理一些信用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但这些机构的影响都不如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

“北四行”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联营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说中南银行经理胡笔江和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曾是交通银行的旧同事，周作民与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曾为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先后同僚，三人关系非同寻常，且同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只不过后来吴、胡二人又加盟其他银行。而大陆银行经理谈荔孙与吴鼎昌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就读时就是同学，私交甚好，回国后又都曾供职于中国银行，谈与周还有亲属关系，这种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四行的合作更容易达成。然而，对于提高信誉、扩展业务、增强实力的迫切要求才是促使四行最终走向联合的关键要素。

3. 四行联营的特殊意义

从本质上看，“北四行”的联营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业发展初期进行信用联合的一次尝试。概括而言，银行的业务可以被简单地分为“受信”与“授信”两大类，其中“受信”是基础，如果不能获取公众的信任并有效地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银行的“授信”业务便根本无从开始。四行联营两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前者是以四行共同信用为担保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兑换券，而后者则是通过四行共同出资、推广保底储蓄的方法来大量吸引存款。虽然四行联营后也经办了一些联合放款的业务，比如对交通银行、裕元纱厂、大生纱厂的贷款等，但毕竟为数不多，不像准备库和储蓄会那样一直是四行联合经营的重点。

“北四行”的联营可以说是“华资商业银行联合营业之先声”，但它们为什么在合作之初选择准备库和储蓄会作为经营核心是

值得思考的。不难发现，不论是四行准备库，还是四行储蓄会，都是为了“受信”而服务的，事实上是借助于四行的联合来提高声誉，赢取公众的信任。大部分华资民营银行都成立于民国初年，它们的发展在当时应该说才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而面临的对手却是资历雄厚、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在这种境况下，要争夺外商银行的市场份额、为自身树立起一定的社会信用并不容易。由于单个银行的力量过于弱小，因而北四行的合作从为“受信”服务开始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必然选择。

四行联营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于联营组织以及四家银行本身的信任程度。从中南银行兑换券历经几次挤兑都依然信用昭著和四行储蓄会不断增长的存款总额来看，北四行的联营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以相关数据为例，单就储蓄存款而言，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已高达1.14亿余元，在当时重要的华资银行中名列榜首，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四家银行也位居前列。其次，通过联合降低运营风险。早在联营之初，它们即已确立主旨：“（1）在平时联合，如共同投资于实业，可使范围扩大；（2）在有事时联合，可使危险减少。国家银行实际既不可恃为后盾，经营商业银行自不得不与同业携手”。在近代银行产生、发展的最初三四十一年里，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承担起监督、管理、担保等职能的中央银行，这里所谓的“国家银行”指的是具有一定官方银行色彩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由于和一些民营银行的特殊联系，它们常能在后者遇到困难时提供一定的援助，但这种帮助是随机性的，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四行准备库的出现事实上就是对央行部分职能的替代，只不过作为一种保障和抵御风险的机制，它还只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但却足以以为“北四行”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减少了可能面临的挤兑风险，而联合开展业务也利于各行经营风险的降低。再次，联营有助于壮大四行的实力。这不仅表现在四行储蓄会为它们赢得了更多的可支配资金，更重要的是，联营增强了四行彼此之间的协作和互助，从而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和成本，提升了它们的整体竞争力。

而“北四行”的联营方式本身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金融机构为了提高自身信誉、分散风险而加强协作，这一点即使是在传统的金融机构票号、钱庄中也不乏先例，但一般多以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是加强自身各分支或关联机构之间的联系，通过互通信息、调剂余缺等方式来实现巩固信用和共担风险。比如票号中著名的“蔚字五联号”——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蔚丰厚，五家票号的东家都是以当时介休北贾村的侯氏家族为主，长期以来，它们一直以蔚泰厚总经理为首，主持和协调集团内的一些重大决策。第二种则是以某项具体的业务为载体进行暂时性的合作，比如上海的钱庄有时也会组织放款银团，联合对工厂放款等。而“北四行”的联营与这两者都不同。在第一种方式下，协作般局限在一个经营主体或集团之内，在第二种方式下，协作的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会随着合作项目的结束而很快终止。而四行准备库与四行储蓄会等组织的创建，却实现了多个独立的经营主体之间更深入的协作关系。“北四行”的联营显然不是民营银行间单纯的业务上的交叉与互助，而是一种联系更加紧密、运营更加规范和制度化的合作。为了实现联营，它们特别制定章程，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派设专职工作人员，这种方法在确保了联合营业的同时，又没有影响各家银行的独立性，“营业既各不牵涉，合作亦不受束缚，且有互相扶助之义，确是发展营业巩固行基之一办法”，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业组织与经营方式的一次创新。

4. 联营中的矛盾

北四行联营，毫无疑问，理应得到业界学界高度赞扬和肯定，一直以来也确实如此。不过，四行之间似乎也不无嫌隙，尤其是具有钞票发行权的中南银行和另外三行之间。在上海档案馆所藏中南银行档案中，即有一份文件反映出这一问题，文件日期为1931年1月6日，现照录如下：

查南行发行权，本为前北京政府专赋与中南银行，为侨商第一次以重资在本国经营实业之奖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行仍依前例，呈请财部，如案核准，并饬谨慎办理在案。南行自应本此谨慎之旨，策励进行，尤愿矢守前此利不自专之素志，仍与三行共同组织，准备专库，公开办理，藉谋巩固通货之信用，及社会持票人之利益。但南行溯念自与三行共同组织准备库以来，利益所在一化为四，俾四行平均享受，而每遇挤兑风潮，则各埠三行以钞票票面只见中南银行四字，即因此百万谋所以巧避其害，而一面仍阴收其利，类如挤兑时，持票人至三行兑取现金，三行深恐兑现者麇集其门，而引起顾主之疑虑，致动摇其营业，辄即票面所载文字，推至南行兑取。而一般意识较差之同人，急不暇择，语失检点，甚至有深陷南行于不利者。凡三行避去之害，皆归南行独受之。迨至交涉结果，三行有贴条于门首者，非曰本行展长办事时间代兑中南银行钞票，即曰本行收用中南银行钞票，辞气之间，一方显示人以南钞与彼无干，一方以自形其从容不迫，而暗示彼之代兑及收用南钞者，只为顾全市面，急公好义之举耳。北方历次挤兑风潮，以及南方齐卢战争时之风潮，莫不有此怪象。似此顾利忘义之举，欲求风潮之平息，何异抱薪以救火。南行处此情势之下，艰难痛苦固无待南行之自述，三行一库同人，应无不瞭然于心目之中。试使易地而处，情势如何？一利分而四，三害归于一，南行因公而独受其灾，三行分利而毫无所害，平心而论，公道何存？总计三行均利南行专害以来，各埠南行总分行前后营业上所受之影响，以及时时戒备不能尽量营业之损失，无可数计。忍痛十年，而三行一库始终未有均利分责改善之方，前途修远，南行非利之图，惟害是惧，在三行似不当使之惧无已时也。再查钞票票本及四库一切开支，当初办时，载在章程及规约，由四行分任。而初办时库利未见，开支不敷，则欠在库，前后票本综计几及百万元，又始终挂欠在库，而四行所恃为足以填补者，则在库会未来不可知之利益。库会未来之利益涓滴有无，原为四行所当分受，但遽以此遥抵四行责任上所应分担之票本及四库开支，则原订规约之根本精神已破矣。又四行于库钞，依规约原则，四行对库只应专负推行责任，库于四行，则应负办理四行所在地之兑现事宜，以及四行推行库钞已及地方之代兑及自兑一切事宜。而四库又当认明其所承办发行之钞票，是南行与三行合组付托，但票面责任、主体责任，仍在南行。四库对中南，又当专负保管现金及保证准备，以免除中南对政府、对社会所负各行库发行之中南钞票危险责任。原约条文或未明显真正精神，自系如此。应请三行一库分别认清，加以详细规定。近来四库对四行分存准备金之情形，一埠两行即可同样请求分存准备。此端既开，一埠次第而有三行四行者，势必援例请求，各谋其利，此实与行任推进库任保管之根本精神，又一违背。三行与南行所组四库

，其利于三行处，三行仅知为保证准备，其实最大者，在领用额无限制，而兑现及往来输送，烦难危险，又专属之于四库。质言之，即害不属于一行也。试观国内其他有发行权之各行，对于其他无发行权之各行，领券手续制限极严，领用额数严之又严。上海一埠，如上海商业、浙江兴业等，之于中国、交通，倍极感受领券制限之苦。所以限制甚严之故，实鉴于领用行仅有领用利益，而无兑现之烦及输送票现风险也。与南行合组四库之三行，尽量领用，毫无限制，不烦兑现，而风险又四行平均分负之。而各埠各行当事，似只知其片面之利益，而忘却其分担之责任，于钞票领用时，则争先恐后，于推行时则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div>1. 四行”联营组织的构建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这种合作，不仅提高了参与联合的银行的信誉和实力，也极大地降低了它们本应独自承担的运营风险，</div> <div>2. 四行”联营集团的构建</div> <div>北四行”联营集团的构建是近代民营银行通过联合谋取发展的一</div> <div>3. 中国的银行缺点很多，如资本微小，信用薄弱，经营方法笨拙等，不能以巨额资本借给产业界。欲改变这些弱点，亟宜实行合并与联合。</div> <div>4. 所谓合并是指数个或数十个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另立总行，以合并之银行为其分行，或以合并银行</div> <div>5. 1921年，郑维均发表《论小银行联合组织之必要》，主要探讨银行联合组织问题。他认为，中国当时所办银行，</div> <div>6. 联合各地薄资之银行，结成一团体；第二，公推一总行，统理一切；第三，凡经联合之各银行间，订明条约，互相遵守；第四，各银行虽各自分立，可相约共同之行动；第五，有亏分担，有利均沾</div> <div>7. 从而形成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民营银行间一个规模最大的联合组织——“北四行”联营集团。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仅有规范的制度保证，</div> <div>8.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省地方银行以及民营银行中的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div> <div>9. 。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一家因系华侨资本，故虽成立较晚，亦获得了钞票发行权，而其他三家均无此权力，</div> <div>10. 。可以说，成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北四行”联营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一举动对于</div> <div>11. 联合准备库成立后，相继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设立分库，办理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由四行委派专人负责，规定所有库内资金不得移作他用，且账目独立并定期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登载于《银行周报》及各大报刊公示。</div> <div>12. 北四行”的合作使中南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很快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其发行额也逐年递增</div> <div>13. 。直到1935年底国民政府执行法币政策，收回普通商业银行货币发行权时，四行准备库才宣告结束。</div> <div>14. ，四行领导人认为这正是提倡正当储蓄的大好机会，于是便有了四行储蓄会的创办。就制度形式而言，四行储蓄会</div> <div>15. 当时民营银行业的一种经营创新，因为它与各行下属的储蓄部经营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四行储蓄会实行会员制，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行为基本会员，各出资25万元，作为储蓄会的基本储金，而其他储户均为会员，他们除了可以得到按周息七厘计算的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分享红利。储蓄会每半年结算一次，</div> <div>16. 而且，四行储蓄会的章程中对于存款的用途也有严格的规定，为确保安全，储金几乎不参与工商业放款，而主要用于以下投资：</div> <div>17. ，等等。四行储蓄会以其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回报吸引了大量存款，其增幅令人惊叹。而它的成功运营无疑对提升“北四行”的社会形象和信誉有很大帮助。</div> <div>除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以外，北四行还曾共同设立过四行信托部、四行企业部、四行调查部等联营机构。信托部主要是经营信托和商业银行业务，而企业部和调查部则是为四家银行和储蓄会办理一些信用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但这些机构的影响都不如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div> <div>“北四行</div> <div>18. 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联营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说中南银行经理胡笔江和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曾是交通银行的旧同事，周作民与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曾为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先后同僚，三人关系非同寻常，且同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只不过后来吴、胡二人又加盟其他银行。而大陆银行经理谈荔孙与吴鼎昌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就读时就是同学，私交甚好，回国后又都曾供职于中国银行，谈与周还有亲属关系，这种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四行的合作更容易达成。然而，对于提高信誉、扩展业务、增强实力的迫切要求才是促使四行最终走向联合的关键要素。</div> <div>19. 四行”的联营是近代华资民营银行业发展初期进行信用联合的一次尝试。概括而言，银行的业务可以被简单地分为“受信”与“授信”两大类，其中“受信”是基础，如果不能获取公众的信任并有效地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银行的“授信”业务便根本无从开始。四行联营两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前者是以四行共同信用为担保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兑换券，而后者则是通过四行共同出资、推广保底储蓄的方法来大量吸引存款。虽然四行</div> <div>20. 为什么在合作之初选择准备库和储蓄会作为经营核心是值得思考的。不难发现，不论是四行准备库，还是四行储蓄会，都是为了“受信”而服务的，事实上是借助于四行的联合来提高声誉，赢取公众的信任。大部分华资民营银行都成立于民国初年，它们的发展在当时应该说才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而面临的对手却是资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在这种境况下，要争夺外商银行的市场份额、为自身树立起一定的社会信用并不容易。由于单个银行的力量过于弱小</div>

，因而北四行的合作从为“受信”服务开始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必然选择。

四行联营

21. 积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于联营组织以及四家银行本身的信任程度。从中南银行兑换券历经几次挤兑都依然信用昭著和四行储蓄会不断增长的存款总额来看，北四行的联营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以相关数据为例，单就储蓄存款而言，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已高达1.14亿余元，在当时重要的华资银行中名列榜首，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四家银行也位居前列。其次，通过联合降低运营风险。
 22. 在近代银行产生、发展的最初三四十年里，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承担起监督、管理、担保等职能的中央银行，这里所谓的“国家银行”指的是具有一定官方银行色彩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由于和一些民营银行的特殊联系，它们常能在后者遇到困难时提供一定的援助，但这种帮助是随机性的，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四行准备库的出现事实上就是对央行部分职能的替代，只不过作为一种保障和抵御风险的机制，它还只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但却足以以为“北四行”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减少了可能面临的挤兑风险，而联合开展业务也利于各行经营风险的降低。再次，联营有助于壮大四行的实力。这不仅表现在四行储蓄会为它们赢得了更多的可支配资金，更重要的是，联营增强了四行彼此之间的协作和互助，从而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和成本，提升了它们的整体竞争力。
- 而“北四行”的联营
23. 每遇挤兑风潮，则各埠三行以钞票票面只见中南银行四字，即因此百方谋所以巧避其害，而一面仍阴收其利，类如挤兑时，持票人至三行兑取现金，三行深恐兑现者麇集其门，而引起顾主之疑虑，致摇动其营业，辄即票面所载文字，推至南行兑取。而一般意识较差之同人，急不暇择，语失检点，甚至有深陷南行于不利者。凡三行避去之害，皆归南行独受之。
 24. 显示人以南钞与彼无干，一方以自形其从容不迫，而暗示彼之代兑及收用南钞者，只为顾全市面，急公好义之举耳。
 25. 南行处此情势之下，艰难痛苦固无待南行之自述，三行一库同人，应无不瞭然于心目之中。试使易地而处，情势如何？一利分而四，三害归于一，南行因公而独受其灾，三行分利而毫无所害，平心而论，公道何存？总计三行均利南行专害以来，各埠南行总分行前后营业上所受之影响，以及时时戒备不能尽量营业之损失，无可数计。忍痛十年，而三行一库始终未有均利分责改善之方，前途修远，南行非利之图，惟害是惧，在三行似不当使之惧无已时也。
 26. 库会未来不可知之利益。库会未来之利益涓滴有无，原为四行所当分受，但遽以此遥抵四行责任上所应分担之票本及四库开支，则原订规约之根本精神已破矣。
 27. 只应专负推行责任，库于四行，则应负办理四行所在地之兑现事宜，以及四行推行库钞已及地方之代兑及自兑一切事宜。而四库
 28. 票面责任、主体责任，仍在南行。四库对中南，又当专负保管现金及保证准备，以免除中南对政府、对社会所负各行库发行之中南钞票危险责任。原约条文或未明显真正精神，自系如此。应请三行一库分别认清，加以详细规定。近来四库对四行分存准备金之情形，一埠两行即可同样请求分存准备。此端既开，一埠次第而有三行四行者，势必援例请求，各谋其利，此实与行任推进库任保管之根本精神，又一违背。三行与南行所组四库，其利于三行处，三行仅知为保证准备，其实最大者，在领用额无限制，而兑现及往来输送，烦难危险，又专属之于四库。质言之，即害不属于一行也。
 29. 国内其他有发行权之各行，对于其他无发行权之各行，领券手续制限极严，领用额数严之又严。上海一埠，如上海商业、浙江兴业等，之于中国、交通，倍极感受领券制限之苦。所以限制极严之故，实鉴于领用行仅有领用利益，而无兑现之烦及输送票现风险也。与南行合组四库之三行，尽量领用，毫无限制，不烦兑现，而风险又四行平均分负之。而各埠各行当事，似只知其片面之利益，而忘却其分担之责任，于钞票领用时，则争先恐后，于推行时则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

脚注和尾注

1. 于树德：《银行之合并与联合》，《银行周报》第3卷第46号。
2. 郑维均：《论小银行联合组织之必要》，《银行周报》第5卷第45号。
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 - 79页。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82页。
5.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档案号Q265 - 1 - 3。
6. 《盐业、中南、金城、大陆银行准备库发行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大陆银行档案：Q266 - 1 - 41。
7. 杨天亮：《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评述》，载《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9. 《盐业、中南、金城、大陆银行合办储蓄会规约》及《盐业、中南、金城、大陆银行储蓄会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大陆银行档案：266 - 1 - 41。
1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101-102页。
1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85页。
12.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3. 《大陆银行档案“董事会议事录”》（1922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86页。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43.3%(1030) 疑似剽窃观点：(0)

1	马长伟毕业论文2014提交版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6-03	24.7% (589) 是否引证：否
2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3-11	23.4% (558) 是否引证：否
3	6-马长伟 马长伟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4-03-06	23.4% (558) 是否引证：否
4	1003420072031_张华_金融学院_博士 张华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3-04-09	11.2% (267) 是否引证：否
5	近代中国银行联合兼并活动探析 兰日旭; - 《青海社会科学》 - 2009-05-30	5.3% (127) 是否引证：否
6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 杜恂诚 - 《上海经济研究》 - 1999-05-15	1.6% (38) 是否引证：是
7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 - 学术中华 - 《网络 (http://www.xschina.o) 》 - 2010	1.6% (38)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于行库合办职责所在，漠然无睹。当日四行联合之初衷，原期利害与共，忧乐相同。今既十年之久，屡经朝市变迁，如再不本十年来之经验事实，以谋公道改革之方，必致积害益深，裂痕愈显，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现在国府都于南京，总库及南行总行均在上海，南行既经呈请国民政府继续其发行权奉准如上述，自当根据谨慎办理之令文，鉴后惩前，以期三行一库彻首彻尾为公利公害而改革之。在南行，当考虑谨慎办理之意义，及如何公利而不专害；在三行，当考虑其如何与人均利，而不致人独受害，及如何明定负责推行库钞办法，以协助四库；在四库，当考虑如何不负南行谨慎托付保管现金准备之责，其处置保证准备，应如何可以随其需要，随时使四行合成十足现金，俾不妨害其尽量兑现。又平时关于内地各埠分设库、会及委托代兑家，如何可使内地之人，视钞如现，坚其信仰，深其储藏，则四行已推行内地之库钞，可无朝出暮归之患。又，四行四库当如何认南钞主体及票面责任，与南行有深切之关系，远重于其他三行。设使南钞稍有不稳，即首先影响于南行之营业，应由三行四库将一切因应事宜，于平时便于稽核，有事时便于指挥各办法，公同商定平稳适当之条文，分别载明规约，使南行得以随时依据行使职权，俾免危及四库根本之南行并牵及联合之三行。务请于此时机，重订四行四库办理发行南行钞票之平稳详密办法，以便提送南行董事会核定。

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拥有钞票发行权，四行联营后决定成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钞票。文中对其他三行的不满，便集中于钞票的发行上，认为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利益所在一化而为四，俾四行平均享受，而每遇挤兑风潮”，其他三行则“巧避其害”，“推至南行兑取”，“三行避去之害，皆归南行独受之”，吁请“重订四行四库办理发行南行钞票之平稳详密办法”，“将一切因应事宜，于平时便于稽核，有事时便于指挥各办法，公同商定平稳适当之条文，分别载明规约，使南行得以随时依据行使职权，俾免危及四库根本之南行并牵及联合之三行”。

文件用语显然带有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描述的事实也不免有些夸大，但应该承认的是，银行毕竟是逐利机关，追求效益最大化，相互间即使合作联营，往往也难免首先考虑本行利益，这就要求制订公平周密的合作章程、规约，共同遵守。事实上，就是在这份文件提出的两个月之后，四行便对准备库章程、规约进行了修订，虽然改动之处不多，但其中《中南、金城、盐业、大陆银行准备库规约》第二条由原来的“关于上项事务之费用及其他之损益，由四行公摊之”，改为“关于上项事务之费用及其他之损益，由四行按照所领票额公摊之”，明显更加严谨、公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北四行合作也是其他各种形式合作的根本前提。

四、其他民营银行的合作方式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虽然没有像“北四行”那样成立专门的组织进行联营，但三者之间的业务联系相当多，它们“互相对开汇划户、划头户，即三行不托行庄代理而是自行轧账互抵，将差额再行划直，三行中头寸有宽紧的时候，互相通融支援，以存入方式，并无拆票名”。三行还签有互相委托代理收解的协议，如果自身在某地无经营网点，但又有业务需要，即可委托合作方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代为收解款项，且“彼此代收代解之款均不取汇水及手续费”，甚至彼此还有一定额度的透支权力。

而除了北四行、南三行这两大民营银行阵营内部的合作之外，南北银行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例如早在1922年，浙江实业银行就与大陆银行签订了代理收解款项合同，约定双方代理收解款项时“均不贴费用”，还允许一定限度的透支。后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大陆银行又在1923年制定了四行互通往来办法，规定“彼此互开银洋两户；彼此往来均不计算票力；往来利率，银户存照庄折九五、欠照庄折不加，洋户存照周息三厘，欠照周息七厘计算；互相欠款，银洋在一万以内随时可以支用，如遇市面银根紧急时亦须预为接洽；彼此收票均不托庄代收，一律用送银簿存入”等等。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甚至在1918年金城银行刚刚成立不久就有了代理收解的协议，与中南银行、盐业银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在华资银行自己的票据交换所正式成立之前，这种合作为民营银行间的业务提供了很多便利。

合作关系广泛地存在于近代众多的华资民营银行之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前面述及的这几家最著名的民营银行。如：像

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就合资组建了泰山保险公司；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国华银行、东莱银行并联合交通银行等共同出资经营太平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兼并了由中国垦业银行组建的天一保险公司；各银行为了扩大在押放和押汇业务方面的相互合作，还在上海等地共同设立了银行公栈。民营银行间的联合放款也不少见，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和大陆银行、国货银行、国华银行三行合作向光华火油公司贷放巨款，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合作经手的放款、收购项目更多，两者还合资组建了诚孚信托公司管理有关资产。总之，“其时中国的银行界，对于大规模的放款或投资，往往提倡组织集团，联合办理”。而至于日常经营中的相互融资、拆借、拆放款更是不胜枚举。银行间甚至有合并重组的例子，如“江浙银行……自民国廿年开办以来，营业甚盛。……因鉴于凡百事业，必须团结，以期增厚实力，扩展业务，爰有合并之议。适中汇银行开设有年，营业信用亦极发达，资力营业均属相等。而人事方面又素相联络。彼此兼任两行董事监事者，颇有数人均赞是议。遂于十二日下午分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出合并议案。两行股东均全体一致通过……合并之后资本变为三百五十万元”应当说明的是，不仅仅在民营银行间，更确切地说，是在以民营银行为主体的整个华资银行内部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这是它们在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和缺乏秩序的市场环境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1. 今既十年之久，屡经朝市变迁，如再不本十年来之经验事实，以谋公道改革之方，必致积害益深，裂痕愈显，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现在国府都于南京，总库及南行总行均在上海，南行既经呈请国民政府继续其发行权奉准如上述，自当根据谨慎办理之令文，惩后惩前，以期三行一库彻首彻尾为公利公害而改革之。在南行，当考虑谨慎办理之意义，及如何公利而不专害；在三行，当考虑其如何与人均利，而不致人独受害，及如何明定负责推行库钞办法，以协助四库；在四库，当考虑如何不负南行谨慎托付保管现金准备之责，其处置保证准备，应如何可以随其需要，随时使四行合成十足现金，俾不妨害其尽量兑现。又平时关于内地各埠分设库、会及委托代兑家，如何可使内地之人，视钞如现，坚其信仰，深其储藏，则四行已推行内地之库钞，可无朝出暮归之患。
2. 四行四库当如何认南钞主体及票面责任，与南行有深切之关系，远重于其他三行。设使南钞稍有不稳，即首先影响于南行之营业，应由三行四库将一切因应事宜，于平时便于稽核，有事时便于指挥各办法，公同商定平稳适当之条文，分别载明规约，使南行得以随时依据行使职权，俾免危及四库根本之南行并牵及联合之三行
3. 虽然没有像“北四行”那样成立专门的组织进行联营，但三者之间的业务联系相当多，它们
4. 。三行还签有互相委托代理收解的协议，如果自身在某地无经营网点，但又有业务需要，即可委托合作方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代为收解款项，且

脚注和尾注
1.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Q265-1-181。.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6页。.
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8页。.
4. 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实业银行档案：Q270 - 1 - 221。.
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9页。.
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294页。.
7. 《江浙中汇两银行议决合并》，《银行周报》第20卷第27期，1936年7月14日，第12页。.

9.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9部分

总字数：8391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21.2%(1782) 疑似剽窃观点：(0)		
1	第一稿 正文03 张健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2-05-17	5.5% (461) 是否引证：否
2	近代中国华商银行人事管理制度研究 (1897 ~ 1937) 张健(导师：姜良芹) - 《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 2012-05-31	5.5% (459) 是否引证：否
3	上海银行业保人制度改良述略 刘平; - 《史林》 - 2007-08-20	5.0% (421) 是否引证：是
4	浙江兴业银行的用人之道 朱镇华; - 《浙江金融》 - 1986-08-29	2.9% (243) 是否引证：否
5	中国近代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的演变——基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探索 孙火军;熊金武; - 《制度经济学研究》 - 2013-03-31	2.3% (194) 是否引证：否
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六) - 《档案与史学》 - 2000-12-30	2.1% (175) 是否引证：否
7	中国银行的历史轨迹——《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简介 - 《民国档案》 - 1991-12-31	1.5% (127) 是否引证：否
8	金城银行资产业务与经营管理研究	1.5% (122)

	别曼(导师：王玉茹) -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 2012-05-01	是否引证：否
9	近代钱庄与私营银行人力资本投资比较及对现代金融业的启示 刘梅英;林佳; - 《经营与管理》 - 2018-04-08	1.3% (105)
		是否引证：否
10	论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防弊与信用保证制度变革 孙建国;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07-03-15	1.1% (90)
		是否引证：否
11	早期华资银行业研究 (1897—1927年) 易绵阳(导师：周建明) -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04-04-01	0.9% (73)
		是否引证：否
12	解放前中国银行组织机构改革的历史与借鉴——写在《中国银行行史》出版之际 巴曙松 - 《国际金融研究》 - 1996-01-15	0.8% (63)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五章民营银行内部危机防控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近代民营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时刻面临各种危机和风险的发生。为了防控危机，规避风险，各银行首先在内部建立起从人事管理到财务监管的危机防控机制，并不断使之发展和完善。

一、提高银行职员的专业化素养

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资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时，中国还没有真正懂得银行经营与管理的专业银行家，无奈之下其主事者盛宣怀不得不考虑在“总行及京都并通商大口岸暨各国都会，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将来中外分行广设之后，并须选派精通商务体面西人为总大班，调度稽核各行之事”。尽管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钱庄势力已经较为强大，但由于在经营理念与信用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它几乎未能向现代银行业输送专业人才。

近代的银行家群体主要是由清末民初从海外留学归国以及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所以较早的一批银行家，多数受过经济或金融的专业教育。据徐矛等人所编《中国十银行家》一书正文及附录“一百银行家小传”所载110名近代银行家统计，曾留学国外者48人，占43.6%，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共22人，占20%，留学美国者次之，共17人，占15%，留学英国者又次之，共6人，占5.5%，此外为留德、法等国。这些银行家的教育背景中，攻读的学位大多与财政、经济等相关专业。如中国银行张嘉璈1909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交通银行钱新之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1903年考得官费赴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留学，专攻财经与银行学。浙江实业银业的李铭1905年就读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研习银行学专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王志莘1921年考入上海商科大学，1923年在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资助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系，获得硕士学位。金城银行周作民1906年考取广东官费留学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后入南京法政学堂做翻译，并致力于研究财政经济学。于中国金融发展影响深远的宋子文则先后在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经济学，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事实上，近代银行家群体中，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不在少数。不仅如此，这批银行家大多为19世纪80-90年代出生，初入银行界时皆比较年轻，如周作民、谈荔孙、钱新之、陈光甫、张嘉璈、李铭等作为银行家崭露头角时仅二三十岁。现代经济学的专业教育背景是近代银行家群体与传统师徒关系出身的钱庄主持者的最大不同，与后者相比，近代银行家更具有经济理论知识，对现代经济运行规律与性质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因此，他们在人事制度、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认识与做法自然大相迥异，带有鲜明的西方痕迹。

在近代银行家的主持下，银行在人员选用与培训机制方面，表现出更专业化的特征。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各银行在选择银行员的标准上，首要看重的是候选人品格，“高尚善良之品格，不独银行行员为然，不过银行行员更当以此为其第一要件”，这是因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受信与授信，“一收一授之间，莫非金钱关系，酒能乱性，财易迷心，设有不正之徒杂处其间，银行之危险，可思议乎”，这就要求银行员“本身要信用卓著，要不然简直不能营业”。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银行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业界，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银行员品格对银行安全的重要性。1923年3月《银行周报》曾开设专栏，讨论银行员之任用与养成问题，徐裕孙、冯子明、徐士浩、徐沧水、蒋梦芸、桂绍熙等人皆撰文参与讨论，这些金融界人士谈到银行员的选用时，不约而同地认为候选人道德品行是第一重要因素。

因此，各银行在选拔录用新行员时尤其注重候选人的道德品行。金城银行在录用新行员时就意识到，“银行为信用事业，工作人员多与钱币之出纳有关，故其品格所系尤大，或谓银行先须求其忠实、勤勉、忍耐，诚属必要，然此等美德，亦惟常识丰富者，乃克具备，见此美德，则品格自必力争上游，才学亦能活用与增进”，“本行有鉴于此，历年用人方式，……皆注意于其品格与常识，以作遴选之标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在谈到银行员品行时劝勉全体员工“吾人从业银行，既受社会重托，不可不负起责任，振作精神，为个人人格信誉而奋斗”，“第一要有守纪律守秩序的精神，不可颓唐，纠正本身缺点”，“行员对于个人道德品性之修养，尤须以身作则，勤加注意”。具体到如何选用合格行员的问题上，陈光甫坚持以下人员不能为银行所用：“一种为害群之马，不知节俭，甘心堕落，结果身名俱败，且累及同人面上无光，此为余所深恶而极嫉者”，“一种为无意识之马，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不知振作”，“一种为死马，完全被动而不能主动，令彼何时到行，何时下值，派办何事，均能照办，而绝无毫发展之新思想，于通力合作，增进效能之义，尚未明了”。中国银行张嘉璈甚至专门在该行内部指导编辑了《中国银行行员手册》一套，要求每名行员人手一册，随身携带，内容为行方对行员的诸多条件和要求，其中首要强调的便是行员应当具备高尚的品格，以诚信忠恕待人克己。

其次，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亦是成为银行职员所必须的基本素质。现代银行业的经营与管理与传统钱庄业主要通过师徒关系传授业务知识技能的做法不同，现代银行业的专业性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相应的金融或经济知识背景。但与此相对应的是

，近代中国的金融学、经济学教育并不发达，专业人才相对缺乏。为了能够招录到符合银行专业特征的人才，各行无不竭尽所能。中国银行每年补充新人，皆是由人事室主任在暑期毕业之前，亲自分访国内著名大学及中学，登记最优秀之学生，毕业后约其来行参加考试，分别录用。浙江兴业银行每年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事先向多所大学和中学发出需要选拔录用的人数和各项要求，请他们择优选送，并附上选送毕业生的历年成绩单与照片，届时一律考试筛选，名门和寒舍子弟一视同仁，以考试成绩为选拔的第一依据。同时，该行以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在选定的学校推行“浙江兴业银行助学金”，凡人学习成绩在前二十名的学生，如愿立下书面保证，有志于金融专业，并毕业后首先接受浙江兴业银行候选的，均可申请。

对新入职的行员进行专业培训，是进一步夯实和提高行员专业素养的重要手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素以重视行员专业素质著称，其行员培训工作亦较其他银行为先。早在该行开设的第二年（即1916年），经理陈光甫就已预料将来业务发展的困境，必是人才缺乏，尤其是内部办事人员，仅有一知半解，势难与时代俱进，故未雨绸缪，于该年度盈余项下拨款900元，筹设银行传习所，1917年又提500元，1918、1919两年各提1000元，以用作训练银行专门人才之经费。嗣后随着该行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需要人手颇多，感觉短期培训时间仓促，不足以使之修养丰富，为一劳永逸计，又于1931年将银行传习所改为训练班，由该行重要职员专责办理。凡投考者须高中毕业且年在19岁以下，该训练班先后招考两次，共录取63人，分甲乙两班，期限三年，期间半日理论学习，半日实务练习。从训练内容上看，“有服务意义，有国外汇兑，有英文，有商法，有高等会计学，有商业地理，有企业组织，有仓库学，有保险学，有旅行部事务，重要功课都是本行自编的讲义，切合本行的实用”。开设训练班的苦心，诚如该行在二十年度营业报告中关于训练班的记载中所述：“行员对于银行本身之学识，与银行有关之业务，如仓库、保险、运输等，均应受相当之指导，俾可增加其办事上之效力。我国教育，对于社会现状及农工商真实情形，尚未能尽量灌输，入学之士虽多，仍有才难之叹，欲求其能治上述诸学于一，而适合本行之需要者，事实上更难办到，自行训练，万不可缓。”。欣慰的是，该行的训练班成绩显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训练班前后共举办14届，训练期限最初为三年，后改为一年，先后共训练行员300余人，后来大多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该行干部的骨干。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人才培训方式多样，除了训练班之外，陈光甫还延请经济学者到行演讲，如1928年10月，北京《经济周报》主编，以币制、公债、银行制度、外债等领域研究著称的经济学家刘大钧因该刊改组辞职，陈光甫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机会，遂邀请其加入该行，订立聘期三年，每月薪金五百元，工作内容仅是每周四晚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开演讲一次。按照陈光甫的解释，“此举专为训练行员，提高一般人员之思想”。不仅如此，陈光甫还通过选派行员出国深造，提高行员的业务视野与水平。该行开办伊始，陈光甫就把他的得力助手杨介眉送到美国欧文银行学习业务，此后也经常挑选一些高级人员出国考察和选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行员去国外银行实习，如李恂村、资耀华、蒋惠先等人都先后派赴美国学习。此外，在在职培训亦是人才训练的重要形式，如为了提高行员的英语水平，该行聘请英语教师，在职工宿舍内开设英文补习班；为了拓展国外汇兑，由各分支行轮流派人到总行国外汇兑处学习外汇业务；还设置各种研究会，一面调查，一面研究，以提高行员的业务水平。

浙江兴业银行的行员培训十分严格，不仅练习生必须参加，即便是已提升的办事员乃至工作多年的行员等，都得接受一定期限的训练，以授予基本实务知识，补充必须学术，导习工作技能。训练除授课、实务、演习习练工作技能等以外，还包括服务指导和支配能力，使行员有机会轮番到该行各部门实习，为培养银行业务的通才创造条件。金城银行为培养行员专业素养起见，还专门购买北京商业学校的商业英文、商业通论、商业簿记、商业算术、经济学原理、民商法等课程讲义，分发各分行，令行员暇时研究。1933年，金城银行还将招录的新行员，商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特为设班，就实务应用上加以训练，平、沪、津三地分行还在当地招考高中及专门学校毕业生，直接分派至各该行实地练习。1922年大陆银行的行务会议上，董事会提出银行职员不仅“内部个人职务尤宜互相调动，俾其不致仅一技之长而能了解全体事务”，而且不同地区分行职员之间“亟宜相互迁调，俾其熟悉各地情形，借资阅历”。

个人道德品行的筛选以及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在保证行员德行的同时，丰富了行员的专业知识，也进一步锻炼了行员的实操技能。但是，实现高尚的职业道德与积极的工作态度仅仅依靠考录与训练等方式养成个人素质是远远不够的。“办理银行，必以人事健全为无上要素”，“银行之真正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程度”，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发挥人才积极作用，还需要有完善、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

金城银行认为，“得人固然不易，用人尤为困难”，发展银行业务靠的是经营管理有方。在加强行员管理方面，金城银行制定了八条禁令：金城银行员生不得私自营业和冶游；对行员要随时观察，为风气所染者则切实惩戒；告诫员生戒除赌博，珍视名誉；行员不得前往回力球场参观或消遣；员生应崇尚俭德，不蹈虚华，量入为出；加强保密制度，发电译电不得聚观探问；建立假日值班制度；住行行员须按规定时间返行。该行另外还制定了《金城银行行员奖惩暂定办法》，对违反下列情形：违反本行一切规章制度者；办事不力怠忽职务及时常迟到早退者；漏泄行务机密者；有不良嗜好或不良行为者；受刑事处分者；挪用公款营私舞弊致本行遭受损失者，可由各该管分行主任、副主任等随时报给总经理核定，按违规情形给予申诫、记过、罚薪、降级、停薪或停职、开除等不同惩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提出行员服务规则十条，并明确及解释了各条规则的原因及要求。

在张嘉璈的主持下，中国银行的人事管理也日益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1913年9月成立时，“诸事草创，人事安排，难言制度”，最初的人事管理，受传统金融业影响，在用人方面偏重经验阅历。张嘉璈主持工作后，改为经验与学历兼收并容。为了做好改革工作，张氏还聘请了一批中外专家到中行工作，如德国的罗德瓦尔德、英国的尼克尔和格雷、瑞士白恩大学毕业的张肖梅、美国克拉克大学毕业的张禹九、清华大学教授刘攻芸，这些人在各自的知识领域内皆学有专长，成为中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1914年之后，该行又制定《行员戒约》（1914年）、《行员惩戒暂行规则》（1914年

《行员旅费规则》（1914年）、《行员请假暂行规则》（1915年）、《年终行员奖励金办法》（1915年）、《总分行号练习生服务规程》（1915年）、《行员薪俸规则》（1920年）、《行员年金规则》（1920年）、《行员恤金规则》（1920年）等一系列人事规则，初步形成内部人事的制度化管理。1929年4月，该行又把上述《行员戒约》与《行员惩戒暂行规则》两个单行规则合并为《中国银行行员服务待遇规程》，内容包括戒约、规约、保证人、惩戒四项。其中戒约体现的是行方对行员的道德要求，主要规定行员不得违反上级机关之指令；行员不得兼营他业；行员不得兼任行外职务；行员对于本行事务应守秘密；行员不得向往来商家挪用款项；行员不得有一切投机行为；行员不得以他人名义及别号、记名、堂名向本行私自交易，或为人作保。规约则主要对业务行为进行了规范，如行员对于一切顾客，应谦和接待；顾客托办之事，应力求方便迅速；顾客探询事件应平心静气，逐一答复，不得厌烦；顾客托做汇兑，不得分外多索；每日应办之事，不得拖延；办公时间不得怠惰；行员应操守严谨，屏除一切恶习。此外，该规程还要求行员人行应有保人签具保证书，以及违反上述戒约与规约的惩罚办法。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使中行的人事面貌多有改善，根据张嘉璈的回忆，“在我任中行副总裁后，以迄中行改组之前，对于人事之改良，仅做到一点，即逐步将老朽及在行外兼营私业者，淘汰殆尽”，“**今欲求中国银行在国际上占一地位，在国内为民众为国家服务，其最大关键在于人事。故人事刷新，实为中国银行革新之最重要目标。**”

中国、金城等大银行成功的人事管理经验，往往也会成为中小银行效仿的模板。1930年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因受首都南迁之影响，以及各类官欠本息久未归还，陷于困境，濒临倒闭。危难之际，该行最大股东中国、交通两行决定对其实施改组。改组期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对该行的人事工作加以数番研讨后认为，必须实行彻底改组，人事工作才有振兴的希望。在张嘉璈的举荐下，曾任上海商科大学教授、江苏农民银行总经理的王志莘，担任新华银行总经理，同时由南开大学教授、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总稽核、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会计处副处长孙瑞璜担任副经理。两人皆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学系，具有丰富的理论与管理经验。王、孙上任后，以中行人事制度为蓝本，对该行人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关于行员服务方面的要求，得到进一步规范：“行员应遵守本行一切规章不得违犯；行员对于本行行务之兴革应随时用心建议；行员每日到行离行均应遵守时间，上午到行后须亲自在考勤簿内签到并填到行时刻；行员对于顾客应以诚实谦和之态度接待，顾客托办事件，应力求迅速照章办理；行员对于本行一切事务应严守秘密，不得以文件、簿表等示人，对于顾客与本行往来之状况不得泄漏；遇有非常事变时，行员应将经管之账表票据以及其他重要物件尽力为适当之处置；行员不得私营一切投机事业及作一切不正当行为；行员不得向本行或本行往来之客户挪借款项。行员彼此不得互相借贷；行员对内对外均不得为人作保”等。从内容上看，除个别细节上略有不同之外，新华银行的行员服务规则与中国银行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此时能够注意到新华银行是由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合股创办的内在关系，就不难理解为何二者的人事管理制度有如此高的相似度。

人事任用、训练与管理的制度化固然促进了银行行员在道德与业务方面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行员个人因素导致经营风险发生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人事防弊制度的演进却未能按照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二、防弊设计：职员保人制度

人事制度方面的防弊设计，以银行职员担保制度最能反映其特征。银行职员因其职务性质，“大都终日与钱币、有价证券等相接触”，不免有个别银行职员出现营私舞弊，“**银行方面，为防止营私舞弊起见，自不能不令其提供确实可靠之保证**”。我国近代银行业的职员保证，向来采用私人信用为担保，这种私人信用担保的方式，取法于传统的票号、商铺与钱庄。山西票号“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违规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这种传统的保人方法，大多以口头作保，即使有少数商家需有文字保证，也十分简要，口头作保形式上虽然比较简单，但因基于血缘、业缘、地缘等传统人情关系，一般能够保障**保证义务的履行**，“**我国银钱业，对于职员保证制度，向采私人信用担保，在二三十年以前，钱庄职员，仅凭保人口头保证，并无字据，不幸发生事故，保人尚能忍痛履行赔偿，以重信誉**”。这种对人信用是传统商业信用的特征，“**商界恒以人为对象，如担保人信用卓著，虽无丰富资财，亦能受人信任，所谓一诺千金者，‘信用’是也，故昔时有口头作保者，并无笔据，而担保之人，竟能履行其信约**”。随着商业繁盛，银钱款项日趋复杂繁多，银钱业职员舞弊现象层见叠出，银行业亏累不堪，遂吸取教训，为防止空口无凭，一般要求保证人立保单以为存证，“**保证书上规定种种条款，文字愈缜密，保证人之责任，因之亦格外加重**”。1930年之后，各银行“业务扩展，引用行员较多，遂不免有劣者混迹其间”，舞弊案件亦越发增多。有资料显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1920年至1934年11月，被发现舞弊者76人，涉及舞弊金额881 453元**，其中有发生在1930年之后的45人，涉及舞弊金额591 434元，分别占前者的59.2%和67.19%。在舞弊行员的分类中，以初入银行工作的年轻行员为多，其中58人系入职5年以内的行员，此58人中又有43人系入职3年以内的行员。这一时期的行员舞弊不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专利，计自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十六个月之间，根据调查所得，全国发生之舞弊案件，竟达三十八件之多，金额至一百四十余万元之巨”，“此仅就公开发表之载诸报端者而言，其有隐讳遗漏，当不在少”，这其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者三十一件”，以青年行员占绝大多数。追究其舞弊动机，“**百分之五十以上，由于赌博或挟邪，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营投机事业失败，百分之十以上，由于其他特种原因**”。更有甚者，甚至有不良保人“存心叵测，袒护雇员舞弊之事”。据1927年7月《银行周报》记载：“数年前**杭州某钱庄伙友某甲，职司出纳，私挪店款三千元，将届年梢，知事将败露，乃密告其保人某乙，盖欲设法弥补。某乙固亦钱庄经理也，奸诘异常，谓某甲曰，尔即返店，再挪五千元来，尔则暂行避匿，我自有办法。某甲莫名其妙，计如其言。翌日，经理发觉某甲亏欠店款八千元事，急报于某乙。某乙佯作惊惶状，双方稍事谈判，乙即承认对折赔偿，即刻以现款四千元付某钱庄，抽回保证书。某钱庄经理以乙固素有声誉势力者，本不望其全赔，即刻得有半数到手已属满意。迨事竣，乙乃将所余一千元还甲，曰：此尔半生衣食之资也**”。银行舞弊案件之频繁，涉及行员之多，案情之复杂，已超过此前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舞弊案件的增多，也增强了银行的警惕性，银行业对保人资质的要求亦逐渐提高。多数银行要求除副经理以上高级管理

人员，其他银行职员“均须于到行时，觅取妥保，依式填取保证书”，保证人“须从事正当职业身家殷实，而于工商实业界有相当之信誉，为合格，但事前须由被保人商得本行认可”，“资本充实之商店工厂，亦得为行员之保证人，但保证书上须加盖该厂店之正式图记外，并须由该厂店主代表股东或经理签名盖章”，保证人服务处所，“以在银行所在地，或接近地域，以便于调查、对保”，“**被保人如有亏空本行款项，或其他一切情弊，致银行受有损失时，保证人均须负赔偿责任**，按照所开之损失款项数目，立即照数清偿，保证人并声明抛弃先诉抗辩权”；“保证人如退保时须直接函知银行，否则无论保证人如何宣言，或在报纸上登载退保广告，均不生效力，并在未曾收回原保证书之前，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仅要求**行员入职之前“应觅殷实之保人，按照本行规定之保证书填写，送行认可后，方准进行办事”**，还保留有“随时嘱行员更换保人之权”，并明确**“如有舞弊或亏欠公款情事，除予以开除依法惩办外，并责令如数赔偿，图本人无力赔偿或走避，则责成保人赔偿”**。在聚兴诚银行，完成保证手续是行员（包括学徒）入行后必须经过的第一关。按《行员保证规则》第四条，行员（学徒）入行要填具人事保证及银钱保证书，“未经许可以前，概不指派职务”。所谓人事保证是承保人“保证行员如遭受天灾人祸，疾病死亡，及有不正当行为等时，均负全责”，银钱保证是“保证行员如有亏欠行款或其他情弊，致本行蒙受损害，负责如数赔偿”。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1. 提高银行职员的专业化素养
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资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时，
2. 择优选送，并附上选送毕业生的历年成绩单与照片，届时一律考试筛选，名门和寒舍子弟一视同仁，以考试成绩为选拔的第一依据。同时，
3. 在前二十名的学生，如愿立下书面保证，有志于金融专业，并毕业后首先接受浙江兴业银行候选的，均可申请。
4. 重要职员专责办理。凡投考者须高中毕业且年在19岁以下，该训练班先后招考两次，共录取63人，分甲乙两班，期限三年，
5. 开办伊始，陈光甫就把他的得力助手杨介眉送到美国欧文银行学习业务，此后也经常挑选一些高级人员出国考察和选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行员
6. 由各分支行轮流派人到总行国外汇兑处学习外汇业务；还设置各种研究会，一面调查，一面研究，以提高行员的业务水平。
7. 提升的办事员乃至工作多年的行员等，都得接受一定期限的训练，以授予基本实务知识，补充必须学术，导习工作技能。训练除授课、实务、演习习练工作技能等以外，还包括服务指导和支配能力，使行员有机会轮番到该行各部门实习，为培养银行业务的通才创造条件。
8. 培养行员专业素养起见，还专门购买北京商业学校的商业英文、商业通论、商业簿记、商业算术、经济学原理、民商法等课程讲义，

脚注和尾注

1. 《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1897年2月20日），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2. 资耀华：《银行员之选择与待遇及行员之自觉》，《银行月刊》第8卷第2期，1928年2月，第1页。
3. 孙味冰：《论银行员之任用》，《银行周报》第7卷第9期，1923年3月13日，第12页。
4. 胡明理：《银行人事管理与防弊问题》，《新商业季刊》创刊号，1935年12月15日，第29页。
5. 金城银行：《金城银行二十周年纪念刊》，金城银行总管理处1937年刊印，第137页。
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印行，第196—197页。
7.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印行，第21页。
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3页。
9. 宋春舫等编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见何品、宣刚编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机构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10. 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1. 天津档案馆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12.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96页。
13.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101页。
1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第250页。
15. 金国宝：《银行现行保证制度之废除与改进》，《银行周报》第21卷第1号，1937年1月12日，第5页。
16. 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
17. 刘啸仙：《组织银行业同人联合信用保险公司刍议》，《银行周报》第20卷第33号，1936年8月25日，第5页。
18. 徐启文：《如何改善职员担保制度》，《银行周报》第20卷第10号，1936年3月17日，第4页。
19. 刘啸仙：《组织银行业同人联合信用保险公司刍议》，《银行周报》第20卷第33号，1936年8月25日，第5页。
20. 古羊、郑荣整理：《上海银行行员舞弊案史料》，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5—309页。
21. 周慕伊：《读潘氏“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之我见”以后》，《银行周报》第21卷13号，1937年4月6日，第9页。

22. 郑维均：《改良银行保人制度私议》，《银行周报》第11卷第25号，1927年7月5日，第16页。 .

23. 银行实务研究会编：《特种现金保证办法》（银行实务丛刊11），银行学会银行实务研究会1937年刊印，第119—122页。 .

24.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20—822页。 .

25.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聚兴诚银行》，西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

10.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 (1897-1937) .doc_第10部分		总字数：8288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21.6%(1791) 疑似剽窃观点：(0)		
1	上海银行业保人制度改良述略 刘平;-《史林》-2007-08-20	9.5% (788) 是否引证：是
2	中国近代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的演变——基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探索 孙火军;熊金武;-《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03-31	8.8% (733) 是否引证：否
3	论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防弊与信用保证制度变革 孙建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3-15	6.0% (494) 是否引证：否
4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稽核机制述论 王强;-《安徽史学》-2018-05-15	2.9% (241) 是否引证：否
5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2013-03-20	1.5% (127) 是否引证：否
6	《钦定大清商律》中的商法原理——以股东平等和分权治理为进路 陈剑;-《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15	1.1% (91) 是否引证：否
7	1927-1937年外资银行在华金融市场控制权的变动 宋佩玉;-《近代中国》-2017-12-31	0.4% (33)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层出不穷的职员舞弊案件以及行方日益严格的保人政策的共同压力，使信誉良好、资财殷实的人士或商家不再情愿为新行员作保，新行员寻觅保人变得愈发困难：“年来世风浇漓，人心不古，行员卷逃侵占，时有所闻，求人作保，难如登天”，“故凡人银行服务者，第一重难关，即为觅保”。《银行周报》曾提及“上海某大银行录取新行员十名，其中八人因无适当保人，均不得进行服务”。甚至有报刊报道有青年李伯年，出身平平，虽“家无恒产”，但“为人刻苦耐劳，勤学不辍”，因其所在商号停业倒闭，后经百般努力，**考中某银行职员，惟录取之后，银行闾谋一拥有五万金以上者为保，李不得已诣各亲友之门，恳切陈词，亲友中虽有上项资格，竟无人肯允者，九仞之功，功亏一篑，李不胜刺激，竟以轻生**”。即便是已为人作保的商家，亦无不时刻寻找合适机会借机退保：“每展报章，屡载退保声明之告白，问其退保原由，非以年迈，即为事繁，然究其实在，无一非为责任重大而出此”，“盖为人作保，须尽无限义务，而无丝毫权利，俗语谓保人者，呆人也，诚哉斯言”，甚至社会上流传有“不做中，不做保，一世无烦恼”之说，足见为人担保已为多数商家所不愿。

三、充满争议的信用保险制度

一方面是银行求才若渴，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充实业务队伍，但却面于保人制度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是大量专业人才被保人制度所阻碍，不能跨入银行的大门。保人制度发展至此，已经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一道制度障碍。这必然引起银行专业人士这种古老的传统人事担保制度的反思。

早在1927年，《银行周报》即有作者发表有关保人问题讨论的文章，意识到保人制度于银行招揽人才的不便，“银行重人才，故当广事罗致，虽然，银行人才未必皆有合适之保人，银行若重其才而信其人，似有未妥，若因无保而弃其才，则又可惜，此事实不得不设法两全”。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行员舞弊案件的增加，保人制度改良问题再次成为金融界的讨论热点。讨论分别于1930年与1936 - 1937年达到两次高潮。

1930年1月，由伍克家、潘学安、朱如堂、庄得之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信用保险公司。该公司声称成立之原委，即为解决保人制度面临的问题，“社会上种种人事，成须有信用以为担保，故谋得职业者，必先觅保人，觅保之难，胜于谋业，每有初入社会者，信用未学，虽有美材，而难觅妥保，即不能就职任事，而为人保证者，又鉴于责任之重，不敢草率从事，万一发生事变，保人竟有因此倾家荡产者，而雇佣方面，亦受极大之影响”，“为救济此种困难，特合资组设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凡谋得职业而不得保者，该公司均可代为保证”。第一信用保险公司的成立，犹如在平静的湖水投入一块巨石，激起无限波澜。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对新出现的信用保险业务充满了期待，认为“这是银行界解决行员保证问题的绝好机会”。在为信用保险一片叫好声之外，也有部分人士对信用保险提出不同意见，如著名金融学家潘恒勤就意识到信用保险为有限责任性质，其信用保证额度，亦以一万元或一万两为限，“但行员职务上所负金钱责任，在此限度以上者，恐必不在少数，倘亦向其有限之投保，岂非银行须负保额限度以外之危险，由此而言，该信用保险所论种种利益，似难普遍沾惠”。关于信用保险是否适合银行业实际，赞成的有之，反对的有之，甚或有人在两者之外，提出应通过加强勉励训练、增加薪金、提倡节俭等方式弥补保人制度之不足。与报刊上唇枪舌剑式的激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信用保险公司的实际业务却十分惨淡，开办年余，生意寥寥。

信用保险的挫折，促使银行业人士开始考虑设计能够适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保证方式。1934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人事课长王维骢提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此项办法“经原提案者广征意见，公开研讨，历加修正补充者，达七次之多，近由本市银行学会，再加研究，以成完璧”，最终于1936年11月，以《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意见书》为题，全文刊发于《银行周报》。该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主要内容分为五项：

(一) 甲种保证金(照银行月薪三倍之数计算)本金离行时全数发还，利息按年息一分二厘计算，半数发给行员，半数充公共准备金。

(二) 乙种保证金(照行员月薪百分之二计算)此项保证金为取消保人之代替物，亦即等于团体信用之保险费，本无须发还，惟为体恤行员起见，如无舞弊案件发生，于离行时可以全数领回，或除排赔外收回其余额。

(三) 丙种保证金由银行当局核定若干万元，或为甲种保证金利息半数及乙种保证金全数之和。

(四) 连带处分行员舞弊案发生后，在同一行处之其他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受连带处分，其办法按照行员奖惩规则规定办理之：

(1) 同一行处共同或连带经手办理该项职务者

(2) 同一行处之直接主管者；

(3) 其他董事长、总经理核定应受连带处分者。

(五) 奖励告发行员舞弊经主管者及其他行员查觉或告发使行方不受或减少损失时，其查觉或告发者除得免除连带责任处分外，行方并应予以奖励。其办法按照行员奖惩规则规定办理，惟告发案经查明不实者，由当局处分之。

同时，作为细化规则，该文还草拟了配套的“行员服务保证规则”二十五条，就特种现金保证制度下行员保证的原则、条件、施行措施等做了详尽解释。办法起草者认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既有甲种保证金，为自身之保证，征收乙种保证金，并提拨丙种保证金为公共之保证，再令同行处有关系之人员，连带负责，使同一团体办事之人员，职务品性，均生密切之联系，一扫过去个人主义保证制度之流弊符合现代‘群众主义’及社会联立关系之精神”，该项办法于银行方面，“可免除在现行空洞之保单制度下每年所发行员舞弊之巨额损失”“每年耗费于行员保人之调查、对保、文件函电等巨额开支可以节省”，既“能收保人监督行员之功效”，亦可改进行员之德性，“提高银行之声誉”，于行员方面则“可免除觅保及每年对保时恳求亲友继续作保之种种困难”，亦“不必如信用保险制度，每年付给巨额保险费”，还可以促进同人之“彼此监督，防杜舞弊”，此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如能加以革命式的推行，斩荆披棘，不稍畏惮，当有良好之收获”。显然，办法起草者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信心十足。

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的出现，迅速引起了金融界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应该废除传统保人制度，而在于究竟是应该以特种现金保证还是信用保险来代替保人制度。批评者认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完全解决保人制度废除后银行业的信用保证难题，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对于舞弊之预防，效果有限。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着重于事后补救，对于舞弊之事前预防，基本没有功效。尽管规定有连带处分与奖励告发，但若行员舞弊“手段之灵巧，布置之周密，则同事颇难有知情之机会，遑论告发与监督”？第二，行员缴纳之现金保证数额有限，一般行员舞弊，多为巨额，区区所缴之保证金，难以阻遏行员舞弊的欲望。第三，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本意在抛弃个人保证的有限性，代之以团体保证，以分散风险，但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目的。因其连带政策与奖励告发所涉及范围，仍属一行一处，风险仍在一行一处之内。第四，舞弊发生，即使有行员保证金，因其数额有限，银行仍难免损失。第五，连带处分更不具有合理性，“因行员各有专职，一人之行动，他人实无法以监督之，今不问其出事之原因何在，作弊之关系如何，凡在同一行处办理，或直接主管者，均使之负连带处分，即使于情理可通，恐亦于法理不合也”，更何况连带处分往往“使无关系之行员感受痛苦，足以影响服务之效率”。

既然特种现金保证不足以解决信用保证的诸多问题，那么何种制度是合适的呢？一种意见认为，各银行应当联合起来，组织“银行业同人联合信用保险公司”，“各行以资本大小，行员多寡为比例，认缴公司股本；自经理以下，一律以月薪三倍之数缴纳保证金与月薪1.5%的保费，若有行发生舞弊，则该行自经理以下，均应负相当责任；行员如有舞弊，公司赔偿后，应将舞弊行员之姓名、籍贯、履历通函全国各银行，以后无论何行，不得再行录用”，持此观点者认为，同人联合信用保险公司的形式既可规避商业保险公司保费高昂的盘剥，又可切实实现信用保证的作用。

支持特种现金保证方式的一方以王维骢、李权时、金国宝、马寅初等银行家为代表，认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的甲、乙、丙三种保证金以及连带处分与奖励告发五项政策结合，既符合了个人承担主要风险责任的原则，也“从整个团体致利害着想，切合现代团体结合之精神”，“尤注意于事先之防止，在原有办事上机械式之监督外，并可促起精神上之结合，而达防止舞弊之目的”。特别是甲、乙两项保证金，“含保险性质，如无舞弊事件，可仍发还，其作用在各行员间有切身利害关系，可收互相规勉，消弭不良事件之发生，此种办法兼团体合作之精神，较简单之保人制度，切实而合理，其意义判若霄壤，于科学化之人事管理，亦相符合”。亦有人总结特种现金保证办法具有集团精神（主张以全体行员之力量，共同合作，相互担保，在行方可享受实际之保证，在行员可免除觅保之困难，并可促进同事间感情，养成团体生活习惯）、自力更生（主张以自身之力量，某自身保证之解决，以符合自力更生之原理）、事前防范（规定在同一行处之行员应相互监督，以消灭舞弊之动机，并适用奖惩规则，奖励举实告发，惩罚知情不举，颇能利用互相监督，收自治治人之效，实现奖惩严明，表扬法制之精神）、连带责任（实行连带处分，此防止主管者之疏忽，促进行员间之关系，其于事前防范，因连带处分，可收指臂之效其于事后补救，亦因连带处分，共同分担危险）四大特征，其“优美效果，指日可期”不少国内外银行理论与实务人士以及政府相关专业部门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给予了高度认同。

在金融界有重要影响的银行学会亦表示该项办法“颇具信用保险之原理，而切合吾国社会情形，各项规定连系所发生之效力，一方使银行方面保障巩固，一方复注意人事管理之改进”，“适合现代潮流，切实可办”。

对于保险界人士采用现代信用保险制度的呼吁，银行界坚持认为，特种现金保证才是更适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信用保证方式。银行界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的固，缘于信用保险制度的固有不足：其一，信用保险赔偿有限，遇有重大舞弊事件，一旦超过信用保险定额，其额外之损失，无法获得赔偿；其二，离职不赔，即信用保险公司对行员离职后，所发觉之舞弊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其三，保费消耗过大，信用保险在我国尚属初起，投保者寥寥，加之我国国民教育并不十分普及，社会组织尚未健全，银行管理与会计监督亦有待完善，因此潜在的舞弊风险较大，这都使信用保险的保费一直居高不下。同一时期欧美国家保费费率大约在千分之五，而我国则为百分之二，超出四倍之多，且“该项费用由银行负担，其数殊为可观，设归行员负担，更不堪言”。所以银行界认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既体现团体风险意识，又兼具有信用保险的性质，“既可得巩固之保证力量，复免巨额之保费向外流出”，较之在中国并不十分成熟的信用保险更适合银行业实际。

信用保险遭到银行业的抵制，即便是为银行业致推崇的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也未能真正付诸实施。其中一个原因，主要是银行公会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的谨慎。1937年3月，当各银行对特种现金保证办法表现出普遍赞同的时候，银行公会鉴于银行界对该项办法叫好者多，补充及改进建议者少，为慎重起见，特致函各银行，希望各行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业务与管理情况，各抒己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银行公会的谨慎态度显然对各银行产生了影响，各银行的回复与之前热烈的讨论相比，理性了不少。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杭州与天津等城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提出不少具体意见，包括新制的推行需要相当的过渡阶段，银行对行员保证金负担过重，实施连带处分有一定困难，应以银行同业组织信用保险集体等等。各银行的态度转变，同时更进一步促使了银行公会的愈加谨慎。1937年6月，银行公会在对各行的意见进行汇总讨论后认为，推行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事关变更固有习惯，非事缜密研究难决进止”，会议决定推举吴蕴斋等七人“另组小组会议，详为研讨”。嗣后因抗战的全面爆发，银行人事保证改革一事不了了之。

银行业迟迟不愿试行更符合现代金融的信用保险与特种现金保证办法，除因这两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以及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的改革失败与不确定性风险之外，还在于传统保人制度在中国商业环境中，亦依然能发挥一定的功能和效率。中国传统商业社会，着重于对人信用，“我国旧时保证方法，颇为简单，商界恒以人为对象，如担保人信用卓著，虽无丰富资财，亦能受人信任，所谓一诺千金者，信用是也，故昔日曾有口头作保者，并无笔据，而担保之人，竟能履行其信约”。其中，保人制度与注重物质信用和科学管理的现代信用制度不同，它与中国人情社会的特征十分契合，我国传统社会，“办事上究难完全离开人伦感情作用，盖保证人之对被保人其间关系非亲戚即系友好，保人之对被保人之品行、学识、嗜好等，平日即有相当之认识，在作保之前后须有一番之考察，同时被保人因受保人承保之美意，处处亦受到保证之牵制，窃以此种牵制是内心的，自动的，其效力之大，实非同事间相互监督之力所可比拟”。再加上个人信用担保无须财产抵押，手续简便，在注重信誉的传统社会，保人制度体现出异乎寻常的效率。

不仅如此，在具体实践中保人制度也在不断适应着环境而发生自我调整。如在保证期限方面由终身制发展至年度制，保人对被保人的保证有一定的担保期，一般为一年亦可以二年或三年不等，银行应按月或按季向保人报告被保人的工作情形或业绩，使保人随时了解被保人的工作表现，以便决定在保期结束后是否续保，银行每年的对保即属此类；由单独作保演变至合作担保，由数名保人共同为被保人提供担保，若遇该被保人出现舞弊情事，则保人各按认定之比例偿还，如一人认定40%，一人认定60%，此种做法较单独作保，大大减轻了担保人责任；在保证责任方面由无限担保到有限担保，在作保之前，预先声明担保额度，同时在保单上注明，“不负逾额之责”；在责任承担方面，尝试公推制，所谓公摊制，即一人同时为多人作保，如其中有被保人舞弊，则赔偿责任由其他全部被保人分推，曾有记载，上海“商界名人某君，曾以为人作保之累，去年曾拟登报通告一律取消担保，某君担保之人在百数以上，且多数在银行业服务，事为各被保人所闻，因而大恐，由被保人自动集议办法，结果共同斥资，为某君清偿保证债务，某君以情难固拒，始允续保”。

保人制度的自我调整，是对近代中国商业社会变化的主动适应，使之摒除了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增强了保人制度自身的韧性与活力。可以说，近代银行业在人事管理与防弊方面的演变，既有在人事聘用、训练与管理方面的专业化与制度化，体现出符合现代人事制度特征的发展，也有在行员信用保证方面因现代信用保证制度供给不足以及路径依赖，对传统保人制度的保留与改良，两者共同作用，一方面保证了银行能够选拔专业人才，促进了行员管理的制度化，道德与业务的规范化得以加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行员个人因素导致经营风险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用传统保人制度有效规避了银行业兴起以后现代信用保证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潜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银行业的人事管理与防弊体系尽管传统与现代特征并存，但却是卓有成效的。

四、内部业务监控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银行内部业务监控，包括管理制衡、分科制度、内部业务检查等，是预防银行业务风险的主要屏障，也是银行主动防控危机措施的重要内容，“银行之业务得失，在乎经营之是否得道，而经营如何，又视乎防弊之是否有力，欲求银行之信用稳固，业务发达，非对营业上有严密之考核，毋使废弛或湮弊不为功也”。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一个商业组织的内部牵制，可使其所属机构与职员在日常工作中，“有相互监督之功能，冀以免除一切可能发生之错误与相当之舞弊”，近代工商企业发展，涉及行业多，内部组织复杂，银钱往来巨大，风险无处不在，“必须有严密的牵制之功能，始克使一部分有错误恒被他部分所发现，一部分有舞弊情事，亦易被他部门所查出”，“因此在互相牵制之中，常处于互相监督之状态之下，相当之错误与舞弊，均可免除”。依照内部牵制理论，一个合理而健全的内部业务监控体系，不仅可以降低业务风险发生的几率，亦能提高银行业务的水平与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业务监控制度完善与否，是决定银行业资金安全与发展质量重要保障之一。

1、管理权限的相互制衡

观察近代早期中国银行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权限的分解与制衡，在管理层的权限分配方面，虽

有分工，但职权界限并不分明，大多以人治为特征。如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之初，虽有总董分董、大班等职务之设，但盛宣怀总揽大权，不仅对人事拥有绝对任免权即便是对具体业务也经常指手画脚。各处分行的分董或大班，不是各地的候补道台，就是豪绅、退職官僚，这些人把银行视为衙门，官气十足，如此人治管理之下，大多凭信用放款，毫无章法，以致该行业务混乱，弊窦丛生。1902年天津分行大班梁景和经手的呆滞放款达62万多两，属于舞弊性质的就有18万两，1903年镇江分行大班尹稚山违规放款，导致该行损失42万多两，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银行亏空案。失于组织内部牵制管理而酿成的现实风险，倒逼着近代银行业在管理制度上采用权力制衡机制。

从近代银行业的管理模式发展上看，早期的管理分工，较为粗糙，民国之后，随着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国家政策出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民族工商业的高速发展，现代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扩展，银行业的业务种类与顾客群体也随之而愈发复杂，这种情况下，管理制度以市场诱致性变迁为导向，也逐渐发生演变。

综观近代银行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董事制与经理制两种。所谓董事制，即各行均隶属于董事会之下，总管理处由常务董事督率各部办事人员，为监督及指导机关，而各行为营业机关，董事直接处理行务。所谓经理制，即董事处于立法机关地位，全行业务，完全统辖于总行总经理之下总行不仅为总行所在地营业机关，同时亦为各分行的监督和指导机关。如浙江兴业银行便是实行董事制的银行之一，经营管理主要掌握在由股东会选出的几位董事之手，而作为经理、副经理、襄理等作为资方代理人，居于从属的地位。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实行的则是经理制，职业经理主持工作，负责全行业务，其董事及董事会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经营业务。而无论董事制抑或经理制，从资方与经理人的关系上说，其主管业务工作之总董、执行董事或总经理等，都应处于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监视之下，向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对银行业具体管理者的监督与制衡，在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中国的初期并没有显现出应有的效果。尽管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中已明确规定“公司董事局每年应招集众股东举行寻常会议至少以一次为度”，“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公司寻常事件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照章办理，其重大事件应由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请董事局会议议决后列册施行”，但这一时期的银行，极少有能够按照要求定期召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银行的业务决策与行政管理基本皆由少数几个实权人物执掌。民国以后，随着商人权力意识的增强，现代公司制度的运行也逐渐规范化，不仅股东大会基本能够按时召开，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与制衡能力亦有很大提高。

除了股东大会对经理人的直接监督之外，设置专门的内部监察机构也是权限制衡的内容之一。近代银行业的内部监察机构，从演进特征上看，呈现出逐渐专业化的趋势。其中，监察人制度即是典型表现。监察人制度是西方银行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近代中国银行业虽仿行西制但早期银行组织中，监察人并不由人专任，如在中国通商银行的章程中笔者并未发现有关于监察人一职的规定，仅是在该行总行与各分行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无论何时总行派查账人，往查该经理人账目、信件、契据清账、押款凭据、保单、汇票、现银等项，该经理人必须速即一一陈明，听候查验，不得稍有迟误”。根据《全国银行年鉴》的统计，至1934年，基本上全部银行都设置了监事或监察人职位，部分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行储蓄会等还成立了监事会或监察人会，这些监事、监察人、监事会或监察人会，可以说，到1930年代中期，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监察制度已经较为完善。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div><div>1. 1930年1月，由伍克家、潘学安、朱如堂、庄得之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信用保险公司。</div><div>2. 保证方式。1934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人事课长王维骥提出“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此项办法</div><div>3. 。依照内部牵制理论，一个合理而健全的内部业务监控体系，不仅可以降低业务风险发生的几率，亦能提高银行业务的水平与效率，</div><div>4. 隶属于董事会之下，总管理处由常务董事督率各部办事人员，为监督及指导机关，而各行为营业机关，董事直接处理行务。</div><div>5. 处于立法机关地位，全行业务，完全统辖于总行总经理之下总行不仅为总行所在地营业机关，同时亦为各分行的监督和指导机关。如浙江兴业银行便是实行董事制的银行之一，</div></div>
脚注和尾注
<div><div>1. 《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意见书》，《银行周报》第20卷第43号，1936年11月3日，第4页。.</div><div>2. 《李伯年无保自杀》，《新闻报》1936年2月12日，第4版。.</div><div>3. 郑维均：《改良银行员保人制度私议》，《银行周报》第11卷第25号，1927年7月5日，第15页。.</div><div>4. 郑维均：《改良银行员保人制度私议》，《银行周报》第11卷第25号，1927年7月5日，第15页。.</div><div>5. 《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成立》，《银行周报》第14卷第28号，1930年7月29日，第5页。.</div><div>6. 贝祖翼：《如何解决银行员保人问题的困难》，《银行周报》第14卷第32号，1930年8月26日，第27页。.</div><div>7. 潘恒勤：《银行员保人问题管见》，《银行周报》第14卷第35号，1930年9月16日，第33页。.</div><div>8. 李权时、宋漱石：《对于“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意见书”》，《银行周报》第20卷第43号，1936年11月3日，第6页。.</div><div>9. 《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意见书》，《银行周报》第20卷第43号，1936年11月3日，第4页。.</div><div>10. 胡仲猷：《特种现金保证制度之检讨》，《银行周报》第21卷第8号，1937年3月2日，第15页。.</div></div>

11. 王效文：《信用保险与特种现金保证办法》，《银行周报》第21期第7号，1937年2月23日，第33页。 .

12. 胡仲猷：《特种现金保证制度内部牵制与外部牵制》，《银行生活》第1卷第7 - 8期合刊，1937年8月，第96页。 .

13. 刘啸仙：《组织银行业同人联合信用保险公司刍议》，《银行周报》第20卷第33号，1936年8月25日，第6—7页。 .

14. 金国宝：《银行现行保证制度之废除与改进》，《银行周报》第21卷第1号，1937年1月12日，第6页。 .

15. 《中外人士对于“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之意见提要》，《银行周报》第21卷第2号，1937年1月19日，第23页。 .

16. 吴仲蕃：《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之理论与实际》，《银行周报》第21卷第19号，1937年5月18日，第77 - 78页。 .

17. 《银行学会研究特种现金保证办法》，《银行周报》第21卷第2号，1937年1月19日，第18页。 .

18. 章云保：《银行员保证制度之研究》，《银行周报》第21卷第2号，1937年1月19日，第15页；家经：《我国银行员保证制度之检讨》，《稽中学生》第7期，1937年4月，第11-12页。 .

19. 李权时，宋漱石：《对于“废除银行现行保证制度建议特种现金保证办法意见书”答客问》，《银行周报》第20卷第49号，1936年12月15日，第3页。 .

20.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致吴蕴斋等七人函》（1937年6月12日），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档案，档案号S173 - 002 - 110。 .

21. 徐启文：《如何改善职员担保制度》，《银行周报》第20卷第10号，1936年3月17日，第4页。 .

22. 丁治安：《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之我见》，《海光》第8卷第3期，1937年3月，第18页。 .

23. 徐启文：《如何改善职员担保制度》，《银行周报》第20卷第10号，1936年3月17日，第4页。 .

24. 直心：《银行稽核制度之研究》，《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1卷第2号，1929年6月15日，第2页。 .

25. 袁榜先：《略论银行内部牵制组织》，《省行通讯》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第2页。 .

2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1897-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

27.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94页。 .

11.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11部分			总字数：8281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11.9%(988) 疑似剽窃观点：(0)			
1	2010210084 - 孙儒坤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风险管理-经济史 - 孙林 孙儒坤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3-04-23	6.0% (501)	是否引证：否
2	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企业制度思想 杨洁(导师：叶世昌)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6	3.1% (258)	是否引证：否
3	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17—1937） 诸静(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26	2.2% (179)	是否引证：否
4	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统因素 朱荫贵; - 《贵州社会科学》 - 2018-06-01	0.5% (40)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但实际，监察制度的监察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监察人或检查人会对行务的监督与检查往往流于形式，尤其是银行经理人比较强势的管理模式中，更是如此。当时不少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监察人形同虚设的弊端，如沪上著名会计师徐永祚曾撰文指出，监察人作为董事会的监督机构，应当负有会计上稽核之责任，“但观于吾国之实际情形，则所谓监察人，大概不明会计原理，不通银行事情，且年均老朽者，欲保持其独立地位以与董事会相对抗，而尽其监督稽查之职责，非但无此学识，且无此见解也”。其另一篇有关监察制度检讨的文章则对当时监察人制度不能保持独立性进行了批评，“按诸实际，我国之监察人，实为一闲散无能之机关，现今多数公司之定章，常设有董事，得自一百股以上之股东中选任之，监察人得自一百股以上之股东中选任之规定，其不重视监察人，由此可知。故所选出者大都为与公司浅薄之人，或为公司之第二流人物，或为老朽不堪之人，其势力远不若董事，而类似其属下，其是否具有会计之智识与查账之经验，更不必论，因之法律上所赋予之职权，常不能行使，其愿者徒受董事之制驭，而为盲从之署名，平时足不履公司之门，开会时偶或出席一二次，若询以营业状况及财政情形，则瞠目不知所答，若夫违法及不正行为之发现与预防，尤非其梦想所能及”。尽管徐永祚对监察人的批评，是基于监察人应当由具有专业会计知识的人士担任的思考，不免带有为会计师行业争取专业发展空间与市场机会的嫌疑，但从他对当时监察人的存在状况的描述中，我们还是能够基本认为，监察人制度在内部监督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2、业务分科制度

如果说监察制度重在强调管理监督的话，那么业务分科则是通过业务内容与过程的分割，达到避免业务过失与舞弊的目的。分科制度作为银行内部监控制度的重要内容，旨在分解业务与管理权力，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不仅细化了企业内部分工，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银行营业之隆替，固视乎经营之优绌，然内部之组织，要亦视其当否，所谓内部之组织者何？即各课之分配是，盖各课能支配而得其宜，则办事有序手续不紊，混淆之弊可免，分业之效自彰，否则若失之过简，则形体不完，矩矱罔备，业务应付，势将顾此失彼；反是若失之过繁，则冗员滥竽，费用虚耗，于银行营业本旨，亦殊违悖”，分科制度同时亦能发挥不同岗位之间相互监督的职能，因此，组织制度上的合理分科与相互牵制，对以信用授受为主要业务的银行业来说尤为重要。

业务分科的必要性，诚如时人所言，“银行事务，手续备极复杂，故平时事务繁忙之际，虽熟练人员，亦难免万一之错误，且多数之行员中，或有浅见谄陋、粉饰账簿、为不道德行为者，在银行当事者，不可不防患于未然。故于一交易手续之分配，切不可任一课之专理，必须遍及数课，盖任课而毕其事，则不独易于舛错，且易发生行员之欺罔行为，若合数课而完其手续，核计既较精确，而关系复杂，互相牵制，行员不正当之行为，亦自不易发生也”。从分科的层次上看，大致可以归为管理机构的部门分工与具体业务的流程控制两个部分。

管理机构的部门分工主要体现在管理组织的专业化方面。在近代银行创办之初，业务量较小，业务种类相对简单，因此部门分工并不十分精细。金城银行创始之初，“仅于董事会下，设总经理处，统率各行处分治之，初于总经理下，置稽核长等职，后于十年（1921年）分科办事，设业务、会计、文书三科”，后因金城业务的扩大与增多，“二十年（1931年）就沪设展业科，二十一年（1932年）设储蓄科，二十三年（1934年）因业务科迁沪，裁展业科，二十四年（1935年）添设证券、仓库两科”，1936年金城银行总管理处迁至上海后，另定组织大纲，“于总经理下，设事务、业务两部，事务部分设文书、庶务、人事三科，业务部分设业务、会计、调查、证券、储蓄仓库六科，并另设稽核、秘书、顾问三室”，除总管理处各部门调整外，各地分支行下属管理与业务也分别进行了细化，各行经、副理以下，“原分设营业、会计、出纳三课，及文书、庶务，十四年（1925年）文书、庶务，合并为事务课，储蓄独立后，又于各课外，另设储蓄部，十九年（1930年）议决，经、副理下，得酌设襄理”。从业务性质上分类看，这些银行管理部门的分工又可分为事务类、责任类与监督类等不同部分。其中事务类部门包括存款处、付款处、放款处等窗口服务，亦包括签名处、保证处、现金处、记账处、票据处、汇兑处、保管处、信托处、证券处、信用调查处等实务机关；责任部门包括存款揽收、放款决定、顾客招揽、行务发展、信用调查、担保监督、顾客顾问等机构；监督部门则包括监察、会计、人事方面等。总体上看，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部门分科，不外乎营业、会计、收支、文牍几类，至于营业部门的具体分工，则因各行的营业目的、业务繁简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从近代银行业的部门分工演进的角度观察，银行业的内部部门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

业务的流程控制同样是业务分科的重要内容。同一银行业务，分由多人经手，不仅可以及时发现业务谬误，也可以起到有效防范业务舞弊的作用，“银行任何事务，绝不由一人或一部份单独办理，自纵剖面言之，至少经过上下两级职员之手，下级职员之错误及弊端，有上级职员为之监督，上级职员之错误及弊端，亦为下级职员所知悉，或遭下级职员之阻挠，互相有所忌憚，因而各须专诚于事务之执行，而不敢玩法疏忽。自横断面言之，至少经过彼此不相隶属之两个部份，使此一部份之工作及记录，与另一部份之工作及记录互相检证，而能自动发见其错误与弊端，不必待第三者之审查，始能知悉”。以存款为例，一般而言，“当存户开户时，填写存款申请书、印鉴票，由主管员收下，开具凭证，交记账员，收款单据交存户自填，款由出纳股点收，随交记账员登账，由主管员复核，送请上级行员签字盖章，再交主管员，递与存户，此存款存入之手续也”。在这个存款业务的基本流程中，从存户填写开户单据到存款业务完成，至少有主管员、出纳股、记账员、上级行员等数人参与，分别完成不同的业务手续，每个手续在整个流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来，存款流程中的各级行员起到了相互检查与监督的作用，即便是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也会被其他环节及时发现并更正，有效避免错误的发生。

观察各银行的具体业务规程，在存款、放款、汇兑等各主要业务上，无不体现出严格的流程控制。如金城银行天津分行的定期存款手续分为六个步骤：1. 由存款人与经管人接洽存款种类、利率、期限等项后留印鉴书明姓名、住址及户名，现金交出纳课收讫发给铜牌；2. 出纳课收款后制收入传票核对记账后，交定期存款经管人；3. 定期存款经管人凭收入传票具存单或存折，记账后将传票及单折由传递生持向会计主任处核对签章再呈经副襄理或主任签章；4. 经副襄理或主任签章后，交定期经管人交存款人收执，收回铜牌；5. 收入传票当日汇齐交复核员复核后，交会计课记账，印鉴票由定期经管人编号汇存；6. 如以他行号票据存款者，由经管人制转账传票留底，派专人持向各该关系行号兑收无误后，方结具单折交出。但为便利顾客起见，如所存支票等（即同业所开票据），经营办事人员认为可靠或遇素识之存款人，亦可先缮单据交存款人，再将兑收票据登账。存款业务之外，该行在其他业务的流程控制也同样十分严格。事实上不少银行在业务流程控制方面都颇费功夫，综观这些银行的业务流程控制，多人经手、相互监督、共同负责是几乎所有银行业务流程控制的典型特征。

内部防控制度是银行业防控危机的第一道关卡。人事担保制度、业务监控制度以及会计监督制度，构成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危机防控制度的主要内容。整体上看，近代银行业的内部危机控制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传统到现代、从混乱到规范的演进过程，纵观这个制度演进过程，无论是作为行业组织的银行公会，抑或是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都未能在银行内部机制标准化方面发挥太大的作用，以致近代银行业内部危机防控机制在制度来源、制度特征、制度效能方面不尽一致。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内部危机防控制度的日渐发展与成熟，加强了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推动了银行业的现代化发展。

第六章调查与征信：对危机的预测和规避

给银行业带来危机的因素很多，政治事件、军事活动、政府工商业政策调整、金融危机、工商业凋敝、货币价格波动甚或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冲击银行业，以致发生危机。这些因素往往具有难于预测、波及范围广、危害性大等特点。近代中国，由于政治动荡不安，政府主导经济能力弱，国民经济结构不健全，受西方资本市场影响深，工商业发展环境恶劣，银行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复杂性与频发性。因此，具备一定的市场风险和危机的预测与化解能力，是中国近代民营银行业获得发展的基本前提。

信用调查于银行业之重要，诚如时人所言：“近来社会现象日进繁杂，世道人心，愈见欺诈，商业道德，早经破产，信用放款，既不易做，抵押放款，亦有蹊跷，如近年上海德商海龙洋行骗取英商汇丰、麦加利及华商各银行巨款，以及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倒闭案，皆予沪津银行界以巨大之影响，损失之深，自不待言，……究其原因，则由于各银行平时未举行充分之调查，不能洞悉其整个信用之状态，以致发生此出人意表之骗局，故信用调查部之设置，实属必要”。上述论断虽不免有危言耸听

之虞，但细细思量，也不无合乎现实之处。近代以来，随着经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商业环境日渐复杂，仅以个人信用为交易保障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银行业务迅速扩展的需要。尤其是银行放款等授信业务，在放款之前，应深知借户之信用若何，无抵押信用放款，固应如是，即有抵押放款，亦必知之甚详，该所谓抵押品者，不过欲证明其信用确实而已，银行方面目的，是在放款之收回，而不在处分其抵押品也，贴现之票据，更应知出票人信用若何，自不待言”。

此外，信用调查的缺位，也造成银行业与工商业之间的隔膜。近代中国工商业，处于幼稚时期，信用程度并不十分发达。而近代中国银行业开展信用调查者，除少数大银行稍具雏形外，多数银行皆付阙如。“故处理放款，在事前每感困难，不敢放胆去做，在事后则又多风险。有信用者，感借款之匪易，不能向银行通融资金，以发展自身之营业；无信用者，每利用其狡诈手段，使银行借款，变为呆账。于是工商业者，叹银行不能予以协助，银行业者，感世道日非，商业道德衰落，资金过剩而无可利用，甚至不得不投资于投机事业”。由于没有信用调查作为桥梁和中间保障，银行资金越来越疏离于工商业，资金运用呈现出投机性的趋势，于银行和工商业皆为不利。可见，无论对于银行业自身资金安全，还是工商业的健康发展，信用调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银行业信用调查的发生发展

中国传统金融业如钱庄，并没有专门的信用调查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庄业不需要信用调查，钱庄业的信用调查多依赖跑街。跑街依靠自身在某一个或数个行业的人脉网络和商业资源，为钱庄招揽生意，接洽存款、放款，提供居间服务，“**有时亦兼任信用调查，如探询顾客的身家是否可靠，营业是否发达，财产是否殷实**”。跑街以个人关系网络与商业资源奔走于市，探听消息，虽较切近于实用，但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银行业的需要，其原因有三：

第一，从信用调查的可靠性方面观察，跑街的信用调查，无科学的组织与措施，甚至多有道听途说之言，所作报告及资料，多出自传闻，模糊抽象，甚或“仅凭一己之爱憎，而为主观之臆度”，不能尽信。且往来客户信用资料，如果全恃跑街之记忆，设或跑街死亡或解职，则其所联系的所有客户信用资料，将随之消失，银行业务不免大受影响。

第二，从信用调查的复杂性方面观察，昔日银行授信业务中，所收受抵押品如房屋基地、机器、商品等项，因经济社会之组织尚属单纯，其检验评价，亦较为容易。然而随着经济社会日趋复杂，商业市场瞬息万变，抵押品的种类、质地、行情的日益复杂使银行在抵押品评估时每感困难，“昔日只有砖木构造之房屋，今则有钢筋、水泥、大理石等之分；各处基地市价，昔日城南郭北，相差无几，而今则既有华界、租界之高下，复有浦东、浦西之轩輊；机器一项，昔日大部用蒸汽发动，今则有电力、水力、内燃、外燃之区别；至若商品市价，在昔终年平定者，今则因受世界市场之牵制，朝涨夕落，恬不为怪”，如此一来，对抵押品的评估，必应结合抵押品性质构造、市价、保值甚或世界经济状况进行精密之评价，方能合乎要求。以传统跑街的知识水平和调查能力，完成如此复杂的信用调查，明显力不从心。

第三，从信用调查的专业性方面观察，我国近代商业法规并不健全政府监督能力较弱，除少数规范的企业之外，多数工商企业不愿公布营业数字，尽管随着会计制度的逐渐完善以及《公司法》的颁布，工商企业逐渐按照法令要求公布营业状况信息，但这些公开的营业信息往往在“讳饰”之后或残缺不全，或与事实不符。银行授信业务开始之前，需要组织专业人士对授信对象的资金盈绌、经营状况、资产负债、市场前景等营业信息进行复杂的调研分析甚至会计审计，而这些专业工作绝非三两跑街所能胜任。

信用调查不发达的情形之下，银行业资金运用的潜在风险一直居高不下。“目下我国各银行，对于放款之决定，第一，即视其有无抵押品，而借户信用如何，则尚少注意，于是押品作弊、市价跌落，处分押品为难，而使银行资金，陷于呆滞者，每有所闻，此即不明借户信用重要之害也。第二，即以办事员之记忆，而由个人之智识，判别借户之信用若何，其所能记忆者，至多不过该借户向来能否到期付款而已，其实此种到期付款之借户，并不必为有确实信用者，待至发现其不能维持信用时，则为害尤烈，此种不合科学之方法，已不可靠，一旦此等熟习借户内容之办事员死亡或解职时，则发生更大之障碍矣”而设置专业信用调查机构，是弥补传统信用调查形式缺陷的有效措施。

最早开始信用调查的民营银行，是以稳健经营著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调查业务也比较典型。该行的信用调查于1918年开始，此前调查事务并无专门机构管理，该年考虑到业务日渐扩充，而商场信用已不如昔，即在总行国外汇兑处设置调查部，于年终结算盈余项下，拨出一笔经费，专门供调查商情状况，以及各种物品产销之用，以期收效于将来。其主事者先后有奚季耕、伍克家、卓镛诗、范稚圭、叶贯一、徐谢康、蔡钰诸等人。调查部成立之初工作较为简单，仅为关于押汇客户的信用调查，以及答复外界询问关于信用的函件，并无周密的组织。1928年组织总经理处，分设九科时，调查部改为调查科，由资耀华任主任，工作内容扩展为信用调查、编纂客户信用档案以及编辑金融商情周报，报告市场消息。1934年6月总行改组为管理与营业两大部时，调查处与业务、人事、检查、总务同为管理部直轄机构。

调查机构地位提高之后，调查职能与范围也随之扩大。1934年该行颁布《总行调查处办事规程》，详细规定了调查处的调查事务，包括：

(1) 调查工商行金融机关以及个人之营业资产信用；(2) 会同视察员、业务处、检查处、营业部、进展部研究调查之方法；(3) 派员自往或随同视察员赴各处实地调查；(4) 关于放款事前之调查事项；(5) 随时调查放各户之营业状况并报告之；(6) 关于分支行、处、寄庄、仓库或本行报资机关之委托调查事务；(7) 关于同业间之委托调查；(8) 调查并研究国内外经济及金融状况；(9) 调查并研究国内外银行营业状况及其组织之兴革变迁事项；(10) 调查并研究国内外商品市场及各地进出口之贸易状况；(11) 调查并研究各种物价及其变动；(12) 编制本行放款户名记录及各种统计；(13) 编制经济报告及统计；(14) 编辑商品丛刊及其他刊物；(15) 保管并整理各种调查档案；(16) 拟发关于调查上之通函、公函以及本处一切函电并整理归档；(17) 拟订关于调查之各种章程规则；(18) 关于调查之其他一切事项。

观察上述调查处的业务职能，不仅应负责与本行发生关系之商家信用调查，还要接受同业委托调查，亦须会同其他业务部门研究改进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也十分庞杂，包括国内外经济及金融状况、国内外商品市场及进出口贸易、各地物价变动、国内外银行营业状况及兴革变迁，网罗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另外还依据搜集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料，编制调查报告、调查丛刊及各种情报刊物。

此外，为增进同人对于各行业的了解，调查处除每周编制商情金融周报分发全行参考外，还重点编纂了“商品调查丛刊”10册，计有《米》《棉》《纱》《茶》《布》《桐油》《面粉》《糖与糖业》《烟与烟业》《煤与煤业》，这些商品调查丛刊涉及的都是与银行业关系密切的行业，全部基于调查处关于该行业的调查资料编写，内容详尽，资料翔实。以该调查丛刊第三编《纱》为例，作为商品调查，该刊以两百多页的篇幅重点介绍了上海棉纱之种类、上海棉纱之供给、上海棉纱之运销、上海棉纱之交易、上海之纱厂、上海纱业之金融、上海棉纱之价格、上海纱厂之团体、上海纱业改善之方针等几个部分，有关上海纱业的发展历史、原料供给、价格波动规律、纱厂资产负债、运销区域等情形，无不具体而微，逐一分析说明。通过这样一本调查刊物，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基本掌握上海纱业的基本情况，作为向上海各纱厂以及纺织品进出口商号授信的重要参考。调查丛刊出版后，总经理陈光甫大加赞赏，“本行调查部所出之书，亦为对于文化上之贡献，如将各类商品每种说明其来历，以及如何管理，如何运销，各种交易经过情况，令人一目了然，此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者”。由于所载内容紧扣工商与金融实务，商品调查丛刊还受到工商与金融界的广泛欢迎，除赠送2 600余本外，还售出3 500余本，但依然不能满足需要，“即远至云南、广西边境之处，亦有驰书索售者”，由此可见该调查丛刊对业界的参考价值。

1935年5月起，基于抵押贷款业务中客户提供的抵押品种类繁多，且受国内外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抵押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差异很大，为使行员对于各类抵押商品有系统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放款的安全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处选择出产大宗且销路广泛的抵押品，每周发布抵押商品述要一种，编制成册，计有小麦、米谷、豆类、面粉、纱茧、桐油、糖、蛋、猪鬃、纸、棉花、棉纱、棉布、麻及麻织品、烟叶、纸烟、芝麻、棉籽、锡、铜、钨砂、盐、马口铁、铁皮、钢条、生铁、铅、锌、锑、汽油、煤、皮革、花边、猪肠、人造丝、水泥、火柴、肥田粉、漆、橡胶、羊毛等五十种，涉及行业之广泛令人惊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利用自己在全国各地的分支行网络，建立汇市调查报告制度，1922年总行致函各处分支行，要求将当地金融汇市情况详细调查，每周向总行以通信方式汇报一次。在汉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要求各分支行进行信用调查时，须将“各户之资产、品行、能力、学识，逐项查明，详细填列，以便稽考，而求确实”。总体上看，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调查已是初具雏形。

浙江兴业银行于1921年底设置调查部，内设推广、编查二股，前者主要从事企业商号信用之调查，后者主要从事社会经济情况之调查。具体而言，推广股的调查内容包括个人调查、工厂调查、商号调查、银行调查等，其中以商号调查为例，内容涉及（1）名称、所在地、组织营业类别、成立年月、何处注册、电报挂号、董事及监察人（姓名、股份若干）、股东（姓名、股份若干）、重要职员兼营何业、股东有无党派纠纷；（2）主要营业商品、批发或零售、购销旺月、销售渠道、存货若干、有无其他产业；（3）资本定额与实收数、股票市价、上届纯利与开支、与银行钱庄资金往来、在本行存放款数目等。编查股的调查内容包括地方资料整理、图表统计、贷借分析等，以地方资料整理为例，内容涉及财政、产业（农产、畜产、林产、水产、矿产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机械工业、电气工业及纺织工业等）、商业机关、商业（国内商业与国际贸易）、金融机关、金融（资本、货币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经济政策、社会问题、税务、外债、有价证券、各类物价、银行公司事项（股东会、增资、减资、合并、解散、破产及清算、分红等）、法政等。从上述调查内容看，浙江兴业银行调查部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20世纪20年代，与浙江兴业银行业一样，金城银行也意识到“银行非搜索无以推广其营业范围，抑非实行调查无以施其搜索，调查实为推广营业之利器也”，该行从1921年开始积极着手开展调查事务，要求各分支行将已有之往来客户先行调查填报，然后再行调查未有往来之个人与商号所有调查资料应及时汇报总行以为贷款业务的重要凭据。

脚注和尾注

1. 永祚：《银行自卫稽查法（一）》，《银行周报》第4卷第19期，1920年6月1日，第29页。
2. 徐永祚：《监察人制度之改善问题》，《银行周报》第7卷第40号1923年10月16日。
3. 一阳：《银行分科之研究》，《银行周报》第3卷第19号，1919年6月3日。
4. 直心：《银行稽核制度之研究》，《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1卷第2期，1929年5月，第2页。
5. 金城银行总管理处：《金城银行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第128 - 129页。
6. 陈成耀：《银行内部检查概要》，《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6月，第327页。
7. 秦燊：《银行内部业务组织及其业务述要》，《商专年刊》第1期，1934年12月，第95页。
8. 《金城银行津行办事程序》（1921年），见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9. 王恒智：《银行设置信用调查部之必要及其组织与办法》，《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1月，第1页。
10. 董肇骏：《信用调查对于银行事业之重要》，《银行周报》第16卷第47号，1932年12月6日，第24页。
11. 董肇骏：《信用调查对于银行事业之重要》，《银行周报》第16卷第47号，1932年12月6日，第24页。

1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0页。 .

13. 士浩：《信用调查与银行》，《银行周报》第6卷第15号，1922年4月25日，第6页。 .

14. 潘文安：《从银行业务上观察信用调查部之重要》，《银行周报》第17卷第46号1933年1月28日，第1 - 2页。 .

15. 董肇骏：《信用调查对于银行事业之重要》，《银行周报》第16卷第47号，1932年12月6日，第25页。 .

16. 宋春舫等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1934年5月）》，见何品、宣刚编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之机构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

1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42页。 .

18.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13页。 .

19.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48页。 .

2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43页。 .

21. 《汉行注重信用调查》，《海光》第5卷第4期，1933年4月，第21页。 .

22. 王世福：《浙江兴业银行信用调查部业务述要》，《银行杂志》第4卷第11期，1927年11月，第1 - 4页。 .

2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129 - 130页。 .

12.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12部分 总字数：5355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13.1%(702) 疑似剽窃观点：(0)

1	中国商业银行民营思想的发展 李苍海(导师：叶世昌)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8	5.8% (311) 是否引证：否
2	近代银行家：中国金融创新思想的先驱（1912—1949） 童丽(导师：吴申元)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5	4.3% (229) 是否引证：否
3	从中国征信所两次公司登记看其属性之辨 孙建国,彭善民 - 《史林》 - 2005-04-20	3.6% (195) 是否引证：否
4	经济思想史-黄维-王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黄维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 2015-04-22	1.9% (101) 是否引证：否
5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钱庄放款风险规避研究 王大中;张跃; - 《贵州社会科学》 - 2017-08-01	1.6% (85) 是否引证：否
6	商业网络、信贷约束和高质量陷阱——从茶栈放款制度看近代上海茶叶贸易 王大中;张跃; - 《史林》 - 2017-08-01	1.6% (85) 是否引证：否
7	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 吴景平 - 《中国社会科学》 - 1994-11-10	1.5% (78) 是否引证：否
8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 王晶(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5	1.5% (78) 是否引证：是
9	近代中国工业分类研究 方书生;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16-07-15	0.9% (50) 是否引证：否
10	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 宋佩玉(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20	0.6% (33)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关于某行业的调查资料则被编辑刊印成商品调查报告，分发全行，供信贷部门参考。如该行汉口调查分部曾编有《湖北之棉花》一册，内容亦极尽细致：甲编生产方面，包括棉产区域、棉产估计、棉产品品质及检验；乙编市场方面，包括主要棉品市场之分布及其来源，主要棉市场之机构及其交易；丙编运销金融方面，包括棉花运输情形及费用，棉花销路，棉业资金之运用及调查后之意见，另外还附录有棉花贸易相关法令条例以及近年棉花市价统计图、汉口市场主要棉花市价表等。其他如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也设置了信用调查部，从事工商企业的信用调查工作。

银行管理层对信用调查的态度，往往是一个银行能否重视信用调查工作的关键。192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就曾在行务会议上提案，声色严厉地要求各分支行切实重视信用调查，“近来时局不靖，商号倒闭之事时时发生，调查尤不容稍缓。……凡已有往来而未调查者，应即速从事调查，其未有往来者，亦应随时注意。嗣后，凡系往来之商号，均应事先将该号情形调查明白，并详细填表报告总处，既调查后并应随时注意。设中途与原调查之情形有变更时，应将变更情形随时报告总处，设有中途情形欠妥者，即应设法预防。将来各行中或遇有商号倒闭之事发生，为事先未将调查情形填表报处或所报情形不确者，则经手人应负完全责任”。

综上所述，上海、浙江、金城、大陆等银行对信用调查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并付诸于行动，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施效果，都已经较为成熟，并取得不俗的效果。但如若从整体上观察，近代银行业的信用调查状况并不乐观，多数银行缺乏系统、稳定、可靠的信用调查体系，还依然完全依赖跑街甚至经理人对市场与客户的主观臆断作为授信业务的依据。银行业信用调查的薄弱，诚如时人总结银行业征信事业的症结时所指出的，“吾国过去之征信事业，惜其范围不广，目的狭隘，只顾及金融业之放款信用调查，未能调查整个之工商业，故其成效亦甚微”，“十余年来，金融业对于工商业，味于信用，未能尽量辅助者，信用调查组织之缺乏，实一大原因也”。这种情况下，专业、高效的社会征信机构的诞生便成为众望所归。

二、银行征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关于征信所设立必要性的讨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月报》、《钱业月报》分别发表《征信所之需要如何》与《设立征信所之必要》两文，不约而同地提出设立专门征信机关的必要性，“自设调查机关者，或置信用调查部，专司调查，或设信用调查员，周游考察，此法直接指挥，收效较大，然需费浩繁，维持匪易，且实行结果，除本埠调查，成效良好外，他无所闻，乃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矣”；“近世商业繁盛，贷借关系复杂，经营商业者，不得不详查其对方事业之盛衰，资产之厚薄，信用之确实与否，及信用之程度若何，与之交易，以期营业稳实。盖今日之商业，已由都市而广及于商埠，更由商埠而远及于海外，故交易发生，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不若从前之限于同一地方，与少数人之间，而营业者又常变更目的，扩张范围，或兼营其他事业，若无确实调查，或灵敏报告随其后，则事情隔膜，不免易蹈危机，此信用调查机关之所以认为重要，而亦征信所设立之所由来也”。围绕征信业务必要性的论述，引起了工商、金融、学界的广泛兴趣，企业家、银行家纷纷参与讨论，有介绍国外信用调查状况的，有强调信用调查的重要性的，亦有探讨具体信用调查方法的，虽然各自关注重点不一，但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应及早培育征信事业，建构征信制度大多持赞同态度。

金融业者对征信所抱有如此高的热情，是因为与银行自身调查机构相比，征信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优势：

第一，调查技术相对专业。征信所以信用调查为主要业务，其主事人员多为学有专长、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其采集资料、编审报告、分析信用等工作，必能钩稽阐发，微末靡遗。此外，征信所为调查资料集中之处，档案繁多，报章杂志，收藏齐全，与同业公会、官厅机关以及专门人才等，多有长期约定，信息来源广泛，需要收集至资料，一经采访，即可唾手可得。银行不能探访之消息，征信所依靠其专业力量与信息资源，自能提供相应信用调查服务无虞。

第二，征信所相对高效与经济。银行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金融市场，要想获得一个优质客户，非有敏捷之工作效率不可。如果仅靠银行自身信用调查机关，不但人手紧张，周转不灵，且往往对于陌生商业领域，抑或不熟悉之客户，银行信用调查部门也很难立即提供客户的详细信用信息。而征信所专于此项业务，平时关于各行业资料储备充足，一经请托，崇朝立致。从经济方面而言，征信所之营业，大都采用会员制，只要缴纳一定的会费，一年之中，“关于商家信用之时虚时实，市况变动之前因后果，征信所均当随时自动报告，条分缕析，洞烛靡遗，即平时业务之需要，临时委托调查，以最低之费用，获准确之报告，远非银行自行派员调查之劳民伤财者所可比拟”。

第三，调查范围广泛，结论相对公正。近代中国的多数银行，为保障自身资金安全，资金运用上往往只与熟悉的行业或工商企业打交道，较少涉及陌生的领域。这就导致对其他行业或工商企业的信用调查很难展开而征信所因其业务性质的关系，平日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征集各行业的商业信息，资料储备亦较丰富，因此在信用调查的广泛性方面，征信所要比银行较有优势。在调查的公正性方面，银行调查人员，“因与往来客户有营业上之接触，经时稍久，情感自生，爱好憎恶，人情不免，以之从事信用调查，遂有因情感利害之顾虑，而为主观之论断，悖谬事实，隐蔽真相，影响营业”。而征信所则可以超然之地位，做真相之探究，“唯其无利害之关切，主观之爱憎，故所下结论，易与事实相接近”。

关于筹设征信机构的问题，早在1921年5月，全国银行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联合会议上，鉴于“年来外币之涨落过巨，国内之银根日紧，各埠商业状况，及各公司商号之营业状况，莫不有重大之变迁，各自调查，殊感不便，则征信所之设，实为必要之图”，决定在各地筹设征信机关，后因政局扰攘，最终未有成效。就在中国银行业酝酿组建征信机构之时，社会上已有数家外国征信机关，包括日商创办的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与东京兴信所，以及美商创办的商务征信所与中国商务信托总局。20世纪30年代之后，国内经济受内战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商金融日渐凋敝，“及构成经济社会重要元素之信用制度，亦为之动摇”，银行信贷业务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工商行号因经营不善，纷纷破产倒闭，甚至以各种欺诈手段骗取银行信贷，以致所欠银行贷款无法偿还的现象屡有出现，银行业与工商业互不信任，“工商业方面恒怨金融界之深闭固拒，而金融界方面亦恐工商业之过河拆桥”，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银行业仅仅依靠自身的调查部门已无法应付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另一方面，由于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缺乏必要的了解，其征信机构调查所得中国工商行号的资料，“充其量也不过得到些皮毛，欲知详细底蕴究非外人所能办到，所以就是从前数年各行对于外国人制送的报告，也渐渐失却了信赖”，再加上“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商所办的征信机构大部分停止营业，之前依靠日商征信机构获取工商客户资料的银行顿时失去了征信机构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对外信贷业务的困难。

1932年3月，由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兴信社的研究机构，该机构是一个学术组织，以研究征信问题和信用调查方法为主要目的。中国兴信社最初设干事三人，分别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耀华、中国银行祝仰辰和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担任，社员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行储蓄会、中央银行等七家，后来又陆续有国华银行、新华银行、中孚银行、东来银行、华侨银行、邮政储金业局、中一信托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加入，并增补了中央银行陈其鹿、浙江兴业银行的杨荫溥为干事。6月6日，在中国兴信社的指导下，中国征信所正式宣告成立，上海华商银行十之八九加入为该社会员，并吸收日商上海兴信社和美商商务征信所的调查人员为调查员。根据该所章程，其业务包括调查工商企业和个人的身家、事业、财产、信用；调查市场动态；发行信用调查报告书，出版工商行名录及其他刊物；代收账款；在银行不甚明了其放款对象的信用程度或内部情况时，接受委托，写成调查报告；银行接收抵押放款时，对押品情况可以委托代为调查，以定取舍；制造商对批发商，或批发商对零售商进行信用放账时，情况不够了解，也可委托调查，以定放账标准；编印工商行名录，以便各行业备考；发行商情报告，登载市场的变化、外汇标金的涨落、国内公债的买卖、花纱布和杂粮面粉的交易情况等。

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书计有六种，分别为（1）所方自动发表的（包括工商业的调查）；（2）特别报告书（每月工商业异动调查）；（3）秘密报告（个人信用调查、工商业情报）；（4）市况报告（商品产销、市场变动）；（5）保单调查

；（6）信用放款调查（工商企业的信用）等。报告书的项目包括经济情况（资本额、营业种类、营业方针等）、营业情况（商品来源、商品销路、每年营业额、历年盈余）、过去情况（历史、开设年月、内部组织、董监名单、合伙人姓名、注册日期、职工人数）、信用程度（经理姓名、籍贯、简历、在同业中的地位、同业意见、社会评价、往来银行及评价）和其他（地址、发行所总厂、分厂等）。

中国征信所的会员，除创建初期由中国兴信所的23家银行依然作为基本会员转入外，又陆续有其他银行作为普通会员加入，至1935年11月，该所共有会员银行154家，并依照缴纳会费之数目，委托调查事件之多寡，分为甲、乙、丙、丁、特五种，其中甲种会员即中国兴信所转人的基本会员，皆为兴信所时期的创始银行，他们不但参加征信所的业务管理，而且能够得到内部保密的报告，作为银行放款时的参考，此种会员入会时每年做纳会费300元，故委托调查的次数也相应较多一些，费用也较少，这是与其他会员银行的主要区别。其他几种会员银行缴纳的会费与享有的调查次数也不尽相同。不论何种会员，凡需要用英文撰写报告书的，会费与报告费一律按照原定费用加收40%计算，非该所会员如需调查报告书，经该所同意，依照中文报告每份10元，英文报告每份14元缴纳。

1934年1月，中国征信所鉴于各基本会员银行皆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但却须对中国征信所负无限责任，不利于会员银行与征信所的发展，乃经会员银行提议，将中国征信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月11日经中国兴信社第六次社员大会讨论通过，2月13日第七次社员大会通过中国征信所章程，额定资本2万元，先收二分之一，全部由中国兴信社筹拨。5月15日中国征信所有限公司举行创立大会，选举成立董、监事会。股份制、企业化之后的中国征信所，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征信业务也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如该所根据金融业服务的对象，把社会组织划分为特种事业、制造工业、贩卖商业、农矿渔牧四大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作为其开展信用调查、建立档案分类以及组织情报网络的依据。根据这个分类标准，中国征信所的情报网络分为地区情报网和行业情报网两种，地区情报网是将全市划分为若干区域，每区由调查员一人或数人负责，行业情报网则由各业特约顾问及特约调查员组成，这些特约顾问或调查员，都是熟谙该业行业习惯的代表人物，如棉布业的叶笑山、绸缎业的蔡声白、搪瓷业的顾炳元、钟表眼镜业的余寿佛、营造业的辛继修、洋杂货纸业的李文翰、广告业的王梓濂、火柴业的王性尧、保险业的傅生林、房产业的李伯涵、杂粮业的周之慎、电料业的胡西周、化学业的许冠群、进出口业的陈制松、毛纺织业的程年彭、花纱业的穆湘玥、生丝贸易业的蔡仁抱、新闻业的潘公展等五十余人，都是各业中的领袖人物。

规范化的管理以及高效的情报网络促进了中国征信所业务的发展，“该所成立以来，营业发达，成绩甚佳，各界对之亦均有良好之印象，今年为扩展营业及应市场之需要起见，并在天津、汉口等通商大埠，设立分所专办征信事宜，还来各分所加入之会员，甚形踊跃”。该所成立之初每月接受的征信申请仅几十份，后来发展到每天就有二三十份，至1936年7月，该所共发行征信报告三万份左右。

正当中国征信所的发展步入正轨，业务日益增长的时候，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进而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全面抗战状态，工商企业大量关闭或内迁，银行业业务严重收缩，征信所亦随之陷入停顿。抗战胜利后，尽管勉强复业，但适值币制跌落，物价飞涨，投机盛行，信用调查可谓是有可无，辗转维持至上海解放，该所移交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宣告结束。

近代中国征信事业，除上述少数短暂的时期外，整体上并未得到全面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在商业环境的影响，“商界习惯，类均重守秘密，而我国尤甚，不特不乐以自己之底细，详告他人，且不愿以所得之其他之消息，泄露于人，故银行欲从商界方面，调查事情，为事极难，若非职员日夕周旋于商人间，乘便获得一鳞一爪，殆无探听消息之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银行业自身资金运用特征所导致，银行资金沉迷于各种投机市场，很少用于投资实业企业，因此银行业对于工商企业的征信业务需求量不大，自然也就疏于对征信业务的研究与关注，以致社会征信制度长期不能得到发展与完善。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div><div>1. 1932年3月，由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兴信社的研究机构，该机构是一个学术组织，以研究征信问题和信用调查方法为主要目的。中国兴信</div><div>2. 2月13日第七次社员大会通过中国征信所章程，额定资本2万元，先收二分之一，全部由中国兴信社筹拨。</div><div>3. 根据金融业服务的对象，把社会组织划分为特种事业、制造工业、贩卖商业、农矿渔牧四大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div></div>
脚注和尾注
<div><div>1. 《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近编印“商品调查报告”二种》，《经济统计月志》第5卷第8期，1938年8月，第8页。</div><div>2. 《民国十四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第一次行务会议记录（1925年2月8日），载天津市档案馆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第164页。</div><div>3. 王维骥：《中国征信所应力谋金融业与工商业之沟通和发展》，《银行周报》第16卷第22号，1932年6月，第26页。</div><div>4. 朱继珊：《信用分析之研究》，《海光》第5卷第7期，1933年7月，第4页。</div><div>5. 记者：征信所之需要如何》，《上海总商会月报》第4卷第2期，1924年2月，“言论”第3页。</div><div>6. 民：《设立征信所之必要》，《钱业月报》第4卷第6期，1924年6月，第10 - 11页。</div><div>7. 以上见潘文安：《从银行立场观察征信所之功用》，《银行周报》第17卷第48号，1933年12月12日，第1-2页。</div><div>8. 王相秦：《我国之信用调查事业》，《自力旬刊》第6 - 7期合刊，1936年9月，第7页。</div></div>

9. 谡庐：《中国征信所之创设》，《银行周报》第16卷第18期，1932年5月，第5页。.
10. 潘文安：《我国征信事业的过去与现在》，载寰球中国学生会编：《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刊》，第3页。.
11. 《中国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章程（193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通商银行档案，档案号Q281-1-120-78；吴嘉年：《中国征信所始末》，载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旧上海的金融界），第249-350页。王维骢：《征信问题与信用调查》，《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1期，1935年1月，第38页。.
12. 吴嘉年：《中国征信所始末》，载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旧上海的金融界》，第349页。.
13. 庄志龄：《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及其信用调查》，载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409页。.
14. 王相秦：《我国之信用调查事业》，《自力旬刊》第6-7期合刊，1936年9月，第8页。.
15. 士浩：《信用调查未臻进展之原因》，《银行周报》第7卷第26号，1923年7月10日，第8页。.

13. 近代民营银行危机的防控与应对研究（1897-1937）.doc_第13部分

总字数：9319

相似文献列表 文字复制比：52.7%(4913) 疑似剽窃观点：(0)

1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银行业之联合准备制 吴晶晶 - 《史林》 - 2005-06-20	43.0% (4010) 是否引证：否
2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 王晶(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5	5.8% (537) 是否引证：是
3	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 郑成林(导师：朱英) -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01	2.8% (263) 是否引证：是
4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吴景平,王晶 - 《近代史研究》 - 2002-05-27	2.8% (259) 是否引证：否
5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吴景平;王晶;-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2001-09-01	2.7% (252) 是否引证：否
6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 郑成林;-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11-27	2.3% (214) 是否引证：是
7	近代突发事件中的上海金融业 施正康 - 《上海经济研究》 - 2004-12-20	1.9% (181) 是否引证：否
8	近代突发事件中的上海金融业 -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 《网络 (http://www.cssn.cn/n) 》 - 2012	1.9% (181) 是否引证：否
9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 刘平;- 《史学月刊》 - 2008-09-25	1.5% (136) 是否引证：是
10	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 周石峰(导师：金普森) -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 2005-04-28	1.4% (133) 是否引证：否
11	以创新推动现代化经营——致力于金融创新的银行家李铭 李银芬;- 《中国城市金融》 - 2013-06-15	1.3% (122) 是否引证：否
12	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 周石峰,金普森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01-10	1.2% (116)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七章联合准备与行业监督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事爆发，上海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业面临严重的危机局势。上海银行公会面对突发事态，采取联合准备等有力措施，稳定了局面。而在平时，上海银行公会则保持对会员银行的监管督导，预防风险和危机的发生。

一、一二八事变后的联合准备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市商会向所属会员发出停市通知，要求各业一致罢市御侮。上海银行公会与上海钱业公会为此于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两次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停市3天。2月1日市商会再次集议，认为本埠战区扩大，租界交通业已阻隔，危机四伏秩序不安，决议继续停市。银钱两业公会联席会议虽然决定遵照市商会之议决，停业无限展期，但各行庄公司对于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却十分担忧。

对于第一次停业3日，银钱两业已经惴惴不安，生怕复业时市民为预防战事延长而竞相藏现，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引发金融恐慌。况且，当年2月6日至8日为农历新年之例假，市民会为过年及假期中生活需要而将钞票兑换银元，金融业可能遇到更大的压力。待到2月1日市商会决议各业继续停业后，银行界诸领袖认为市面停顿、金融枯燥，人心将愈见恐慌，银钱两业实有先行开市的必要。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如果复业时民众群起提存挤兑，则金融即可破产，上海金融一倒，必然牵动沪杭、京沪一带的金融，这正中敌人摧毁上海金融中心之计，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复业，同时为做好充足的复业准备，与上海银行界其他重要成员研究妥善办法。与各大商业银行密商，就缩短停业期达成共识，再疏通实力较弱的银行，同时与银钱两公会领袖磋商组织联合准备机构，彼此扶助，俾免自相惊扰，进而以集体的力量安定市面。2月3日，银行业决议全体合组

公库，以维持金融流通，同时征得外商银行同意，从即日起拒收华人存款。该项银行业公库制度，系由各银行将存有之货物、租界内中心区之地产以及伦敦市场有行市之证券，一律交存公库，由各行共同保管，凡有顾客提存，一概无限制照付，顾客既不能以巨款转存外国银行，惟有在华商银行之间转移；公库既经组合成立，则若有银行周转不灵，各行可全体协助，以安定其基础，不令动摇。钱业方面也有相似的举措，组织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将各庄财产，由公会保管，集合各庄之能力，并规定每家至少缴存20万，多多益善。有此准备后，银钱两业于4日复业，当日各行庄均未发生提存挤兑的现象。同日，银行业的财产保管委员会和钱业的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同时成立，银行业所缴财产约值现金5000万元，钱业则为1583万两（至2月5日止），有70余家汇划钱庄参加。当时舆论认为，随着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从此市面稳固，人心当更可安定矣”，“金融界形势，已得履险如夷”

银钱业复业后，金融市场仍较为紧迫。1932年2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经过协商讨论，决定成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3月15日，联合准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最初加入联准会的银行为25家，分别是中国、上海商业储蓄、四行储蓄会、交通、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实业、四明、中南、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国垦业、东莱、中国通商明华、国华、中国农工、通和、中孚、女子商业储蓄、永字、江苏以及中华银行。当时，上海银行公会26家会员银行中，有20家加入。第1届执行委员为李馥荪、胡孟嘉、陈光甫、胡笔江、贝淞荪、吴蕴斋、徐寄庾、钱新之、唐寿民、陈燕青、孙衡甫等11人。执行委员又互选出李馥荪、贝淞荪、胡孟嘉、唐寿民、钱新之等5人为常务委员，其中李馥荪为主席。该会又聘任朱博泉为经理。舆论认为：“上述诸君，或为银行界信誉夙孚之领袖，或为各业之专家，壁划进行，不遗余力，预测开办以后，于调剂金融本旨，定能贯彻也”

联准会成立时，各有多项规章，计有：章程54条，公约30条，公单简章12条，拆放章程10条，准备财产保管委员组章程10条，准备财产评价委员组章程10条，缴存准备财产及领取单证条款5条等。这些章程则是联准会的组成及其运作的依据。

联准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委员银行代表大会，下设11人组成之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互选5人为常务委员，再由常务委员中互选主席1人联准会内设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科，并设经理1人，副经理若干人，由执行委员延聘。经理商承常务委员，副经理辅助经理，负责具体事务，办理一切事宜。此外，委员会下设保管委员组办理准备财产保管事宜，设委员7人，由执委会就执行委员中推举2人，再就上海金融界中聘任5人担任；另设评价委员组办理准备财产评价事宜，委员至多20人，由执行委员中推举3人，并设房地产股、证券股票股、丝茧股、花纱布股、食粮股等5股，各股聘专家1至3人担任委员，必要时可临时另聘专家。

委员银行在加入联准会时，须认缴一定金额之财产，经执委会核定后缴入该会，并负随时缴足之责任。准备财产限于下列5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内之房地产、立时可变现之货物、在伦敦或纽约市场有价值之股票或债券、现金或可得兑现之金币或现金条、他种财产经委员会许可者。准备财产分基本、普通两种，委员银行可于认缴时认定一种或两种。认缴基本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非因该银行解散，不得退出联准会，也不得取消其认缴的基本财产额之全部或一部分。认缴普通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非于星期前通知该会并经该会许可，不得退出联准会，亦不得取消其认缴之普通准备财产额之全部或一部分，委员银行在征得联准会同意后，可将其所认之普通准备财产额改为基本准备财产额，当联准会的准备财产总额减少时，得由委员银行增认。委员银行可以于不减少其原认额之范围内，抽换或收回其所数存之准备财产之一部分。当准备财产遇有市价低落或有败坏之虞时，经委员会通知，委员银行应即照数补足，不然联准会可以处分其准备财产用以抵偿其所领单证，若有余则交还原数委员银行，不足仍需催缴。

委员银行向联准会缴存准备财产后，可向委员会按照估价70%领用单证，成为单证的发行人，其中包括公单4成、公库证2成及抵押证4成，而抵押证的成数，可由委员会改换公单、公库证。以上3种单证均为记名式。公单为见票即付，联准会为付款人，公单付款基金由委员会准备，当联准会为公单付款后，得即向原发行银行收回同数的现金，同时应另发新公单。公单以上海规元银为单位，上记收款人之姓名或商号及发行日期，由发行银行签名，并由联准会副签，照公单简章规定，公单的持有人得以公单照票面金额，向任何委员银行清偿债务或作为存货，或其他之付款，且委员银行可以所领公单为抵押品，向委员会十足拆款，这就意味着公单一方面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另一方面又可凭以拆借现金。公库证与公单不同，不能兑换现金，也不能用于拆款，但可以作为发钞银行发行兑换券及各银行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金。另外，委员银行得用现金6成，公库证4成，向发行银行领用兑换券，再于30天内备足现金向发行银行换回该公库证。抵押证可为委员银行间拆借款项的抵押品，也可以像公库证一样作为发行银行发行兑换券及各银行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

上述公单拆款，期限为1日，而拆放利息由常务委员议定，由会挂牌，每月清算1次，此所谓公单拆息，即银行与银行间放款之公定利率，与钱业公布的拆息名同实异，无论拆放资金还是应付公单基金都由联准会准备，而该会自身并无资本，上项资金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筹集的：收受委员银行托放款项，商由委员银行认贷款项，向其他银行或银团借入款项，执行委员会决议之其他准备方法所收入之款项。

联准会自1932年3月间开办以后，为手续便利起见，先通知各委员银行将拟财产预先开单送会评价，而各委员银行拟之准备财产大部分均属于最稳实的房地产及有价证券。凡各种财产，都分门别类由各股专家作精确审查，方始评定价值。至6月下旬，已有19家银行将原认缴的准备财产缴会保管，共计财产3589万余两。准备财产存之后，联准会的保管委员会即将此项准备财产陆续委托信誉卓著之华洋银行妥为保管，其中外商银行为汇丰、麦加利、花旗等3银行，华商银行则为中国、交通两家，其中中交两行专门保管内国公债及库券，其他财产均委托汇丰等3银行保管，该会保管委员暨常务委员得随时负责查核，保管方法与手续均有详密规定，力求稳妥，因而颇得委员银行的信任，有不少银行以超过认缴额之财产，存由联准会保管。6月1日，联准会开始发放3种单证，与此同时，公单拆息开始挂牌，当日的利率为年息7厘。沪战结束后，市况有所复苏，因而截

至1932年年终，联准会的拆放业务并未实行。各行所领单证，大都存充各种准备，偶尔有因移转来回注册，或以公单代替本票行使的情况，但为数亦不多，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市面逐渐宽弛，另一方面，各同业实力充足，且社会对于各同业所组织之联准会，已有相当的认识及信任，无疑也是因素之一。

在各行最初缴存的准备财产中，房地产及外国有价证券占很大比例。1933年1月，联准会以内国国债自整理案实行后，担保确实，市价稳定，将其议定为准备财产种类之一。为稳厚起见，决议用内国国债充准备财产时，照市价6折发给单证每一委员银行用内国国债数充准备财产，以该行实做财产总额十分之二为限：遇市价低落满1折时，应即补撤，不满1折时，由经理酌办，在实行之前，均先征求保管委员会同意。

各行所领单证，主要用于存充各种准备，至1933年，各银行间相互行使，比之发行初年已有增加，但作为在市面可以替代现金使用的公单，其在市面的流通，仍然十分少见。联准会认为影响公单行使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单付款限于即期，且票面限于整数，未能符合商业需要。基于以上考虑，1933年5月1日，在第23次执行委员会上，联准会对原有的公单制度进行了改良，修正公单简章，改定公单式样，明定公单贴现办法，同时增加公单付款基金，变更发给单证成数，计公单公库证各占半数，取消抵押证，以通信方式，由各委员银行决议通过，于同年7月4日起实行。新公单与旧公单相比，既保持了稳要确实的特点，又被赋以灵活便利的功能。

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和联合准备委员会的成立，打通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隔阂。存户因为不能将大量现金转存外商银行，即使大量提款，最多只能将一家华资银行的存款转移到另一家华资银行，有公库保障随时调拨，哪家银行也不会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联合准备的成功不仅救了眼前之急，而且使上海金融业有了进一步改革健全制度的统一认识，原先阻力重重的设立票据交换所计划很快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联准会筹设之初，同业公会即有委托其办理票据交换之议，但“时事孔急，未遑进行。”1932年6月，联准会开始审查兼办票据交换事宜暂行办法，议订章程，于11月间完成章程草案。11月19日，联准会第6次委员银行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兼办票据交换事宜章程草案修正案，并函送同业公会核准备案。同时设立票据交换所委员会，除经理朱博泉为当然委员外，设委员9人，设计交换所一切事务，并负责厘订各项规则。当即决议推举中国银行程慕灏、交通银行李亦卿、四行储蓄会周德荪、上海银行杨介眉、浙江实业银行陈朵如、大陆银行叶扶霄、垦业银行王伯元、东莱银行王子厚、通和银行刘鸿源为票交所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0日，票据交换所以同业公会楼下为交换场所，正式开办，同日起举办银元票据交换，共有32家银行加入为交换银行。银行业十多年来数度等议之公共事业，至此终告完成。

在一二八事变后金融紧迫的情形下，应急成立的联准会确立了银行界的集体安全制度，也成为一般市民的定心丸。联准会的建立，是银行公会强调同业团结、互助合作精神的结果，同时也使银行公会对外活动更趋活跃，影响进一步增长，成为银行业共同行动的核心。

二、上海银行公会的同业监督

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它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矫正金融上之弊害”，对银行业来说，最大的弊害，莫过于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隐患，因此，对银行营业进行风险监督便成为银行公会的主要职能

1. 行业监督规范与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得到同业广泛认可的业务经营规范，是实施行业风险监督的制度前提。各地银行公会主持修订的银行业业规，正是银行同业共同遵守的规范性文件。上海银行业营业规程是近代银行业最早出台的行业性规范。1920年7月，上海银行公会通过“上海银行营业规程”16条。综观该规程内容，对银行营业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了各银行营业时间。之前由于各银行彼此缺乏联络，各自为政，营业时间极不统一，往往造成同业间相互业务交割不一致。此外，不少银行常以特殊情由随意停业，多数情况下尽管事出有因，但容易引起民众误解，引发市场恐慌，因此在营业规程中，不仅规定银行营业时间每日自上午9时起，至12时止，下午2时至5时止，对星期日、国庆日、阳历新年等例假时间亦有详细规定，例假之外，各银行应照常营业，除经银行公会公定外，不得随意停业。

（2）规范了银行经营业务的种类，具体包括各种活期定期及储蓄存款、活期定期抵押放款及信用放款、抵押往来透支计信用往来透支、票据贴现、国内汇兑及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买卖生金银及各种有价证券、信托业务、保管贵重物件以及政府委托代理及特许服务。

（3）为统一各类业务行市，避免同业过度竞争，业规规定银元行市国内汇兑行市、国外汇兑行市等各类交易行市，由银行公会根据市面情形，酌定各该行市，挂牌公布。各银行相关业务，以公会公布之行市为交易标准。

（4）在保障会员银行安全，提倡稳健经营方面，该业规要求会员银行的营业准备金除按照国家规定成数充足准备发行准备金外，还应存储现金准备至少20%以上，并须加储保证准备至少10%以上。在国家规定的准备之外，对会员银行的发行准备提出更高的要求，体现了业规对钞票发行安全的重视，此举旨在以厚实准备的方式规避钞票滥发可能引发的挤兑风险。

（5）业规用大量篇幅对各类票据业务的手续、挂失以及免责条款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如定期存单由总经理、副经理，或有权代理总副经理签字之重要职员签订盖章为凭，并须由存款人于存款时留存印鉴为将来到期取款时核对之用，如存款人要求银行不留印鉴，将来到期凭单付款银行亦得允其所请，但银行不负一切危险之责。其他如存折、支票、本票、汇票以及各种抵押品收据与信托业务之收据的存取手续皆与定期存单同。业规对票据挂失手续也规定得十分严格，如不记名本票的挂失，因其“关系信用甚巨，无论何人，凡执有此项本票皆可作为现款使用，倘顾客向银行出立本票交付他人，或向他行贴现出货，抑自受愚骗，另有别种关系，无论何时不得向银行挂失止付。如遇水火、盗贼或途中遗失者，由失事人觅殷实保证人出具保证书，向银行请求挂失止付，登报存案，银行得暂以止付，即由银行将款项送交公会暂为保存，俟手续办妥，再行付款，倘另有转被银行查出者虽请求挂失止付，不生效力。倘未来挂失之先款已付出，银行不负责任”。其他如记名本票、定期存单、汇票等

挂失手续与不记名本票类似。

该项营业规程，不可否认，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合理之处，如定期存单存款额至少在100元以上，存折的第一次存款至少在200元以上，开具支票至少在5元以上等，这种限定大额存款的做法尽管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银行的营业成本，却将多数小额存户拒之门外。另外，统一营业时间亦遭到部分同业的质疑，如质疑者提出各地、各业营业习惯不同，划一营业时间必将有碍营业，“譬如上海各钱庄解款于银行，必俟晚间，方相结束，或银行应付钱庄之款，亦必俟晚间，方向收取，则出纳科之办事时间岂能与别科相同，五时之后，一律停止营业乎？”但整体上看，上海银行营业规程在规范同业业务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为日后逐渐完善行业监督制度奠定了基础。

该项营业规程此后一直被上海银行业所沿用，至20世纪30年代初其间历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银行公会遵照《工商业同业公会法》改组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票据法》与《银行法》等政府金融法规相继颁布施行等变化，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金融法规与社会环境。1932年6月，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改组后的第二届会员大会上，会员认为“前银行公会所颁上海银行营业规程，系民国九年间修订，尔时银行营业未盛，事务简单，故所定规程体裁，略如钱业营业规程，而周密则远逊之。其间政治变化迭起，法律改弦更张，经济社会之情形，历有嬗递，银行业务之繁复，更倍于往昔，而银行营业规程则始终未加修改，吾人每当营业遭遇困难之际，辄有无所适从之苦”，提出应对营业规程做相应修改。该项提议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并公推徐寄庾、贝祖貽、胡锡安、杨介眉、金侣琴、吴蕴斋、王子厚等人组成修改营业规程委员会，徐寄庾为召集人，主持银行营业规程的修订工作。同年12月，委员会完成了新业规的修订工作，新的银行业营业规程与旧规程相比，在业界质疑较大的内容上多有增减，以适应营业习惯：其营业时间，改为每日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取消了中午休息时间，以方便顾客随时办理业务。为照顾到各业习惯，新业规还特地补充“但各行因其习惯，得延长之，惟须报明本会备案”之语，方便各银行根据所在行业特征灵活设置营业时间。其二，在银行业务种类中，增加了仓库业务，使经营仓库成为银行的合法营业，以适应日益增加的抵押放款与押汇放款业务。其三，删除了定期存单、存折等存款业务的最低数额限制，由各银行自行决定，方便了各银行降低存储业务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金。其四，依据《票据法》《银行法》等国家法律，对各种票据贴现、承兑挂失的手续以及免责条款进行更加准确的表述。

经此次修订之后，银行营业规程更加合理、合用、合法，不仅基本上适应了银行业经营的实际需要，也与国家金融法令更加契合，此后除在1935年因币制改革的原因，对其中涉及货币单位的条款进行细节修正外，规程内容基本未再有大的变动。上海银行营业规程出台后，成为其他地方银行业的效仿模板。北京、汉口、重庆等地皆以上海银行营业规程为蓝本，制订各自的营业规程。银行营业规程的制订与修改，为银行业的经营行为树立了一个普遍性业务规范，为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具体业务的监督定了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上海银行公会又分别制定了一系列专门业务的行业规范，逐步形成一个行业业务规范与监督体系。1924年1月，上海银行公会出台《华商汇兑经纪员章程》，规定所有华商经纪员必须经过上海银行公会认可方能执业，且只能充当中介角色，不能参与买卖双方协商价格，更不可以有所蒙蔽，不得兼营他业，否则亦将被取消经纪员资格。1929年6月，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制订《上海银行公会行市委员会简章》，以划一银行营业上之行市，共同遵守为宗旨，每日上午九时各银行应派代表一人，齐集银行公会，议决各种行市，以便挂牌公布。行市委员会统一行市的做法避免了各银行根据自身的头寸需要擅自决定行市的乱象。同一时期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制订了一系列银行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如《金业与银行互守规则》《上海银行公会检查部规则》《收兑破损兑换券办法》《会员银行国外汇兑检查规则》《会员银行钞票准备金检查规则》《会员银行储蓄处检查规则》等，这些规章制度基本构成了抗战前上海银行业的行业法规体系与约束机制。

2. 业务指导与检查

防范风险仅仅依靠行业规范是不够的，依照行业规范指导与检查银行业务，矫正银行营业上之弊害，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对银行经营的潜在风险加以预警是银行公会业务指导的其中职能之一。1921年信交风潮之后，银行从业人员投机舞弊案件日渐增多，上海银行公会有鉴于此，于1922年9月通过相关决议并通告各银行，告诫银行行员“须知投机之危害，小则名誉损失，大则倾家亡身，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指出“行员而为投机之故，对于行务分心犹其余事，势必因个人与纪人有私感，徇情回护在所不免，即使行员暗中获利，而行中营业已阴受无穷之害”，要求各银行对行员要“随时加察，并勤加劝阻，以冀不生行险侥幸之想，为当务之急，自经劝告以后，倘再有发生投机行为，无论有无亏累情事，除由本行照章斥退外，并报告本会，由本会通告在会各银行，弗予收用，以示共弃之意。”。银行公会这种警告一方面足以引起各银行对内部职员舞弊问题的重视，通过加强内部业务与人事监控规避行员舞弊风险，一方面公会要求在会各银行不得录用有舞弊劣迹的行员，无疑对试图舞弊的行员也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全行业共同抵制舞弊的做法，其实际效果往往比银行内部惩罚措施要好。《银行周报》曾有文章对银行公会的这种警示作用给予特别的肯定：“去年投机热狂虽炽，沪上得以维持现状，卒未发生重大风潮，不得不归功于上海银行公会之一再警告，及该会会员银行营业政策之稳健也。”

1936年2月，银行公会再对同业发出业务预警，提醒各银行注意房地产抵押放款时应同时取得抵押房地产的抵押债权与租赁权。此事起因于1933年冬中一信托公司受押本埠锦兴地产公司道契房地产约600万元，双方订有抵押借款合同，但至1934年秋，锦兴地产渐渐不能如期付息，并对中一信托公司的催款置之不理，中一信托公司随即将锦兴地产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将合同内抵押房地产先行假扣押，以保全债权。经法院照准后，由债权人收取房租，转交法院保存，然此举突然遭到另一家对抵押产业宣称有租赁权的公司英商业兴地产公司的反对，该公司宣称1933年10月曾与锦兴地产公司签署过租赁协议，以每年26 500元取得抵押房产35年租期，其间又有日人借口业兴早将上项租约，向其押借80万元，并雇佣日籍浪人多名，一面抗拒债权人收租，一面强迫房客交租。尽管中一信托公司债权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事实上因受到种种阻碍，不但租金难于收取，拍卖亦无人敢应拍，造成僵持之局，缠讼数年，枝节丛生，迄未有适当解决。银行公会在分析该项案件后，认为其根

本原因在于“当抵押之始，该公司等只执有抵押债权，而未取得租赁权，以致其后俱因租赁权而发生种种纠葛”，银行公会认为“本案事实，足为我同业受押房地产之借镜”，将中一信托公司与锦兴房地产公司案情及诉讼经过详细撰文，印发各会员银行，“至希察览，并盼嗣后对于房地产押款之租赁权加以深切注意”。

作为同业组织，银行公会的行业监督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与银行自身的风险管控不同，银行公会的行业监督更能从行业一般性、整体性的角度考量，而非某个银行个体利益的角度考量。这使行业监督不因具体细节问题而迷失正确方向，同时，应对措施也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作为同业组织，银行公会的行业监督更能从银行业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行业监督的目的也以促进行业福利为宗旨，因此银行公会在行业监督规范与制度的建设方面以建设性法规为主，惩罚性法规为辅，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较少使用惩罚性条款。再次，作为同业组织，银行公会依靠其下属的银行学会，对行业风险的预测、评估、分析更具有专业性，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更有针对性，也更能符合行业法规与政府法令，这是银行个体力量所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公会的行业监督对弥补银行个体风险管控的不足，提高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p>1. 银钱两业公会联席会议虽然决定遵照市商会之议决，停业无限展期，但各行庄公司对于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却十分担忧。</p> <p>对于第一次停业3日，银钱两业已经惴惴不安，生怕复业时市民为预防战事延长而竞相藏现，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引发金融恐慌。况且，当年2月6日至8日为农历新年之例假，市民会为过年及假期中生活需要而将钞票兑换银元，金融业可能遇到更大的压力。待到2月1日市商会决议各业继续停业后，银行界诸领袖认为市面停顿、金融枯燥，人心将愈见恐慌，银钱两业实有先行开市的必要</p>
<p>2. 与各大商业银行密商，就缩短停业期达成共识，再疏通实力较弱的银行，同时与银钱两公会领袖磋商组织联合准备机构，彼此扶助，俾免自相惊扰，进而以集体的力量安定市面。2月3日，银行业决议全体合组公库，以维持金融流通，同时征得外商银行同意，从即日起拒收华人存款。该项银行业公库制度，系由各银行将存有之货物、租界内中心区之地产以及伦敦市场有行市之证券，一律交存公库，由各行共同保管，凡有顾客提存，一概无限制照付，顾客既不能以巨款转存外国银行，惟有在华商银行之间转移；公库既经合组成立，则若有银行周转不灵，各行可全体协助，以安定其基础，不令动摇。钱业方面也有相似的举措，组织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将各庄财产，由公会保管，集合各庄之能力，并规定每家至少缴存20万，多多益善。有此准备后，银钱两业于4日复业，当日各行庄均未发生提存挤兑的现象。</p>
<p>3. 国华、中国农工、通和、中孚、女子商业储蓄、永字、江苏以及中华银行。当时，上海银行公会26家会员银行中，有20家加入。第1届</p>
<p>4. 贝淞荪、胡孟嘉、唐寿民、钱新之等5人为常务委员，其中李馥荪为主席。该会又聘任朱博泉为经理。</p>
<p>5. 联准会成立时，各有多项规章，计有：章程54条，公约30条，公单简章12条，拆放章程10条，准备财产保管委员组章程10条，准备财产评价委员组章程10条，缴存准备财产及领取单证条款5条等。这些章程则是联准会的组成及其运作的依据。</p> <p>联准会的</p>
<p>6. 中互选主席1人联准会内设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科，并设经理1人，副经理若干人，由执行委员延聘。经理商承常务委员，副经理辅助经理，负责具体事务，办理一切事宜。此外，委员会下设保管委员组办理准备财产保管事宜，设委员7人，由执委会就执行委员中推举2人，再就上海金融界中聘任5人担任；另设评价委员组办理准备财产评价事宜，委员至多20人，由执行委员中推举3人，并设房地产股、证券股票股、丝茧股、花纱布股、食粮股等5股，各股聘专家1至3人担任委员，必要时可临时另聘专家。</p> <p>委员银行在加入联准会时，须认缴一定金额之财产，经执委会核定后缴入该会，并负随时缴足之责任。准备财产限于下列5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内之房地产、立时可变现之货物、在伦敦或纽约市场有价值之股票或债券、现金或得兑现之金币或现金条、他种财产经委员会许可者。准备财产分基本、普通两种，委员银行可于认缴时认定一种或两种。认缴基本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非因该银行解散，不得退出联准会，也不得取消其认缴的基本财产额之全部或一部分。认缴普通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非于星期前通知该会并经该会许可，不得退出联准会，亦不得取消其认缴之普通准备财产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委员银行在征得联准会同意后，可将其所认的普通准备财产额改为基本准备财产额，当联准会的准备财产总额减少时，得由委员银行增认。委员银行可以于不减少其原认额的范围内，抽换或收回其所数存之准备财产之一部分。当准备财产遇有市价低落或有败坏之虞时，经委员会通知，委员银行应即照数补足，不然联准会可以处分其准备财产用以抵偿其所领单证，若有余则交还原数委员银行，不足仍需催缴。</p> <p>委员银行向联准会缴存准备财产后，可向委员会按照估价70%领用单证，成为单证的发行人，其中包括公单4成、公库证2成及抵押证4成，而抵押证的成数，可由委员会改换公单、公库证。以上3种单证均为记名式。公单为见票即付，联准会为付款人，公单付款基金由委员会准备，当联准会为公单付款后，得即向原发行银行收回同数的现金，同时应另发新公单。公单以上海规元银为单位，</p>

7. 受款人之姓名或商号名及发行日期，由发行银行签名，并由联准会副签，照公单简章规定，公单的持有人得以公单照票面金额，向任何委员银行清偿债务或作为存货，或为其他之付款，且委员银行可以所领公单为抵押品，向委员会十足拆款，这就意味着公单一方面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另一方面又可凭以拆借现金。公库证与公单不同，不能兑换现金，也不能用于拆款，但可以作为发钞银行发行兑换券及各银行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金。另外，委员银行得用现金6成，公库证4成，向发行银行领用兑换券，再于30天内备足现金向发行银行换回该公库证。抵押证可为
8. 拆放利息由常务委员议定，由会挂牌，每月清算1次，此所谓公单拆息，即银行与银行间放款之公定利率，与钱业公布的拆息名同实异，无论拆放资金还是应付公单基金都由联准会准备，而该会自身并无资本，上项资金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筹集的：收受委员银行托放款项，商由委员银行认贷款项，向其他银行或银团借入款项，执行委员会决议之其他准备方法所收入之款项。
- 联准会自1932年3月间开办以后，为手续便利起见，先通知各委员银行将拟财产预先开单送会评价，而各委员银行拟之准备财产大部分均属于最稳实的房地产及有价证券。凡
9. 准备财产存之后，联准会的保管委员会即将此项准备财产陆续委托信誉卓著之华洋银行妥为保管，其中外商银行为汇丰、麦加利、花旗等3银行，华商银行则为中国、交通两家，其中中交两行专门保管内国公债及库券，其他财产均委托汇丰等3银行保管，该会保管委员暨常务委员得随时负责查核，保管方法与手续均有详密规定，力求稳要，因而颇得委员银行的信任，有不少银行以超过认缴额之财产，存由联准会保管。6月1日，联准会开始发放3种单证，与此同时，公单拆息开始挂牌，当日的利率为年息7厘。沪战结束后，市况有所复苏，因而截至1932年年终，联准会的拆放业务并未实行。各行所领单证，大都存充各种准备，偶尔有因移转来回注册，或以公单代替本票行使的情况，但为数亦不多，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市面逐渐宽弛，另一方面，各同业实力充足，且社会对于各同业所组织之联准会，已有相当的认识及信任，无疑也是因素之一。
- 在各行最初缴存的准备财产中，房地产及外国有价证券占很大比例。1933年1月，联准会以内国公债自整理案实行后，担保确实，市价稳定，将其议定为准备财产种类之一
10. 至1933年，各银行间相互行使，比之发行初年已有增加，但作为在市面可以替代现金使用的公单，其在市面的流通，仍然十分少见。联准会认为影响公单行使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单付款限于即期，且票面限于整数，未能符合商业需要。基于以上考虑，1933年5月1日，在第23次执行委员会上，联准会对原有的公单制度进行了改良，修正公单简章，改定公单式样，明定公单贴现办法，同时增加公单付款基金，变更发给单证成数，计公单公库证各占半数，取消抵押证，以通信方式，由各委员银行决议通过，于同年7月4日起实行。新公单与旧公单相比，既保持了稳要确实的特点，又被赋予灵活便利的功能。
- 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和联合准备委员会的成立，打通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隔阂。存户因为不能将大量现金转存外商银行，即使大量提款，最多只能将一家华资银行的存款转移到另一家华资银行，有公库保障随时调拨，哪家银行也不会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联合准备的成功不仅救了眼前之急，而且使上海金融业有了进一步改革健全制度的统一认识，原先阻力重重的设立票据交换所计划很快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联准会筹设之初，同业公会即有委托其办理票据交换之议，但
11. 兼办票据交换事宜章程草案修正案，并函送同业公会核准备案。同时设立票据交换所委员会，除经理朱博泉为当然委员外，设委员9人，设计交换所一切事务，并负责厘订各项规则。当即决议推举中国银行程慕灏、交通银行李亦卿、四行储蓄会周德荪、上海银行杨介眉、浙江实业银行陈朵如、大陆银行叶扶霄、垦业银行王伯元、东莱银行王子厚、通和银行刘鸿源为票交所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0日，票据交换所以同业公会楼下为交换场所，正式开办，同日起举办银元票据交换，共有32家银行加入为交换银行。
12. 一二八事变后金融紧迫的情形下，应急成立的联准会确立了银行界的集体安全制度，也成为一般市民的定心丸。

脚注和尾注

1. 《御侮声中之上海金融业停市》，《银行周报》第16卷第3号，1932年2月2日。
2.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118页。
3. 《银钱业组财产保委会金融更见稳定》，《申报》1932年2月7日。
4. 《银行联合准各》，《申报》，1932年3月1日。
5. 《上海联合准备委员会第14次执行委员会议事录》（1932年6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联准会档案，S177-1-6。
6. 《上海联合准备委员会第19次执行委员会议事录》（1933年1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联准会档案，S177-1-6。
7.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5）》，第D2页。
8. 《上海银行公会公布上海银行营业规程》，《银行周报》第4卷第29号，1920年8月10日，第19-2页。
9. 叔型：《银行营业时间改革之管见》，《银行周报》第4卷第43号，1920年11月16日，第33页。
10. 章乃器：《对于改订银行营业规程之管见》，《银行周报》第16卷第38号，1932年10月4日，第13页。
11. 《上海市银行业同业营业规程》（1933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档案，档案号S173-1-437。
12. 上海银行公会致兴业银行函，1922年9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档案，档案号S173-1-424。
13. 《上海华资银行调查录》，《银行周报》第6卷第6号，1922年2月21日，第18页。

1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 吴景平 - 《历史研究》 - 2003-04-15	3.6% (222) 是否引证：否
2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 朱荫贵 - 《中国社会科学》 - 2002-11-10	3.0% (186) 是否引证：否
3	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 郑成林(导师：朱英) -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01	3.0% (186) 是否引证：是
4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 - 《网络 (http://www.lwlm.com/) 》 - 2011	2.6% (158) 是否引证：否
5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1927-1937) 王晶(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5	1.7% (104) 是否引证：是
6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 (1897-1949) 刘平(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8-03-01	1.5% (92) 是否引证：否
7	山西票号的规则及运作机制研究 王佳(导师：洪佳期) -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 2013-04-15	1.2% (74) 是否引证：否
8	近代中国对外商银行的法律控制研究 杜军强(导师：王立民) -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 2013-05-01	1.2% (74) 是否引证：否
9	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理法律问题研究 马志刚(导师：郭成伟) -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 2001-04-08	1.2% (73) 是否引证：否
10	民国私营银行经营风险法律规制研究 李海波(导师：马一) -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 2014-03-10	0.7% (41) 是否引证：否
11	从山西票号看传统金融的近代化转变——基于与英格兰银行发展路径的比较视角 燕红忠; - 《财经研究》 - 2014-08-03	0.5% (33) 是否引证：否
12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1890-1935) 戴建兵(导师：吴景平)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3-04-23	0.5% (31) 是否引证：否
13	近代银行家：中国金融创新思想的先驱 (1912—1949) 董丽(导师：吴申元)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004-04-15	0.5% (29)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红色文字表示存在文字复制现象的内容; 绿色文字表示其中标明了引用的内容

第八章结语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控机制演进，可谓是步履蹒跚，造成步履蹒跚的原因不仅有从西方银行移植现代银行管理制度的问题，还有现代银行制度与中国本土商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银行业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与否，又是衡量银行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

一、危机防控机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

现代银行业出现之前，中国传统金融业已经长期存在，并在社会经济甚至国家财政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悠久的金融历史也同时形成了传统金融业的行业文化与习惯，这些传统行业文化与习惯，在制度经济学上被称之为非正式制度，与之对应的，成文的规则、法律被称为正式制度。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控机制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表现在银行业务的诸多方面。如贷放业务中的信用放款、比期存放、票据贴现业务中的背书担保等，这些非正式制度有的是传统金融业长期以来的行业习惯，有的是银行业发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不成熟的业务规则，它们与银行则例、银行业规、银行法等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并行共存。从我国近代银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中的非正式制度大约有以下几种发展或演进的方向：非正式制度逐渐发展规范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被正式制度取代或废除、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长期并存。

在现代银行制度移植到中国之前，传统金融业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风险防控制度，对经营风险的防控也多依靠经理人的管理经验或行业习惯。现代银行业兴起之后，缺少专业管理人员，**“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人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中国通商银行初建时上海分行的大班**即是由英国人担任。在缺乏本土制度供给以及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现代银行业的风险防控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传统金融业的非正式制度。如1908年清政府度支部颁行的《银行通行则例》，在自身还没有能力集中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就承认了各官商行号发行纸币的既有做法，其第一条规定**“纸币法律未经颁布以前，官设商立各行号，均得暂时发行市面通用银钱票”**，在资本保证方面，亦采用了传统金融业的常用办法，**“凡欲创立银行者，或独出资本，或按照公司办法合资集股，均须预定资本总额，取具殷实商号保结”**。无论是承认官商行号继续发行纸币的权利，还是要求新成立银行的资本总额必须寻觅殷实商号作保，这些做法其实就是传统金融业早已存在并正在发生作用的习惯做法，《银行通行则例》只不过是把这些习惯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成为所有银行业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具有了作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

192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银行通行法施行细则》中，对银行兼营他种商业，以仓库业、运输业为限，并规定银行经营他种商业，“均应另集资本并将会计独立，所有彼此盈亏，不得互相移抵”，姑且不论上述规定内容如何，该法则对银行经营商业的规定从侧面说明银行业经营他种商业的习惯在此项法则中得到确认，也即只要银行业在上述规定范围内经营他种商业，都是合法的。近代中国银行业，为方便抵押放款开展的过程中押品的仓储与运输，大都自设有货栈、运输等商业机构，也有银行通

过投资或租赁的方式获得其他货栈的使用权，但长期以来，银行对这些商业机构的经营与投资并未获得银行法规的认同，游离于法规监管之外，此次《银行通行法施行细则》有关银行兼营他种商业的规定，无疑使银行业经营仓储与运输业务，具有了合法性基础。

南京政府成立后，对金融业进行了系统的整顿与改革，1931年，在财政部的主持下，《银行法》出台，体现了南京政府对银行业的总体规划与管理原则。该《银行法》相较于1908年的《银行通行则例》以及1924年《银行通行法》，有明显的变化，如在组织形式上一改后两者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股份、两合性质的银行资本至少50万元，无限责任的银行资本至少须达20万元等。另一方面，该法也坚持了些银行业的行业习惯，第34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之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及公积金百分之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超过部分之债务有各种实业上之稳当票据为担保者；二、超过部分之债务附有确实且易于处分之担保品者”，这特定条款显然是充分考虑了银行业长期从事信用放款的习惯，规定银行业的无抵押信用放款比例不得超过10%，这种规定是对过去金融传统在制度上的一种突破，一种创新，它把非正式制度的金融传统上升为正式法律规范，是银行业传统经营习惯的规范化、合法化。

银行业的经营习惯除在国家金融法规中得以体现之外，在银行业自身的业规中也有诸多体现。以1920年银行公会制订的《上海银行业营业规程》为例，其中多项关于银行业具体业务的规定皆出自于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业务习惯，如关于银行营业内容的条款中除应包括各种定期、活期存款、抵押放款外，还包括从传统金融业沿习的信用放款、信用往来透支、票据贴现、押汇、信托等业务；在单据挂失止付办法中，“定期存单设遇水火盗贼或途中遗失，必须有殷实保证人缮具正式信函，向银行声明理由，一面登中外著名报纸各一份，声明作废，三个月后如无纠葛，由存款人邀同保证人或殷实庄号立立保证书，向付存款银行要求补给存单”，其他如各种单据业务的手续、利率的制订、更多的时候，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两者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如在信用制度中，对人信用长期以来是银行业开展信贷业务的重要信用形式。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由于票据功能不完善，票据市场不发达，尤其是“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期，一般工商企业，类多资方薄弱，其需要金融界融通流动资金，为之调剂，已成不可掩饰之事实，抑亦不可或破之成例也”，“在记账制度尚未取消，而承兑票据未获畅行之目前”，“信用放款制度非惟有存在之价值，抑且有迫切之需要”。在具体实务操作上，银行业的信用放款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在中、交等银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不得经营“无担保品之各种放款及保证”，1933年2月，财政部审核上海银行业修订业规时，亦以保障金融界放款之安全与存款人利益为由，删除“信用放款及信用往来透支”一项。从这些行市的公布等条款，无不是对行业经营习惯的规范化。

但银行业的信用放款并没有因为则例与业规的禁止而彻底从银行信贷业务中消失，相反，信用放款一直顽强地存在并发挥它的作用。1935年8月，为救济上海中小工商业者，财政部成立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由财政部指拨2,000万元国库证作为担保，向工商业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其中500万元指定以信用贷款的形式发放。抗战爆发后，银行业的信用放款更是有增无减，且获得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在传统金融业，尤其是钱业的业务中，信用放款是主要的信贷形式。现代银行业兴起后，为适应国人融通资金习惯，亦将信用放款作为授信业务的主要手段加以采用。尽管不少银行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逐渐意识到信用放款的弊端及其蕴藏的潜在风险，并在实际经营中力图压缩信用放款业务，但始终未能完全消除信用放款业务的存在。尽管银行业规、银行法等正式规范多次强调银行不得经营信用放款业务，但实际上由于长期的传统习惯与业务沿袭，这些规范多流于具文，并未发挥实际作用。由于现实需要，无论是国家行局还是商业银行，信用放款业务均大幅增长，更进一步说明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信用放款依然具有相当的活力。

从制度演进的视角观察，近代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的发展特征，总体上的趋势是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但非正式制度并没有因为行业规范、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的逐渐完善而失去作用机制，相反，没有发展成为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除部分因违反正式制度的基本精神或指导原则而被废除之外，大部分依然在银行业的实际经营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二、从行业自律到政府管控

近代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的另一个特征是行业自律机能逐渐势弱，而政府管控的职能日益增强。

晚清时期中国现代银行业创始未久，无论是自律机制还是政府管控机制，还远未成型，更谈不上完善，并很快随着清政府的崩溃而失去了历史作用，暂且略之不论。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弱势，中央银行制度尚未形成，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状态下，反而使银行业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因此，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的风险防控，也基本上依靠银行自身以及行业组织来完成，在完善银行业风险防控制度、保障银行业行业安全的实践中，政府职能是缺位的。

在政府职能缺位的情形下，行业自律的功能自然得以凸显。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上海银行公会在规范行业经营行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制定了一整套具体银行业务的行业规则，这些规章制度基本构成了抗战前上海银行业的行业法规体系与约束机制。不仅如此，在历次金融风潮、银行倒闭后的危机善后处理中，我们都能看到银行公会的身影。银行公会在制订行业规范、约束银行业经营行为、处置金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北京政府时期的银行业虽然缺乏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监管，但在银行公会主导的行业自律机制下，依然获得了高速发展。总体来说，银行公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对银行业的业务规范也是卓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行业自律机制是基于银行业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风险防控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两大缺陷。其一，在缺少中央银行制度规范与引导的情况下，银行业的风险防控机制较少从国家金融安全的层面思考问题，以致近代银行业发展结构畸形，隐藏了金融业的结构性风险，如银行业的资金流向在地域分布上过度集中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都市的分布格局。不仅不利于缓解中西部地区工农业发展的资金匮乏，也加剧了银行业自身的市场风险，抗战爆发后银行业不得不放

弃沿海商埠相对成熟的市场，向内地迁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增加了国家战时金融安全的风险，就是典型的例子。银行业的结构性风险还体现在银行资金热衷于投资商业，与工业生产则关系疏远等多个方面，这些结构性风险在银行风险防控机制处于诱致性变迁的状态中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它需要一个健全的强势的中央银行体系加以规范与疏导，才可能从根本上使银行业发展回归到合理的结构。

其二，大部分行业规范不具有强制性，以致风险防控效果不能尽如人意。某种程度上说，银行公会本质上是银行业的代言人，它能够从银行业自身利益出发，协调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与障碍。但由于银行公会作为行业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行业规范的执法权，它所制订的大部分行业规范仅具有参考与建议意义，不具有强制性，即便是银行公会可以通过罚款甚至是开除会员银行资格等处罚措施，矫正部分银行的违规行为，但事实上由于查处违规成本较高，调查取证困难，很少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再加上加入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占全部银行数量的比例较小，因而银行公会的行业规范，作为行业规则的普遍性是较为有限的，绝大多数银行还游离于行业规范的范围之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银行业经营过程中出现明显投机等高风险行为，如投机公债等，亦无法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及时加以防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多个方面加强了对银行业风险的管控，强制性变迁的路径特征逐渐凸显。1927年至1930年，的南京政府即连续颁布《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组织条例》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规，涉及银行业资本、注册、货币发行、倒闭清理等多个领域，基本形成了以加强中央金融主导权为导向的银行规范体系。

在加强中央银行实力，控制中国、交通两大重要银行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加强对在金融界发挥领袖作用的上海银行公会进行控制。1929年8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商会法》与《工商业同业公会法》，力图对工商业实施整顿。根据法案，银行公会必须按照同业公会法的要求，与其他同业组织一起，成为上海市商会的会员。于此同时，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设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筹建上海市商会，原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与闸北商会停止活动，1930年6月，上海市商会成立，国民党在上海工商界的骨干分子王延松、骆清华等人把持着该会的权力，直接受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控制。上海银行公会为避免被政府控制的上海市商会收编，保持之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于1930年2月，联合上海钱业公会，向财政部呈文要求另行颁布银钱业公会单行法，其理由有二：一是“各埠银钱业公会之设立，原系遵照前财政部于民国四年八月廿四日所公布之银行公会单行章程而组织，其统系完全隶属于财部”，“所有章程内规定一切职权，向系独立性质，殊未可与其他各业附属于商会者相提并论”，二是“今若依照同业公会法改组，加入商会为会员分子之一，在系统上虽似完整，但于将来行使会务职权，势必窒碍孔多”，“循是以想，银钱两公会既不能保持其固有之精神，则对于金融界之使命，自难望其尽职，一再筹思，因银钱两业处于特殊地位，实有碍难改组同业公会之处”。尽管上海银行公会为扩大事件影响，又联合了北平、天津、汉口等地银行公会，一起向财政部施加压力，但可以想见的是，在国民政府力图整顿工商业及其同业组织的政治背景下，上海银钱业的呼吁自然得不到相关部门的肯定性回应。不仅如此，上海市商会，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管部门、上海市党部以及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名义，不断向银行公会方面施压，要求上海银行公会即刻依法改组，以重法令。呼吁无应与多方压力之下，1931年6月，上海银行被迫接受现实，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银行公会改组后，尽管在依然发挥着联络同业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政府的强势管控下，银行公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1935年法币改革集中了货币发行权之后，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能力达到了抗战前的最高峰，银行公会也从银行业的主导者异化为政府金融政策的传声筒与执行者。

比较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演进，前时期的路径演进特征是在政府对银行业控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银行业多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实现风险防控，其特点是诱致性变迁的特征显著，同时由于缺乏正确的政府宏观政策引导，银行业尽管在具体业务风险方面的防控能力有所增强，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终究未能有效避免财政寄生性、资金投机性等结构性风险的出现。后一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力有所加强，并通过立法形成了系统的银行业经营与管理法律体系，银行业逐渐步入由政府建构并主导的金融规范之中，结构性风险发生的可能得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管控力度的日益加强，其导致的结果是，银行业的市场活力受到抑制，日益走向国家金融体制，这恰恰增加了银行业的政策性风险。

在银行业发展史上，危机和风险总是如影随形，因此，危机防控就成了银行业经营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近代中国民营银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在制度移植与本土实践的基础上，近代民营银行业在内部危机防控、外部风险监管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危机防控体系。总体而言，它们在降低近代银行业经营风险、推动银行业整体发展质量方面，都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民营银行业才在外资银行、传统金融业的挤压下日益发展，并最终成长为现代金融体系，为社会工业化进程以及健全国家财政体系提供了必需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一、档案与资料汇编

- 1.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档案、上海钱业公会档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档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金城银行档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档案等；
- 2.天津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盐业银行档案、大陆银行档案、中南银行档案、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
- 3.财政部钱币司编：《币制汇编》（第1册），财政部钱币司1919年刊印；
- 4.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3年刊印；
- 5.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二十三年度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5年刊印；
- 6.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4年刊印；

-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6年刊印；
7.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7年刊印；
8. 上海银行公会编：《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通函要编》，上海银行公会1936年刊印；
9. 金城银行：《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世界书局1937年印行；
10. 沈春雷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刊印
11. 财政评论社编：《战时财政金融法规汇编》，财政评论社1940年刊印；
12.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金融法规（续编）》，中央银行1942年刊印；
13. 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四联总处文献选辑》，四联总处秘书处1948年刊印；
14.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刊印；
1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 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
22. 重庆市工商联文史委员会：《聚兴诚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六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4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25.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26.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22 - 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27.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28. 南京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民国时期南京官办银行》（南京金融志资料专辑一），南京金融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印行
- ；
29. 南京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民国时期南京商办银行》（南京金融志资料专辑二），南京金融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印行
- ；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34. 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 - 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5. 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6. 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3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38. 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39.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编：《下白眉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0.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 - 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41. 天津档案馆等编：《盐业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2. 天津档案馆等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3. 天津档案馆等编：《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 吴景平、邢建榕主编：《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史料汇编》，已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公会》《中国征信所》《周作民日记书信集》《钱新之往来函电集》等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45. 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二、专著

1. 周葆奎：《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2.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1925年版；
3.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1928年刊行；
4. 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5.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6.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7.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8. 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

- 9.朱斯煌：《银行经营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 10.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财政评论社1943年版；
- 11.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3年刊印；
- 12.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中国银行行员手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45年刊印；
- 13.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版；
- 14.交通银行编：《金融市场论》（交通银行经济丛刊第二种），交通银行总管理处1947年刊印；
- 15.朱斯煌：《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
- 16.联合征信所：《上海金融业概览》，联合征信所1948年刊印；
- 17.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 18.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19.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20.谭玉佐：《中国重要银行发展史》，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1年版；
- 21.郭荣生：《中国省银行史略》，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 22.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 2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油印本；
-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25. [美] 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26.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样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27.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 28.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 29.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文海出版社198年影印；
30. [美] 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31.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3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 33.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34.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
- 3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36.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37.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编委会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38.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 39.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40.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 41.许家骏：《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 42.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40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 - 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 43.徐矛等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44.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 45.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46.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 - 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 47.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48.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 - 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9.张仲礼主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50.周浩明：《金城银行风险管理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51.洪葭管主编：《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 52.洪葭管、张继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53.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54.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中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 55.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 56.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 57.刘永祥：《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58.刘平：《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59.王丹莉：《银行现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 60.朱荫贵：《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61.王强：《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62.王强：《自律与他律——近代中国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研究（1897-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
- 63.吴景平：《政商博弈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
- 64.潘庆中：《近代上海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1870-1937）》，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脚注和尾注

1. 《清度支部银行通行则例》（1908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第146页。
2. 《银行通行法实施细则》，《银行周报》第8卷第16号，1924年4月29日，第4页。
3. 《财政部关于转发银行法令（1931年4月24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第577～578页。
4. 朱荫贵：《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5. 刘连宇：《重庆的比期存放款制度》，《（兴业邮乘）》第160期，1948年7月，第13页。
6. 穆深思：《信用放款问题之检讨》，《银行周报》第2卷第23号，1938年6月14日，第3页。
7. 潘恒勤：《银行业同业营业规程内财部批令删除信用放款及信用往来透支论》，《银行周报》第17卷第9号，1933年3月14日，第16页。
8.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9. 《银行钱业两公会呈请财政部颁布单行法》，《银行周报》第14卷第7号，1930年3月4日，第4页。
10. 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 - 1931》，《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说明：1.总文字复制比：被检测论文总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2.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去除系统识别为引用的文献后，计算出来的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3.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去除作者本人已发表文献后，计算出来的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4.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被检测文献与所有相似文献比对后，重合字数占总字数的比例最大的那一篇文献的文字复制比

5.指标是由系统根据《学术论文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自动生成的

6.红色文字表示文字复制部分；绿色文字表示引用部分

7.本报告单仅对您所选择比对资源范围内检测结果负责



 amlc@cnki.net

 <http://check.cnki.net/>

 <http://e.weibo.com/u/3194559873/>